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新年寄语

殷实与丰硕的2016年带着岁月的风尘离去，充满期待与希望的2017年悄悄地来临。

过去的一年充满着艰辛、挑战与收获。面对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推进“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国际国内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三去一降一补”初见成效；“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稳步推进，促进了区域均衡发展；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稳中有好、结构不断优化、改革积极推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基本稳定的态势，实现了“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新时期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更加注重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发展，更加注重城市农村协调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更加注重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总体思路，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勇于探索创新。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释放发展潜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优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化；坚持在“一带一路”战略统领下推动高水准双向开放，积极优化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高外贸发展质量，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改善利用外资环境，加强国际产能、装备制造合作和自贸区建设，有效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努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把握主导权和话语权。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优化区域发展布局。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远航。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全球化》编辑部向关心、帮助和支持我们成长的各位读者、作者及各位同仁致以节日快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全球化》编委会

• 本刊专论 •

努力创建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新未来 曾培炎 (006)

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及其影响 王军辉 (010)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霍建国 (021)

• 国际经济 •

推动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路 王晓红 (028)

世界经济新变化中的新预期 谷源洋 (050)

软件贸易强国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分析 杜振华 和佩珊 (060)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刘中伟 唐慧远 (07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微观数据分析

蔡 洁 黄 曦 白江涛 (088)

CONTENTS

Efforts to create a new, healthy, sustainable and globalised future	<i>Zeng Peiyan</i> (006)
The RMB’ s entry into SDR and its impact	<i>Wang Junhui</i> (010)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rreversible	<i>Huo Jianguo</i> (021)
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promoting China’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new period	<i>Wang Xiaohong</i> (028)
New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changes of world economy	<i>Gu Yuanyang</i> (050)
The basic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trade power	<i>Du Zhenhua and He Peishan</i> (060)
Sino – 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Liu Zhongwei and Tang Huiyuan</i> (073)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 a micro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i>Cai Jie , Huang Xi and Bai Jiangtao</i> (088)
On the guiding role of Chinese planned market economic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i>Jiang Yimao</i> (104)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20)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5)

· 本刊专论 ·

努力创建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新未来

曾培炎

摘要：“全球化”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完善和结构调整会有一个不断磨合、适调的过程，全球化趋势在克服曲折之后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全球化应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精神，使各个国家、各个群体都能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应该“包容、公平、协调、创新”，国际社会应凝聚共识、相向而行、形成合力，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应更多地发挥引领、监管和矫正的作用。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世界定将迎来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未来，各国各地区将共享全球化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全球化 可持续 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在当前全球化遭遇逆风、反自由贸易倾向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全球化的未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毋庸讳言，“全球化”这个名词与我们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地球是人类共同家园，不同的资源禀赋、地理气候和人类活动等因素决定了全球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从理论上讲，全球化是生产要素从一国内部配置到全球范围配置的转变过程，是生产力基于市场规律发展的必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包括贸易及交易（trade and transactions）、资本及投资（capital and investment）、移民与人员流动（migration and movement of people）、知识的传播（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等四个方面。历史地看，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

与殖民贸易的兴起，到二战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建，都是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与之伴随的则是全球地域的开拓、人员交往的紧密和经济增长的繁荣。全球化快速发展的百多年来，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多、社会文明进步最大的时期。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以及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跨国流动，又推动全球化在 21 世纪初达到了新的阶段。

然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把原本一路高涨的世界经济推下低谷，而且也使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遭遇了波折。全球化最主要的动力源——跨境贸易与投资不断萎缩：全球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速，国际资本流动与危机前相比缩水六成多。在国家政策层面，去全球化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移民政策不断收紧。人们对于全球化的前景也陷入迷茫，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化趋势正在出现逆转。

这种预期和看法似乎过于悲观。从总体上看，全球化本身不至于就此停止或逆转，发展潮流依然会继续。上述现象仅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回调。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的治理体制和经济结构，同全球化深入发展不相适应所造成的。这些不适应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际规则制度的不适应。同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相比，建立于 60 多年之前的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明显滞后。少数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与世界经济多元发展格局难以适应，导致全球经济秩序问题丛生。各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协调远远落后于全球化的需要。当前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需要全球范围有效的治理和监管，需要加强各经济体的政策协调；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给各国之间及各经济体内部群体之间带来的利弊有别，协调治理显得十分困难。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要求不适应、不适调，使其成为全球化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原因。

第二，财富分配机制的不适应。全球化推动了要素配置的跨国界优化，而有失公允的经济金融制度，在全球范围扩大了资本和劳动收益的差距，进一步催生了过度放任的金融化和虚拟经济。投机巨头利用资本优势、金融衍生产品和制度法规空隙，获取了大量附加值，加之合法避税逃税，导致大量财富向少数人群集中，贫富差距加大。据美国研究机构数据，自 1970 年以来，与经济快速增长不相称的是，美国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收入停滞不前，而占人口 1% 的富人收入却增长了 150% 以上。国际资本的投机本性和巨大能量，扭曲了整体分配格局，扭曲了合理收入差距，也扭曲了对全球化的认识。

第三，各经济体内部结构调整的不适应。全球化过程意味着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重构，必将对各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倒逼。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产业将根据生

产成本梯次进行转移。对于有产业淡出的国家，应该主动调整，发展其他比较优势更明显的产业部类。但很多情况是，一些经济体由于受自身政治、社会因素的制约，或者由于政策不当，没能及时调整以跟上全球结构变化的步伐，造成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停滞。中国在融入全球化当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当前，由于人口红利消退、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制约，一些原本具有优势的产业，比如服装加工、产品装配等，正在向海外转移，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产能出现过剩。但是，中国坚定信心，主动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对策，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做好失业保障、人员培训转岗工作。艰巨的调整行动，是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完善和结构调整，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会有一个不断磨合、适调的过程。在经济周期下行、增长动能转换和技术创新寻求突破的时期，由于市场疲软、就业困难、收入下降，加之政府财政紧缩、福利消减，社会民众的不适感会凸现出来，以致形成各类反全球化的思潮和行动。这些负面影响，需要各国的正视，积极加以消除和弥补。而不应因噎废食、诿过于人，更不能情绪化地全部归咎于全球化。展望未来，全球化趋势在克服曲折之后将会继续向前发展。

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应该是“包容、公平、协调、创新”的全球化。包容是其核心内涵。全球化应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精神，使各个国家、各个群体都能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公平是其衡量要素。全球化应合理反映各方诉求，致力于缩小各经济体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兼顾效率与公平，均衡资本与劳动收益。协调是其必要手段。在全球化潮流中，各经济体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协调，解决制度、政策、标准不对称问题，在世界经济重振中实现联动发展。创新是其驱动引擎。注重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合作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支持推广突破性新一代技术，克服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鼓励市场深度开放，提升贸易、投资、人员与信息流动的便利化，激发全球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为实现这种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国际社会首先应凝聚共识，相向而行，形成合力。如果任由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泛滥，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将会陷入长期停滞的泥潭。二十国集团（G20）中国杭州峰会，在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发展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中国领导人提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描绘了全球增长新蓝图，为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发展的最终目标，而全球化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构负有重要责任，应更多地发挥引领、

监管和矫正的作用。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 在内的各类国际组织，都需要进行相应完善和改革，以充分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现状，支持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区建设。特别是要使这些机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保障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坚强的国家领导力是实现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推动力。当政者应审时度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寻找合适定位，促进产业优化重组。统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妥善解决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做好对公众和舆论的政策解释。强化政策执行力，将各国之间达成的共识付诸实际行动。

此外，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应处理好一些具体问题。譬如，如何使 WTO 与各种区域性贸易机制以及众多分散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之间互相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如何使国际资本流动收益，在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资本与劳动之间合理分配，更多发挥对促进全球化的正效应？如何支持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共享全球化成果？如何加强全球产业链供方与需方的协调，实现市场的稳定和可持续？这些问题应当得到积极探讨和有效解决。

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倡导者、贡献者和实践者。中国积极参与 WTO 等多双边贸易制度安排，在推动全球和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各经济体间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三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支持和认同，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2016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郑重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议。这充分显示，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我们相信，秉承着包容、公平、协调、创新的精神，世界定将迎来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全球化未来，各国各地区将共享全球化的共同利益。

责任编辑：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及其影响

王军辉

摘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由于 SDR 自身在支付结算功能上的不足，短期看人民币很难从入篮 SDR 获得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中使用频率和金额的增加；从长期看入篮 SDR 有助于稳定跨国资本流动，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资本市场有望获得近 6 万亿元的海外新增配置。

关键词：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 人民币

作者简介：王军辉，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首席投资官，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起组成货币篮子。受此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将明显提速，汇率弹性有望持续增强，资本流动监测能力也将不断提升。长期看，将推动国内金融改革深化，促进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

一、SDR 及其历史沿革

（一）SDR 的诞生与发展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末“特里芬难题”的显现，开始涌现出对美元“过度特权”的质疑。为保证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供应，美国需长期维持国际收支逆差，随着时间推移，

美元贬值的压力会逐渐加大；但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币值需保持稳定，这又需要美国纠正国际收支逆差，美元供给则会进一步减少。这样的困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美元与黄金兑换可持续性的怀疑，纷纷试图提出改革方案改变现状。

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通过IMF增加成员国自动提款权的折衷方案。奥沙罗工作组接受了比利时的方案，初步同意“创立新的储备资产”，随后修改形成了特别提款权的框架方案。该方案于1967年9月IMF年会获得理事会通过，1968年3月提出协定修改方案，但由于法国等继续坚持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制度拒绝签字，IMF协定的修订被搁置。

1968年年初，美元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无力维持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官方价格，宣布不再按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价格兑换黄金，金价自由浮动，但各国政府仍以官方价格结算，金价出现“双轨制”，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和储备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任务，与SDR储备货币方案相关的IMF协定修订于1969年7月获得通过。1969年8月，IMF正式推出特别提款权。

美国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紧了全球流动性，1970—1972年IMF首次发行SDR共93.148亿单位，按会员国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其中美国最多为22.94亿单位，占比24.63%。最初发行时一单位等于0.888克黄金，与当时的美元等值。1979—1981年，由于美元在1978年10月对主要货币出现恐慌性暴跌，SDR进行了第二次分配，总共121亿单位。为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流动性紧张，2009年8月和9月，IMF分别进行了普通分配和特别一次性分配。截至目前，IMF对SDR的累计分配额约为2041亿SDR（约合2801亿美元），中国SDR累计分配额为69.897亿SDR，占比约3.43%。而目前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约为10.94万亿美元，SDR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仅占2.5%。

（二）SDR货币篮子的变迁

SDR成立初期，价值由黄金决定，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当时美元黄金官方价格等值，即SDR货币篮子只有美元一种货币。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这种仅和美元挂钩的机制难以为继，SDR对美元大幅升值：1971年12月18日，SDR对美元大幅升值至1.08571美元。由于以黄金定价，SDR与美元的比价持续维持在1SDR=1.2美元的高位，定值方式固化而失去独立性。

1973年，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相关改革委员会（C20委员会）认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式缺乏弹性，建议用一篮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1974年7月，IMF正式宣布SDR与黄金脱钩，改由“一篮子”货币作为定值标准，并规定货币篮子的组成货币

为 1972 年前五年中在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超过 1% 的 IMF 成员国货币。当时，符合要求的货币有 16 种，货币权重根据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相对大小设定。IMF 每天根据外汇行情公布 SDR 价格。1980 年 9 月 18 日，IMF 将一篮子货币精简为 5 种货币，即美元、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1999 年欧元诞生，随后从 2001 年 1 月 1 日起与美元、英镑、日元一起组成了新货币篮子。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被正式纳入 SDR 货币篮子，将该篮子扩充为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五种货币组成，人民币在篮子中的权重为 10.92%，超过日元和英镑，位列第三。与此同时，每隔五年 IMF 都会对 SDR 货币篮子进行例行审查并进行权重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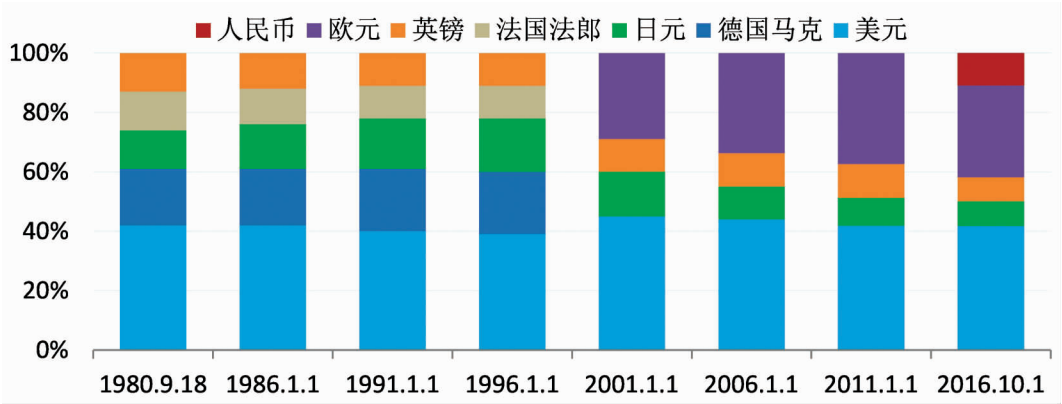


图 1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SDR 货币篮子的变迁

数据来源：IMF，中国人寿保险（CLAMC）宏观策略部整理。

（三）SDR 的使用

SDR 不是货币，也不是对 IMF 的债权，而是 IMF 成员国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潜在求偿权。目前，SDR 仅能在官方使用，主要有价值储藏、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三种功能。而支付功能又有指定交易、协议交易和转移交易三种体现方式。

指定交易中，IMF 成为参与国兑换自由使用货币的市场。希望兑换货币的国家请求 IMF 安排汇兑，IMF 将安排制定另一国家作为承兑国提供等额自由使用货币。虽然申请国可以要求兑换某种特定货币，但承兑国的义务仅限于一种或几种货币。

协议交易中，SDR 账户参与国可与其他会员国进行协商兑换，无需 IMF 协助指定。交易汇率可不按 IMF 规定的代表性汇率进行，可由双方协商确定。除兑换货币外，SDR 还可在经 70% 投票通过的前提下参与成员国间的（1）货币兑换安排；（2）贷款，包括提交贷款、偿付本金、支付利息等；（3）远期贸易支付；（4）国际金融结算；（5）国际金融交易的保证金；（6）捐赠等业务。

转移交易是指 IMF 通过一般资源账户参与 SDR 的交易和业务。IMF 可在其一般资

源账户下持有 SDR，并在有关业务和交易中使用。IMF 通过成员国缴纳 25% 的配额，成员国用 SDR 购回本国货币、缴纳相关费用等方式获得 SDR。此外，IMF 还可使用 SDR 支付利息、分派红利。

SDR 的价值一般表示为其对美元的汇率，该价值每天确定一次。汇率由伦敦市场每日中午 12 点篮子货币对美元的市场汇率与篮子货币的数量相乘之和计算得出。SDR 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则由 SDR 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该种货币的代表性汇率套算得出。其中人民币代表性汇率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下午 4 点人民币对美元的参考汇率。

IMF 每周五计算和发布 SDR 利率（下限为 0.05%），计算方法是 SDR 篮子货币的货币市场三个月期债务工具代表性利率的加权平均。人民币入篮后，中国三个月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人民币代表性利率参与 SDR 利率的计算。^①

二、加入 SDR 的意义

加入 SDR 货币篮子虽能鼓励政府和私人部门配置人民币资产，但规模有限且不确定性较高。SDR 入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更多的表现在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上，在计价单位与支付结算等功能的提高上贡献微弱。长期来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名义锚进程还需要依赖 SDR 在国际货币发展之路上的进程。

当然，政府和私人部门对人民币的需求增长同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前景息息相关，在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褪去进入稳定双向波动期、外部资金可自由进出中国的开放度增加、人民币汇率风险的对冲工具更加有效等条件的支持下，海外资金增持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将不断增强。当然这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全球央行外储的角度看来，外储的货币分布情况与 SDR 的货币篮子分布情况并无直接联系。人民币入篮前，美元在外储中的占比高达 63%，远高于其在 SDR 篮子中的 41.73%。虽然人民币在 SDR 篮子中占比已达 10.93%，但受人民币汇率制度等多方面影响，人民币占外储的比例短期内不会达到 10.92%。当然除央行外储外，主权财富基金也能为人民币资产的增加做出一定贡献。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资料，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主权财富基金总规模约 9 万亿美元。但这些主权财富基金不一定会在短期内追随 SDR 货币篮子的步伐而增配人民币资产。因此，人民币加入 SDR 的短期外储“增量配置”，效应不会十分明显。

从计价单位角度看，除全球央行外，IMF 等国际组织管理着以 SDR 计价的资产，这

^①为满足 IMF 的要求，2015 年四季度以来，财政部增加了贴现国债发行量。

些需按 SDR 篮子的货币权重来进行资产配置。然而考虑到 SDR 总额仅占有所有外储的 2.5%，短期内人民币流入资金在所有外储的 0.25% 左右，规模不及 300 亿美元，真正能为人民币需求带来的提振作用有限。

从支付手段角度看，SDR 的使用范围囿于官方国家间的自由货币兑换与和 IMF 间的相关业务，私人部门无法参与，对人民币在世界支付手段中的地位提升不大。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仅有的结算用途中，SDR 也受到了诸多限制，IMF 明确规定 SDR 的分配原则上以成员国在 IMF 一般资源账户下的配额为基础。当成员国用 SDR 换外汇平衡国际收支或偿付贷款时，该数额需以该国累计 SDR 配额 3 倍的等值货币额为限。成员国兑换时可以自由选择货币种类，无需按货币篮子的比重兑换 10.93% 的人民币，甚至也可以通过协商兑换货币篮子组成以外的货币种类。因此，加入 SDR 并无促进全球即期结算中增加人民币的机制。

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短期内无法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长期来看能很好提升人民币的公信力与国际影响力，即“被认可”。然而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除被认可外，还需具有“有需要”“可获得”等条件。“有需要”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与金融联系中的计价与支付工具上，这样的货币需要具有币值稳定与普遍接受性的特点，由于 SDR 在支付结算功能的弱势，人民币难以仅通过 SDR 入篮就实现“有需要”。“可获得”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开放与货币须具有的良好流动性，而目前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国际金融计价与官方外汇储备的全球占比计算得出的国际化指数仅为 3.6，美国为 54.97，欧元为 23.71。未来人民币在“有需要”“可获得”的实现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 SDR 如能取代美元发展为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将享受铸币税、储备资产地位等权益，并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新的名义锚。然而 SDR 由于自身在发行准备机制、信用背书等方面的欠缺而一直未能如愿在国际货币的道路上取得长足进展，这也就意味着人民币成为新国际货币名义锚任重而道远。

三、人民币入篮 SDR 对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影响

（一）对经济的影响

1. 稳定跨国资金流动、降低金融风险

成为 SDR 储备货币的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资金流动的稳定性更高。我们看到，韩国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其国际储备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都出现了大幅下降；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快速减少。再看作为 SDR 储备货

币的日本和欧元区，金融危机期间，资金流出这两个地区的幅度较小，它们甚至能成为资金寻求避险的地方。多数新兴经济体在美元大幅升值期间，暴露出通胀水平显著攀升、货币大幅贬值以及资金严重外流等问题，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加入 SDR 有助于人民币逐步成长为全球重要的储备货币，缓解危机时期的资金外逃，资金进出的稳定性提升也将有助于国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挥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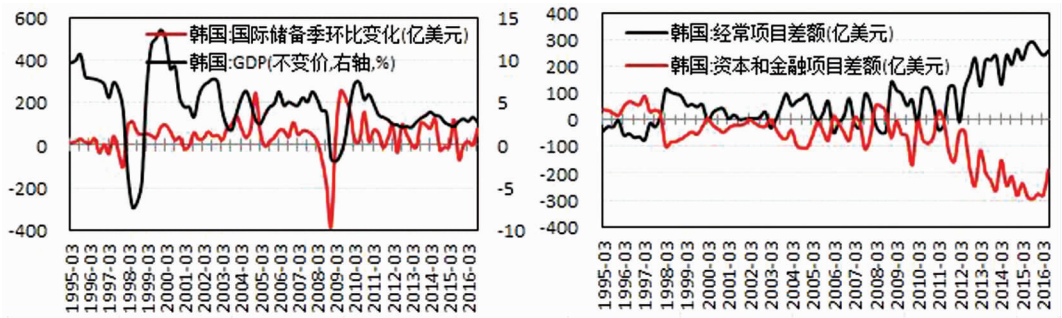


图 2 1995—2016 年韩国经济增速、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变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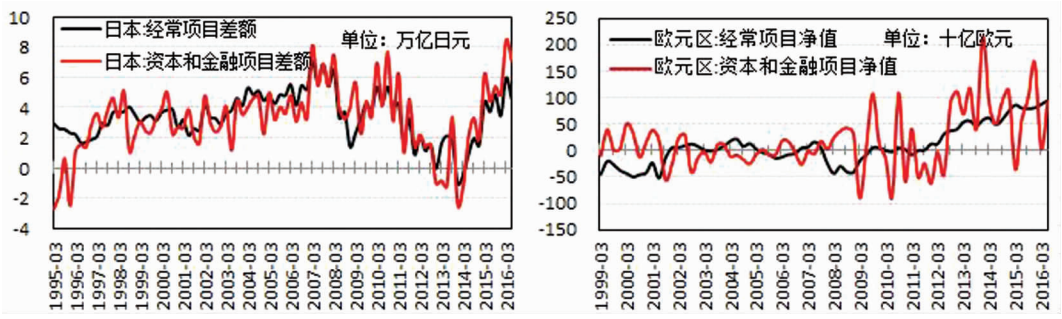


图 3 1995—2016 年日本和欧元区国际收支变化

数据来源：Wind 资讯，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2. 加快人民币清算和结算系统培育进程

2015 年 10 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上线运行，为境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及相关业务的清算和结算提供便利。此后，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了境外央行类机构在境内商业银行开立人民币账户的相关规定。目前，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已拓展至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全球 22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016 年 9 月期间央行宣布正式设立人民币业务美国清算行，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有着重要意义。此外，中国还与意大利和俄罗斯订立了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也将有助于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健康发展。

3. 推动国内证券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对外开放

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境内投资渠道，中国继续通过增设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

额度、启动沪港通、开放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等措施鼓励外部资金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1) 拓宽股票投资通道。2011 年 12 月和 2014 年 11 月，中国相继启动了 R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机制，至 2016 年 10 月底，QFII 投资额度为 844.38 亿美元，RQFII 投资额度为 5723.04 亿人民币。2014 年 11 月启动沪港通，为跨境证券交易增设渠道，至 2016 年 10 月底，沪股通累计净买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1624.75 亿元，港股通累计净买入香港交易所股票 2750.19 亿元。2016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也正式启动开通，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互通在研究之中。人民币加入 SDR 有利于更加国际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将成为全球基金资产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望逐渐获得全球投资者的关注。

(2) 央行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目前，已有 43 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27 家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各类境外参与者不断丰富。央行也表态，继续推动债券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完善交易机制安排，探索境内外交易平台、清算结算机构等基础设施的合作，努力提高人民币资产以及 SDR 计价资产的市场规模和流动性，积极为国内外发行人和投资人筹集和配置优质资产搭建良好的平台。

表 1 中国金融市场对境外投资者开放的相关政策

2010.8	央行宣布允许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进入银行间市场债券投资。
2011.12	RQFII 出台，允许基金和证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可运用其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于境内证券。
2013.3	央行、银监会、外管局修改 RQFII 试点办法，扩大试点范围，允许 QFII 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5.6	取消了境外央行、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中国债市的额度限制，并将其投资范围从现券扩展至债券回购、债券借贷、债券远期、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等交易。
2015.9	允许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自由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自由选择代理人，进行汇率风险对冲，外汇兑换不受额度限制，并可获得更全面的市场数据。
2016.2	中国债券市场全面向境外投资机构开放，在中国境外依法注册成立的各类金融机构，上述金融机构依法合规面向客户发行的投资产品，以及养老基金、慈善基金、捐赠基金等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中长期机构投资者，均可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2016.4	人民银行发布《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业务流程》和《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业务流程》。

数据来源：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4. 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2009 年 7 月，中国正式启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直至完全

开放境内外贸易结算。2016 年 9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业务结算金额为 4526 亿元，占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借贷方合计的 18%左右。2011 年 1 月和 10 月，中国分别启动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工作。2016 年 9 月，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量达到 2615 亿元。可以看到，人民币跨境结算近年来显著增加，2015 年四季度以来跨境结算规模有所下降，主要受到人民币汇率在持续强势后短期面临贬值修复的压力。未来，随着国内经济支撑人民币汇率达到新的稳定双向波动区间时，人民币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的使用规模将继续稳步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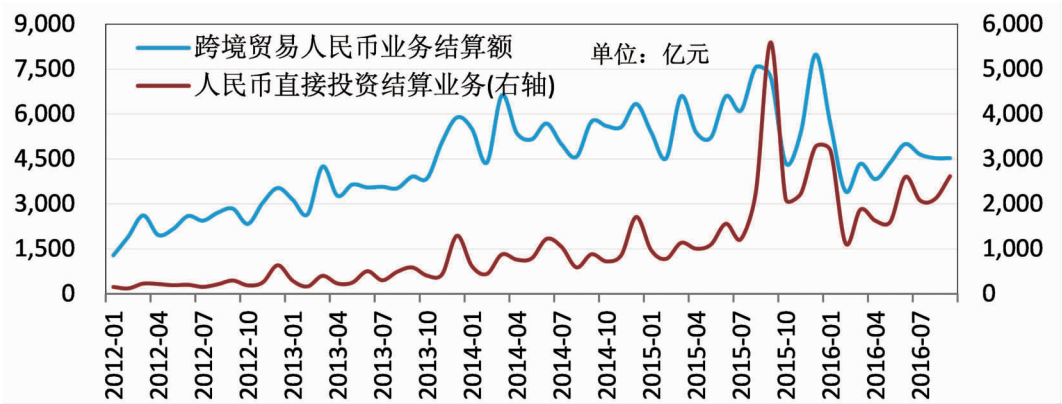


图 4 2012 年 1 月—2016 年 7 月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情况

数据来源：Wind 资讯，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当然，我们依然需要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随着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资金流入、流出的双向活动会大幅增加，需要防范资产泡沫的形成。通过考察日本我们发现，在日元列入 SDR 篮子之际，正是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的时期。日本央行为保持经济的中速增长水平而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日元大幅升值和金融自由化快速推进的影响下，催生了资产泡沫并最终带给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经济增长正从高速迈向中高速的新常态，各项改革政策处于逐步推进过程中。近期，政府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各项去杠杆工作，政治局会议强调“抑制资产泡沫从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正是针对资金流动带来的挑战提前做好布局。

（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加入 SDR 货币篮子将有效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以日元为例，日元在 1974 年与 16 种货币一同被纳入 SDR 一篮子货币，初期份额仅在 7.3%左右；1980 年 IMF 简化 SDR 货币篮子为美元、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 5 种货币，日元权重大幅上调至 13%；随后的 15 年里，日元权重又经历了三次小幅上调维持在历史最高的

18%水平。日元权重 1981 年显著上升后，日本债券收益率在 1981—1985 年呈现震荡下行的趋势，10 年期国债收益率由 1980 年末的 8.86% 降至 1985 年末的 6.14%。日本债券牛市的出现，一方面受益于 1980—1985 年货币政策宽松，另一方面也受益于日元 SDR 权重增加以及日元国际化。日元 SDR 权重增加以及日本央行逐步撤销日元外汇交易的相关限制，大大促进了资本项目的开放，日元成为排名前列的交易货币、贸易货币和储蓄货币，日本债券市场也逐渐获得国外投资者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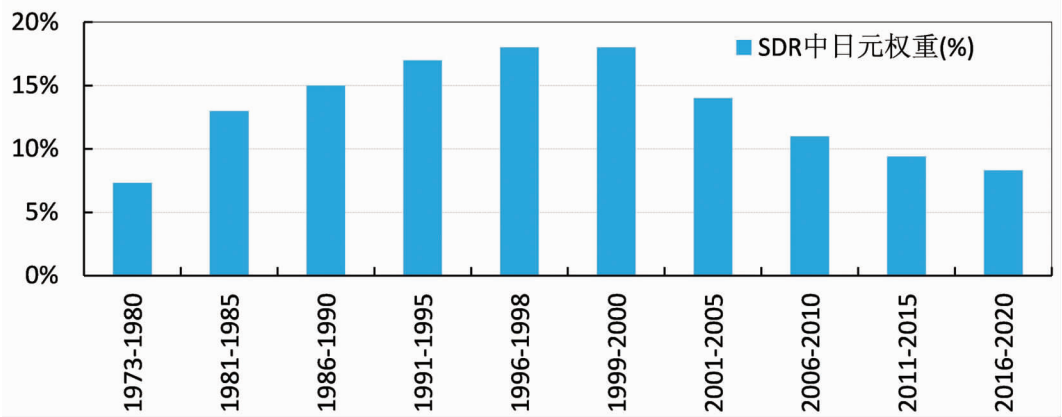


图 5 1973—2020 年 SDR 篮子中日元权重变化

数据来源：IMF，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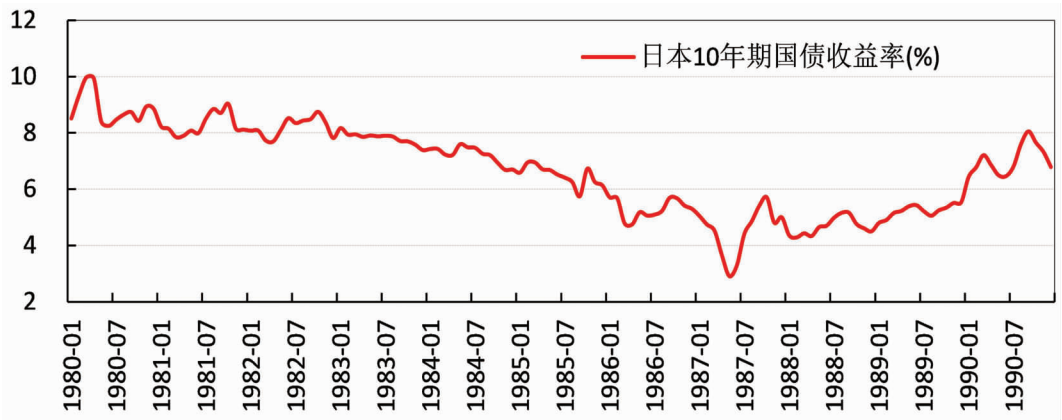


图 6 1980—1990 年日本国债收益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资讯，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一方面，人民币成为 SDR 篮子货币后，全球央行将显著增加人民币储备规模，而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配置债券的比例又极高，预计未来全球央行配置我国债券的资金规模有望大幅上升。比较全球央行外币资产储备结构与 SDR 货币篮子中各币种的构成，除美元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份额显著高于其在 SDR 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外，欧元、英镑、日元

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大致为其在 SDR 货币篮子权重的 1/2。此次 SDR 货币篮子调整后人民币份额在 10.92%，保守估计未来全球央行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比例将会升至 4%~5%，为中国债券市场带来的增量资金有望达到 2500 亿~300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67 万亿~2 万亿元。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私人部门债券投资亦不容小觑。从入篮 SDR 各货币所在国的债券市场情况看，国际化程度最低的日本债券市场近五年海外机构持仓占比也在 10% 左右。目前中国债市境外投资者持仓规模刚刚超过 7000 亿元，境外机构持仓占比不到 1.2%。保守估计，如果未来中国债券市场中境外投资者占比升至 5%~6%，境外私人机构投资者对中国债市的新增配置总规模有望达到 3 万亿元。综合而言，全球央行与私人机构投资者未来新增人民币债券配置合计将达到近 5 万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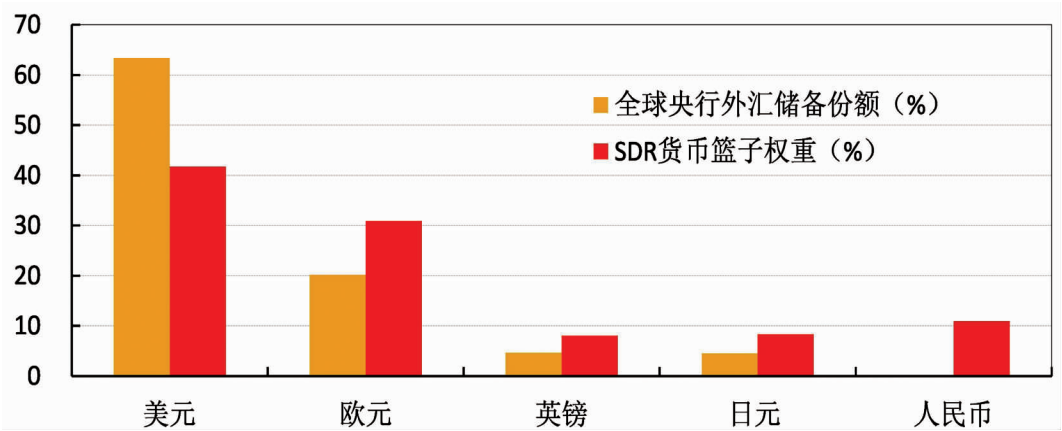


图 7 全球央行外汇储备占比与 SDR 篮子权重对比

数据来源：IMF，Wind 资讯，CLAMC 宏观策略部整理。

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数据缺失，IMF 将从 2016 年四季度起定期公布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外储中的占比。

人民币加入 SDR 对股票市场短期影响有限，中长期影响深远。仍然以日本为例，日元加入 SDR 后，日本股票市场在 1974—1975 年创下阶段低点，随后市场从 1976 年开始上行，一直到 1979 年才创出自 1973 年以来的新高。整体上看，自日元 1973 年加入 SDR 后的 9 年里股市并未出现爆发式增长，整体保持平稳慢牛，日经 225 指数维持在 7000 点左右。1981 年，日元在 SDR 中的权重提高，日本股市经历最大的泡沫，最高点位相对加入 SDR 时上涨 8.28 倍。后续日元 SDR 权重两次调升，股票市场均未出现明显上涨。整体看，在日元加入 SDR 的短期内，日本股票市场并无明显表现，后续股指高点距离日元初次加入 SDR 的时间跨度长达 16 年，期间日本股市基本面已发生重要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及日元升值等因素均对股市产生影响，日元加入 SDR 只是助推日本股市向好的因素之一。

短期看，美联储于 2016 年 12 月 15 日加息 25 个基点，且加入 SDR 后造成短期维稳预期减弱，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较大贬值压力，影响国外资金配置人民币的规模及速度；管理层仍将有序引导资本市场去泡沫。A 股当前高估值存在刚性，外资进入改善流动性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一段时期，在人民币保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套利资本外流会减缓甚至回流，有助于改善国内流动性，对国内股市形成重要支撑。

中长期看，加入 SDR 将带来人民币国际认可度的显著提升，有利于降低人民币资产的国别风险溢价，可逐渐满足海外资金的长期配置需求。根据渣打与安盛投资对关于市场资金需求的测算，预计到 2020 年，全球将有至少 1 万亿美元的外币资产转换为人民币金融资产，若以 10% 的股票占比计算，未来约有 1000 亿美元的股票配置需求，折合人民币 6000 亿~7000 亿元，不排除伴随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取得成功，会对国际资金形成更大吸引力，带来更多增量资金。与此同时，加入 SDR 还为 A 股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中国指数（MSCI）和富时指数体系提供支持，这是人民币纳入 SDR 对股票市场最直接的影响。目前预计中国股票将在 MSCI 指数中占 5% 的权重，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中占 37.5% 的权重，粗略估计将带来潜在资金流入规模约 210 亿美元。以 A 股纳入 MSCI 为契机，外资将有望与社保、保险和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共同重塑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市场波动率将趋于稳定。

综上所述，加入 SDR 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而国内资本市场将从中极大的受益。对于债券市场而言，无论是各国央行，还是海外私人投资机构，都会将国内债券市场作为其全球化配置的重要场所，安全性和流动性是其最重要考量，从而为国内债券融资主体带来低成本的国际资本，助力国内经济增长。对于股票市场而言，尽管短期影响不大，但中长期而言，将不但受益于长期、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入，而且还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改善投资者结构，完善监管制度，促进市场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沈家文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

霍建国

摘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改变，发展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长期以来是相伴而生的，矛盾的焦点基本反映在是坚持开放型发展模式还是采取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两者的转化是以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大象曲线已被证实是带有偏见的结论，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存在谁是输家的问题，关键在于一个国家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在开放环境下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平衡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坚持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协调解决好全球化中产生的矛盾。中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全力推动全球投资规则的谈判。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反全球化 大趋势 贸易投资

作者简介：霍建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已历时八年，至今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增长困境，难以回归平稳增长轨道。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经济复苏不稳定，二是各国增长不均衡，三是全球宏观政策不协调。在经济长期萧条的过程中，为挽救世界经济增长困局，各方意见难以统一，紧缩和量宽政策相互配置混乱，内生与外在增长动能难以准确把握，全球宏观政策协调难度进一步上升，存在着方向不明、政策定位不准等众多彷徨迷惑问题，从而导致世界经济难以走出衰退的阴影。在此期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恐怖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反全球化的论调趁势而上，更进

一步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影响和冲击。英国脱欧所引发的对全球化的反思讨论，至今尚无定论。美国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不断发出的反全球化的言论，引起了全世界对全球化前景的担忧。多哈发展回合历经 15 年谈判难以落下帷幕，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正在受到挑战。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自贸区协定层出不穷，已由双边协定转为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定。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协定”（TTIP）两大区域协定，进展也遇到了多重障碍，前途未卜。当今世界是否处于逆全球化的发展阶段，人们为此而争论不休。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全球化面临的一些争议和不确定因素的探讨，进一步明确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前景，以坚定人们对全球化大趋势的深刻认识。

一、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的市场不断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一个统一、开放、便捷的世界大市场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得益于科技进步，航海的发展激励了人们对世界新大陆的探索；信息技术的突破使得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航空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商贸交流；互联网的开发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使得东西半球的时差反而成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助推器；此外市场的开放促进了人流物流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解决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全球化发展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实现的，全球化的载体则体现在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方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将不可避免的产生相互交织的影响，科技的进步进一步促成了经济的深度融合，并有利于形成全球统一的大市场，而资本趋利的内在动力必然驱使企业不断提高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以寻求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的规范经济行为和竞争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全球经济的治理体系，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是各个国家共同的需要。所以，经济全球化从其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仍不失为一个大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区的距离，使世界经济发展的物理障碍日益减少，由此也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回顾全球化的发展历程，1492 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

大陆带动了全球航海事业的发展，增强了人们对地球的认识并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人们将此视为全球化的 1.0 版本。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以及后期形成的英联邦的势力范围被描述为全球化的 2.0 版本。而二战后以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为主要框架内容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其代表机构有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这一套全球治理的模式在规范和协调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所以多数人将其视为全球化的 3.0 版本。

但是从经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 20 世纪 70 年代后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结构调整和跨国贸易投资成为发展的主流，象征着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段时间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从 1970 年的 2.95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0 年的 65.6 万亿美元，增长了 20 多倍。全球贸易从 1970 年的 3056 亿美元到 2010 年为 15 万亿美元，增长近 50 倍。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以美欧为主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加速了其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并迅速形成了一批规模巨大的跨国集团，有的大到富可敌国。跨国公司由于存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内在需要，不断地驱使政府通过谈判形成市场开放的安排，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二战后的八轮关税减让谈判则集中反映了跨国公司的诉求。当然，跨国公司的发展在推动科技进步和全球统一大市场方面仍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期各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并没有改变，其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当今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平衡好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收益，以及如何保持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平衡好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二、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相伴而生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长期以来是相伴而生的，两者的博弈从未停止过，其矛盾的焦点基本反映在是坚持开放型发展模式还是采取保护主义的发展模式，两者的转化是以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看，美国也是经历了开放与保护交替发展阶段的。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长时间采取了保护主义的做法来对抗来自欧洲英法的冲击。美国真正实行开放发展战略是在 20 世纪初，随着美国竞争力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才不断的转向坚持开放市场的自由贸易发展模式。

从近代全球化的博弈看，反全球化的势力主要来自于劳联和产联方面。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使跨国公司的收益大幅上升，同时也的确影响了一部分社会工薪阶层的利益。所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思潮，主要是以工会、劳联和产联为代表的社会势力，他们反对开放市场，反对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所导致的失业现象。1999 年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五次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工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NGO），包括来自欧洲的部分代表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此轮抗议集中代表了 20 世纪 90 年代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当时的反全球化势力主要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和民间非政府机构组织。

而最近兴起的新一轮反全球化声浪，起源于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由于各国国际竞争加剧，复苏日益艰难，部分国家特别是其社会底层势力再次迁怒于全球化进程以及市场开放等因素。这一轮同上一轮反全球化浪潮有所不同的是，上一轮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者组织为代表所形成的反全球化势力，主要代表失业大军的利益和社会底层困难人群的诉求；而这一轮反全球化的声浪则来自于国家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政党领袖，反对贸易投资自由化，反对市场开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政治人物对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缺乏一定的知识和了解，从骨子里就认为全球化的发展对产业工人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另一种解释是，这些政客为了赢得基层选民的民意，借用反全球化的论调以求获取更多的选票支持。如果是前者，则代表全球化的发展真正遇到了麻烦和阻力；如果是后者，我们相信这些政客一旦执政后也未必会真正实施。全球化发展趋势不会受到根本的影响，目前的这种逆流只不过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三、全球化是否真正使某些国家丧失了“饭碗”？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历来认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顺差是导致美国巨大失业的原因。这一结论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大象曲线已被证实是带有偏见的结论。从欧美全球化的进程看，其受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欧美率先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已率先进入到了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基本占到其经济结构的 70% 以上，服务业为主的社会代表着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及大多数劳动者已成为白领工人，就业岗位提供更多的是高收入的机会，由此在欧美社会形成了广泛的中产阶级，并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长期支撑了其经济的稳定发展。

其次，欧美更大的变化是，基本摆脱了化石能源的消费阶段，进入了低耗能的环保型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时也大幅减少了对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问题是

政府并没有把更多的税收用于解决社会的养老、失业和再就业培训方面，从而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并形成了一部分人长期失业的困难阶层。这种失衡并不是全球化造成的，更不是贸易不平衡的结果，而是政府社会责任缺失导致的，是典型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应该将社会问题同全球化的影响混淆起来。

此外，长期以来，欧美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技术高知识的就业岗位不断上升，大部分新增就业主要体现在高新技术领域及金融领域方面。而现在的失业则主要体现在结构性失业方面，所以很难得出结论，失业增多是由于全球化加速发展而形成的。当然在经济危机阶段，失业率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因此，科学地看待这一切，就不会得出全球化导致大多数人失业这一结论。

四、全球化不存在输家

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存在谁是输家的问题，因为全球化的发展本身就不属于零和游戏。应该说全球化的过程是一国根据其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是完全符合国际贸易投资基本理论模型的，即根据比较优势贸易模型的测算结果，双方都是受益的，特别是从国与国的贸易关系看更不存在输赢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发展当中都是受益者。关键在于一个国家能否正确地处理好开放环境下经济平衡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平衡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核心是大多数人受益还是小部分人占有更多财富的问题。

实际上，欧美国家在长期推动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为了促进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不断地迫使新兴经济体扩大市场开放，而其所要求的开放内容又是根据其发展优势而不断变化的。例如，早期欧美国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降低关税、减少进出口限制方面；当欧美国家服务业竞争力快速上升后，又转而要求发展中国家加速开放服务业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开放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扩大了利用外资，加快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并迅速形成了加工制造的竞争优势。应该说发展中国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然而就此说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输家也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开放市场的过程，是一个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进而垄断了大量的贸易投资收益，问题出在更多的利润完全被跨国公司所垄断，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分配不均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底层的福利受到侵蚀和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则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使得更多的人摆脱了

贫困，可以看出全球化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受到社会认可的，发达国家则缺失了一部分社会支持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以输赢来判断全球化的得失，关键要看通过全球化经济发展受益之后真正的受益方是谁。

五、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矛盾是什么

当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也应引起我们重视。经济全球化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利润被跨国公司所垄断；二是没有兼顾好社会底层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能力明显滞后。所以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坚持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仍是十分必要的，但也要注意协调解决好全球化中产生的矛盾，关键要加强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要加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规范和指导，引领全球贸易投资继续健康发展。在全球贸易投资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方面，各界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这一点主要应通过全球经济治理来完成。除了要继续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继续发挥作用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领导人所通过的关于全球多边投资指导原则的文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事件，说明了主要国家已就推动全球投资规则谈判达成了原则性的意见。为了保证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关键要协调好以下几方面的规则：建立约束跨国公司合规经营的法律法规，规范跨国公司合理纳税，强调跨国公司发展中的社会责任。这些都将有益于平衡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利益，避免产生利益失衡所触发的矛盾。

其次，高度参与全球化的国家，要积极平衡好国内社会底层的群体利益，避免产生社会分配严重不均的现象，控制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的趋势。同时要兼顾好社会底层的生活和工作，特别是在社保和就业方面，要对社会底层有一定的倾斜和安排，如适当加大对失业者的培训，逐步调整就业结构，扭转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当然重点要逐步解决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争取获得社会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要发挥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协调作用。为了推动全球化健康发展，主要国家一定要在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表率，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持续通过各自努力把全球经济增长优势激发出来，使得更多的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有所受益，增强人们对全球化发展的信心。

六、如何加强对全球化的规范和治理

在前不久中国作为东道主召开的 G20 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提出的治理方案受到了广泛的响应与支持，与会国家再次重申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中国也表明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和担当，并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开出了中国的药方，其主要内容是：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与会各国元首原则通过了 G20 大会声明。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有必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这不仅是在当今世界外部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内在发展的需要。中国目前不仅是贸易大国，并且正在形成对外投资大国，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以及公平法治的投资环境，以加强对中国海外利益权限的维护。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其过程中关键是要处理好同大国的合作关系，因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是建立在主要国家合作的基础上。此外，全球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贸易投资来实现的。G20 会议通过的全球多边投资指导原则文件突破了全球投资规则谈判的禁区，该文件能得到 G20 的通过应该说为下一步推动投资规则的谈判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继续抓紧同主要国家协商，采取务实的动作，全力推动早日启动全球投资规则的谈判。这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具体过程。客观地讲，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在未来的发展时间节点上是不会有明确的权利交割期的，而中国在每一件国际事务中的成功表现将不断地积累并构筑成中国的影响力，而众多影响力的集聚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力。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经济 ·

推动新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战略思路^{*}

王晓红

摘要：当前，全球 FDI 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由速度增长向结构调整转变，由稳定性增长向波动性增长转变，由发达国家主导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转变。这些新的趋势特征将深刻影响未来全球经济、贸易、产业和区域格局的调整变化。“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趋复杂。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主导、制造业投资加速的态势和辐射全球的区域布局，企业跨国经营逐步形成国企与民企双轮驱动的格局，跨境并购成为企业获取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时，在企业层面、服务体系层面、政策层面仍然存在问题。应优化完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和区域布局、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完善对外投资促进服务体系建设、加强风险防范，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

作者简介：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由起步探索到逐渐成长壮大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输出国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5—2016 年度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总报告。研究得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的指导以及课题组各位专家的帮助，作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成为全球 FDI 增长的新动力，2009 年对外直接投资额 565.3 亿美元，由 2008 年的世界第 12 位跃升到第 5 位；2012 年为 878 亿美元，进入世界前 3 位；2014 年为 1231.2 亿美元，对全球 FDI 的贡献率达 20%。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1456.7 亿美元，相当于 2009 年的 2.6 倍，列世界第 2 位，实现连续 13 年快速增长，首次超过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 1262.7 亿美元的关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 2010 年的 3172.1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0978.6 亿美元，列世界第 8 位。2016 年 1—9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535 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额 134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7%。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更趋优化、区域布局日益广泛，全球创新网络、供应链体系布局正在逐步构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高，国际产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平台作用日益显现，国际并购已成为企业优化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重要途径。

2015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5.2 万亿元（约 8016 美元），按照邓宁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① 已经进入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出阶段。“十三五”时期，随着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尤其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政府投资促进政策不断完善等有利因素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一个规模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新时期。积极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布局，防范化解投资风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推动构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和供应链体系，既是经济新常态下破解国内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更均衡、更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把握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长远战略需要，将有力地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投资与贸易相结合、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①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邓宁（Dunning）提出了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关系的投资发展水平理论。即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低于 400 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几乎没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也不能利用国外的区位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处于空白状态，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处于很低的水平。第二阶段人均 GNP 处于 400~1500 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内市场有所扩大，投资环境有较大改善，因而区位优势较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迅速增加，但由于这些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仍然十分有限，对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处于较低水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第三阶段人均 GNP 在 2000~4750 美元之间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部分企业开始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这一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都达到较大的规模。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这一阶段。第四阶段人均 GNP 超过 5000 美元，这一阶段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由于它们拥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并从全球战略的高度来利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高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际国内产业联动、市场联动和创新联动，实现资本、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全球配置的重要途径。有利于规避贸易壁垒、应对外贸增速下行压力以及新一轮高标准国际贸易规则带来的挑战，推动自主品牌国际化，实现国际分工地位向中高端攀升；有利于推动传统产业、富余产能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化解国内产能过剩、资源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等结构性矛盾，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有利于构建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化的全球创新体系，加快掌握世界前沿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新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制高点。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秉持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理念，充分尊重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有利于构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二、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由生产、市场和贸易全球化，逐步发展到信息、金融和研发创新全球化等各个层面。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研发创新加速、跨国公司重构战略布局及投资保护主义加重等多重因素影响，从根本上导致全球 FDI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是，全球 FDI 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转变，由速度增长向结构调整转变，由稳定性增长向波动性增长转变，由发达国家主导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转变。这些新的趋势特征将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贸易、产业和区域格局的调整变化，并对未来各国投资政策变化产生影响。

（一）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波浪式上升、曲折前行发展态势

2009—2015 年全球 FDI 增速处于起伏波动增长状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 年、2009 年全球 FDI 增速均为 -20.4%，分别为 1.49 万亿美元、1.19 万亿美元，比 2007 年（1.87 万亿美元）下降 57%，也明显低于同期全球 GDP 增速（2008 年、2009 年分别为 1.5%、-2%）和贸易增速（2008 年、2009 年分别为 3%、-10.6%）水平。反映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投资信心，也表明 FDI 下降是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2010 年、2011 年随着各国经济投资刺激计划的实施，全球 FDI 呈现迅速上扬态势，增速分别达 11.9% 和 17.7%，除 2010 年贸易增速（12.6%）外，高于同期 GDP 增速（2010 年、2011 年分别为 4.1%、2.9%）和 2011 年贸易增速（6.8%）水平，全球投资表现活跃

对经济与贸易增长产生较大牵引作用。但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又出现相继回落，增速分别为 -10.3%、4.6% 和 -16.3%。2015 年全球 FDI 达到 1.76 万亿美元，增速达 38%，远远高于当年 GDP 和贸易增速，投资大幅回升反映全球经济复苏基础进一步巩固，也将推动经济复苏势头加快。从趋势看，“十三五”时期由于全球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区间，跨国直接投资也将继续处于波动式增长状态。

（二）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加快调整，呈现明显的结构升级效应

1. 全球 FDI 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重点投资领域。全球服务业投资、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的快速增长，成为推动服务全球化发展的三大动力。自 2005 年起全球已经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投资结构，服务业吸收 FDI 占比达 50% 以上。2015 年服务业吸收 FDI 为 7097.67 亿美元，比重虽下降为 47.7%，仍与制造业持平。2015 年生产性服务业吸收 FDI 占服务业比重达 94.1%，主要集中于金融、房地产、通讯、软件与信息技术（IT）服务、商业服务、现代物流等领域。其中，新兴服务业吸收 FDI 占服务业的比重为 58.2%。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拓展了全球服务业规模经济范围，加速了服务资源要素全球流动；二是全球制造业由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业的变革，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引领制造业创新与转型的主要动力，导致越来越多的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三是全球分工由产品主导向价值链主导转变，由一国制造、一国服务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转变，全球生产活动对金融、物流、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度、融合度加深，推动了服务国际化和专业化；四是网络化、平台化、数字化、众包化的创新范式变革推动了创新全球化空前发展，跨国企业进行全球研发战略布局，利用各国人才、技术、科研基础设施等从事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活动，导致全球研发设计服务投资增长；五是各国服务业开放程度提高，对扩大全球服务业投资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在技术、制度的合力作用下，服务业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主导地位仍将继续保持。

2. 全球制造业投资增速加快，且呈现出传统制造业下降、新兴制造业增长的优化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逐渐回归实体经济。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制订“再工业化”战略，导致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2015 年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为 47.8%。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2009—2015 年全球 FDI 流入额排名前 10 位的制造行业分别是：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食品饮料和烟草、金属与金属制品、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电子电

气设备、医药机械装备制造、纺织服装与皮革制品、焦炭石油及核燃料、橡胶和塑料制品，上述 10 大行业吸收 FDI 占全球总量比重已经由 2009 年的 30.2% 下降到 2015 年的 18.6%。与此同时，生态环保、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仪表设备制造、生命科学等新兴产业投资加速增长。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问题凸显，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和低碳技术等领域市场前景日益广阔。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2020 年全球节能投资达 1.999 万亿美元，2020—2030 年达 5.586 万亿美元。^①

（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呈现“东升西降”格局，发达经济体之间相互投资增强

1. 发达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明显下降，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截至 2015 年发达经济体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194408.1 亿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52963.5 亿美元）的 3.7 倍，但全球占比由 2003 年的 90.6%、2007 年的 85.1% 下降到 2015 年的 72.3%。与此同时，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2015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 14742.42 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 10651.92 亿美元，增长 29.84%；发展中经济体 3779.38 亿美元，增长 57.43%，占比 25.64%，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由 2003 年的 9.29% 提高到 2015 年的 21.15%。从全球并购来看，2014 年发达经济体跨境并购金额为 2745.49 亿美元，占比 68.8%，较 2007 年下降 18.9%；发展中经济体为 1201.3 亿美元，占比上升到 30.1%。进一步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导致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2. 美日欧仍是跨国直接投资主要来源国，发达经济体之间互为投资目的地特征更趋明显。2015 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总量比重的 62.1%，占发达经济体的 86%。2015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2999.7 亿美元，仍保持全球首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 1286.5 亿美元，相当于 2011 年（1076 亿美元）的 1.2 倍，仍较平稳。截至 2015 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93417.9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37.3%。从投资流向看，欧洲和北美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截至 2014 年欧盟吸收 FDI 存量 45830 亿欧元，美国是其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对欧投资存量达 18110 亿欧元，占 39.5%。同时美国也是欧盟最大的投资目的地国，欧盟对美国投资存量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35%。英国、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均为美国的主要外资来源地，截至 2014 年英国、日本、荷兰对美国直接投资额占比分别为 15.5%、12.9%、10.5%。

3.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2014 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4400 亿美元，首次超过北美和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的 FDI 来源地。其中以我国

^① 国际能源署：《2013 世界能源展望报告》，2013 年 11 月 12 日。

为首的东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为迅速，新加坡、印度分别为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领头羊。

（四）全球跨境并购保持高速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成为并购的重点领域

2015 年全球跨境并购达 7214.6 亿美元，较 2014 年增长 66.8%，占 FDI 比重的 40% 以上。首先，跨境并购的重点流向生产性服务业，2015 年服务业跨境并购金额为 3015.7 亿美元，占跨境并购总额的 41.8%，主要流向金融、商业服务、交通运输与仓储、信息和通讯四个部门，比重达 81.5%。其次，由于再工业化战略导致制造业并购持续增长，制造业跨境并购比重由 2007 年的 31.6%、2014 年的 43.7% 上升至到 2015 年的 53.8%，其中食品饮料和烟草、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医药、金属和金属制品、电气和电子设备等传统行业占比最大，占制造业跨境并购额的 90% 以上。

（五）新一轮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呈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轮驱动态势

从总体趋势看，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仍面临经济低速增长、保护主义加剧、金融动荡、地缘政治风险、地区冲突加剧等不利因素，但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发达国家经济逐步企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仍是大势所趋，这些有利因素都将对全球 FDI 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促进未来全球 FDI 继续朝着上升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仍是拉动新一轮全球 FDI 增长的主导力量，全球经济环境改善和投资需求扩大都将增强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按照全球价值链战略来调整全球生产布局，大规模跨境并购交易将更加频繁。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国力不断壮大，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能力和意愿增强，将成为推动全球 FDI 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六）全球投资规制发展态势将呈现全球投资自由化改革加速与区域保护主义并存格局

从全球投资政策看，一方面，建立高标准、自由化、便利化的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是大势所趋。全球投资政策仍将继续朝着促进自由化、便利化方向发展。据 UNCTAD 统计，2014 年超过 80% 的外资政策涉及放宽准入条件、减少对外资限制，有 50 个国家或地区重审或修订国际投资协定范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开放战略，更加注重国际投资合作，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率比发达国家低 1/3 左右。另一方面，投资保护主义也将有所增强。投资壁垒、歧视性待遇、东道国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性，以及各区域投资协定的规则冲突会使跨国直接投资风险加大，一些涉及国家安全或交通、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监管、审查和限制性

投资政策将会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构建自贸区或区域投资协定参与全球投资规则制定，自贸区的发展在推动区域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区域保护主义，造成对区域外企业的投资限制。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环境

（一）国际环境层面

“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世界经济贸易总体处于低速增长区间，面临新旧动能转换、新旧产业交替和新旧制度更迭。新一轮高标准国际投资规则已经启动，投资保护主义趋势有所增强，国际金融动荡、汇率风险加大，全球治理结构分化、政局动荡使政治风险加剧，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遏制我国崛起的势力有所增强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添了新的风险。

1. 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因素加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变幻动荡，导致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困难和挑战增多。从发达国家看，西方国家政治势力的影响、泛政治化倾向、保护主义倾向等都将影响我国企业开展投资并购活动。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对于我国企业并购普遍持有敌视态度，利用“国家安全论”阻止我国企业海外发展，尤其是在国企并购能源、高科技等企业时表现最为突出。发达国家泛政治化引发的不确定性已成为我国企业赴美投资遇到的重大难题，美国商业利益团体以国家安全为幌子保护自己，国会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通过收紧外资审查标准排挤我国企业，如中兴、华为在美国电信领域投资受到阻力等。从发展中国家看，亚洲周边国家地缘政治复杂、民族宗教矛盾突出、领域争端和海洋权益挑衅不断；中东“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异常活跃，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尤其“一带一路”沿线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不仅产业基础薄弱，而且政局不稳、汇率大幅波动、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较差等，都使我国企业投资存在较大风险。

2. 发达国家继续主导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将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新的国际投资规则更加注重企业社会责任、劳工标准、人权发展、环境保护、准入前国民待遇及国有企业竞争行为规范等，许多国家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中要求投资企业遵守上述原则。美欧等发达国家内部建立排他性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降低内部准入门槛和投资限制，推动相互投资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推动发达经济体快速复苏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进行经济结盟，形成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网络，对于非经济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战略挤压。美国实施“一体两翼”

的自贸区战略，即北美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虽然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提出了退出 TPP 的战略调整，但新的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

3. 发达国家增强对外国直接投资安全审查力度可能给我国相关产业投资造成准入障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法律对外资并购加强安全审查，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扩大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2014 年美国对海外并购提议安全风险梳理 147 起，为 2008 年以来最多。美国对外资进入国防、航空、海运、通讯、金融、水力发电、资源开发、原子能开发等领域设有禁止或限制措施。CFIUS 重点审查“关键性基础设施产业”和“关键技术”两大类，主要包括制造业、电信、能源、金融、运输、信息等产业以及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关键元件和关键技术项目。审查特别关注并购企业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战略协调，因此国有企业成为审查重点。这些将对我国上述相关产业赴美国投资并购活动构成风险因素。2011—2013 年 CFIUS 审查项目的 40%集中于制造业，对我国企业审查的项目最多。

（二）国内环境层面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外贸下行压力加大、“三去一降一补”任务艰巨，这些结构性矛盾要求我们通过提高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促创新、促改革、促发展。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

1. 综合国力提升、财力基础雄厚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障。2015 年我国 GDP 总量 676708 亿元，截至 2016 年 9 月外汇储备余额 3.17 万亿美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钢铁、汽车、船舶、工程机械及家电等产业规模位于世界第一位，为传统产业国际转移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奠定了较好的产业基础。企业通过长期国际化经营实践，在综合实力、创新能力、运营能力等方面优势明显增强。

2. “一带一路”建设务实推进拓展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市场空间。通过与沿线国家签订投资贸易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装备制造合作、能源合作等，推动了我国传统制造业转移及高端装备、高铁、能源电力、物流、电子商务、研发设计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走出去”的步伐。目前，我国已与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匈牙利等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并与俄罗斯、印尼、泰国、巴基斯坦、老挝、新加坡等沿线国家签订了铁路、能源、钢铁、化工、信息、港口等领域的重要合作项目。中缅、中老、中巴、中吉乌等铁路和公路干

线，以及缅甸皎漂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一批重大项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正在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实施国际产能合作，使我国制造业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需求形成对接，释放了企业对外投资活力。

3. 实施全球自贸区战略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截至 2016 年我国已签署并实施 14 个自贸协定，涉及 22 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与此同时，“十三五”时期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将尘埃落定，作为深化中美、中欧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将消减投资壁垒、推进双向对等开放，为我国企业投资提供便利。亚太自贸区战略的积极推进将为我国企业在亚洲地区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四、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呈现结构优化态势

1.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已经形成服务业主导、制造业投资加速、农业投资潜力逐步释放的格局。服务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保持绝对优势地位。2006—2015 年服务业投资流量从 113.81 亿美元增长到 1059.84 亿美元，9 年增长 8.3 倍；存量从 623.7 亿美元增长到 8226.9 亿美元，9 年增长 12.2 倍。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72.8%、存量的 74.9%分布在服务业。这一特征是我国参与分享服务全球化红利与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2006—2015 年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 95.98 亿增长到 371 亿美元，占比虽从 45.4%下降到 25.5%，但流量规模增长 2.9 倍、存量规模增长 8.6 倍，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造业加速产业转移。此外，我国开始强化农业对外投资战略布局，2006—2015 年第一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由 1.85 亿美元增长到 25.7 亿美元，占比从 0.87% 提高到 1.8%。

2. 从服务业内部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2015 年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54.7%。金融业国际化步伐加快，截至 2015 年我国对外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1596.6 亿美元，其中银行业为 971.3 亿美元，占比 60.8%，国有商业银行一直是主力军。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欧美金融企业资产大幅缩水，导致我国金融企业并购活跃，如安邦保险集团 2014—2015 年先后完成 6 次国际并购。信息服务业成为投资增速最快的领域，2015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外投资增速达 115.2%。此外，房地产、物流业也较为活跃。物流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水上运输、装卸搬运、航空运输等贸易服务型行业，跨境电商海外建仓等也扩大了物流

业对外投资。反映近年来企业在构建全球营销网络渠道、全球服务体系等方面进展较快。

3. 从第二产业内部看，已经形成采矿业投资下降、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态势。近年来，采矿业在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占主体地位，但呈明显下降趋势。2006—2015年采矿业占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比重由89%下降到30.3%。由于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大力推进及制造业发展对矿能资源的强大需求，矿能资源始终成为“走出去”的主要领域，一批大型国企在海外战略布局中发挥领军作用。近年来铁矿石、铜矿、铝土矿等大宗矿产价格持续走低，也导致我国企业海外矿业资产并购活跃。2015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99.9亿美元，同比增长108.5%，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额10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4%，占比50.3%。2016年1—9月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243.9亿美元，增长168.1%，占比18.2%，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50.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3.5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61.7%。一方面体现出我国制造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产能过剩、贸易壁垒等因素增加了制造业“走出去”的紧迫感。许多制造业企业通过在国外设立研发设计中心、运营中心、物流中心等不断强化全球战略布局，完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布局。对于带动装备、技术、服务、标准和品牌“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

4. 国际产能合作和传统产业转移稳步推进，增强了国际国内产业联动效应。目前，我国已与22个国家签署协议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尤其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了矿能资源、纺织轻工、装备制造、钢铁、水泥建材、汽车、船舶等一批传统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产业转移，有效化解了国内过剩产能。截至目前钢铁业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22个国家进行投资，设立境外企业或分支机构约200家，一批企业在海外铁矿石资源丰富地区建立了冶炼基地和资源基地，宝钢、武钢等大型企业在澳大利亚等国设立了研发中心。水泥业截至2015年在境外投资设立企业100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34个国家（地区）。老挝、越南、缅甸、蒙古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南非等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是主要投资对象国。截至2015年9月我国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共发起海外并购案50起左右，船舶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超过150家。太阳能光伏、通信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快速发展。截至2015年9月我国共有300家左右通讯电子制造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太阳能光伏企业已超过100家在海外设立了办事机构和制造基地，其中在德国企业占20%以上，其次是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等地。

5.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成为境外企业集聚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已在境外形成了一批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辐射带动

效应的产业园区。截至 2015 年我国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 75 个，已通过国家认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 13 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有 48 个，累计投资额 181.8 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 1154 家，累计创造总产值 419.7 亿美元。主导产业涉及有色、轻纺、服装、汽配、建材、家电等优势产业，其中有 50% 以上是与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加工类项目。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形成辐射全球的区域布局

我国已经形成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亚洲地区为主，辐射全球的投资布局。截至 2015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发展中经济体为 9208.87 亿美元，占比 83.9%；发达经济体为 1536.52 亿美元，占比 14%；转型期经济体为 233.21 亿美元，占比 2.1%。截至 2015 年我国共有 2.02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 3.08 万家，分布在 188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覆盖率达 80.3%。其中区域分布为：亚洲 55.5%、北美洲 14.4%、欧洲 11.5%、非洲 9.6%、拉丁美洲 5.7%、大洋洲 3.3%。截至 2015 年我国在亚洲设立企业 1.7 万家，其中香港地区 9000 余家；在北美洲设立企业超过 4000 家，美国是除香港之外我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欧洲、非洲、拉美和大洋洲设立境外企业数分别为 3500 余家、3000 余家、1700 余家和 1000 余家。

1. 亚洲地区仍是我国最大的投资目的地。2015 年我国对亚洲投资额 1083.7 亿美元，占总量的 74.4%，其中大陆对我国香港投资 897.9 亿美元，占总量的 61.6%，^① 其次分别为新加坡、印尼和韩国；截至 2015 年我国在亚洲投资存量为 7689 亿美元，占总量的 70%，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尼、中国澳门、泰国、越南、韩国和日本，其中香港地区占亚洲投资存量的 85.4%。“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对东盟、中亚及周边国家投资大幅增长，2015 年我国对东盟地区投资增长 60.7%，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和泰国等国家。中亚各国与我国经济有较强互补性，其中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发展最快、政局较稳定的国家，GDP 已连续五年超过 9% 的增速；乌兹别克斯坦具有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技潜力，拥有黄金、棉花、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也是中亚最大的化学、纺织、食品、建材、电力设备等生产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都积极推动了我国对印度、巴基斯坦的投资。

2. 欧洲成为我国最具投资吸引力的目的地。欧洲地区良好的引资环境以及金融危机后各国不断加大引资力度，使我国对欧洲投资持续上升。2015 年我国企业对欧洲投资额达 71.2 亿美元，其中对欧盟投资额 54.8 亿美元，占对欧洲投资额的 77%。目前我国在欧

^①我国许多企业对外投资是先投资到香港设立公司，然后通过香港公司投资到最终目的地国家。因此，香港主要是发挥投资“中转站”作用，而非最终投资目的地。

盟设立企业 2300 家，覆盖欧盟 28 个成员国。近年来，尤其对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北欧五国的投资额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我国对欧洲投资正逐渐转向汽车、装备、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高端制造业，其中对德国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主要集中在机械、汽车制造、新能源、航空航天、金融、节能环保等优势产业。欧盟不仅有稳定的投资环境、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透明的法律环境，而且市场开放度高、准入壁垒较少，几乎没有发生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我国企业投资的状况。如，由于葡萄牙和意大利放开对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外资进入的限制，使我国企业三峡集团以 27 亿欧元入股葡萄牙电力 21.3%，国家电网 30 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络控股公司 CDP Reti 35% 的股权。我国对欧投资以并购为主，2014 年有 7 桩并购案总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2015 年第一季度有 3 桩并购案总规模超过 10 亿美元，包括中国化工宣布以 77 亿美元收购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一案。

3. 美国成为我国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2012 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美国成为继香港之后我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2015 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达 80.29 亿美元，占总量的 5.5%。我国企业对美投资以并购方式为主，重大并购集中在房地产、金融、信息通信技术（ICT）、汽车、保健和生物科技、文化娱乐等领域，2015 年美国成为我国企业并购最多的国家。2016 年以来并购活动增势更为迅猛，1—2 月我国企业对美并购金额达 235 亿美元，超过 2015 年全年我国企业对美并购总额。目前，我国企业对美投资的驱动力正在从最初获取资源能源逐步转向获取高技术、开拓市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2011—2015 年对美投资的主要行业已经由制造业、金融、信息服务、采矿、公用事业、建筑业向 ICT、汽车、健康和生物科技、文化娱乐等领域拓展。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断扩大。随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装备合作及自贸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实施，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空间日益广阔。2015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 49 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投资额达 18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6%；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前 20 位国家和地区中有 7 个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截至 2015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 1156.8 亿美元，占总量的 10.5%。2016 年 1—9 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的 51 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11.2 亿美元，占总量的 8.3%，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国、马来西亚、老挝、俄罗斯等国家。随着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不断深化，投资潜力也将继续释放。

5. 对非投资取得积极进展。长期的中非友好合作为我国企业对非投资奠定了有利基础。截至 2015 年我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 346.9 亿美元，连续 15 年增速超过 30%。中非经贸合作区等平台的产业聚集效应初步形成，非洲国家对我国企业在能源开发、重点项目投资等方面给予土地、税收、用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国内对非投资促进组织发挥了

重要作用。如，中非工业合作发展论坛 8 年推动中非合作签约项目 400 多个，累计签约额 200 多亿元，已经成为推动中非合作工业发展的重要组织。

（三）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增强并逐步形成国企与民企双轮驱动的格局

1.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实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2015 年华为、民生银行、吉利、太平洋建设集团、正威国际、魏桥创业集团等 6 家民企入选世界 500 强企业。截至 2014 年我国非金融类跨境投资企业存量前 100 强中民企达 34 家。按照投资存量统计，到 2014 年非国企占比已达 46.4%。近年来，民企在高技术、新能源、电力、军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大规模、先进技术型国际并购实力增强。如，2010 年浙江吉利集团以 18 亿美元并购沃尔沃成功实现国产化；2016 年海航以 60 亿美元收购全球信息技术（IT）最大分销商美国英迈公司获得国际领先 IT 和电信品牌、物流渠道、领军人才、客户资源等。民企已经成为我国对美投资的主力军，投资额占比从 5 年前的 19% 上升到 84%。

2. 国企仍在对外投资中发挥主力军作用。虽然国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枝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截至 2014 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 7450.2 亿美元，国企占比从 2006 年的 81% 下降到 2014 年的 53.6%，但国企由于集聚资源、资金和政策等优势仍在对外投资中发挥主导作用。2016 年《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 500 强企业中，大陆和香港上榜公司数量 103 家，仅次于美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金融、能源、通信、制造、建筑等领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骨干力量，其中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分列第 2、3、4 位。在商务部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年度境外企业销售收入情况所公布的“中国非金融类跨国经营企业 100 强”中，前 10 强均为国企。

（四）跨境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获取全球战略资源的重要方式

1. 跨境并购对象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国际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优质资产价格走低和跨国公司并购重组，为我国企业并购提供了历史机遇。此轮跨境并购具有项目大、金额大、领域宽等特点。2015 年我国跨境并购金额为 401 亿美元，其中 10 大海外并购案平均金额为 35 亿美元，企业海外并购项目分布在全球 62 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2015 年实际并购额排名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占我国跨境并购总额的 70% 以上，分别为美国、开曼群岛、意大利、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荷兰、以色列、百慕大、哈萨克斯坦、英国。其次，2015 年我国企业对亚洲国家的并购数量达 93 起，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次于欧洲和北美，同比增长 63%。

2. 跨境并购成为我国获取全球高端要素资源的重要途径。我国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获取了发达国家研发设计、核心关键技术、领军人才、国际品牌、营销渠道等生产要素，

加快推动了我国企业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物流营销体系，快速提升了自主品牌创建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有效改变了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位于中低端的困境，深化了与东道国互利共赢的关系，使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大幅提高。研究表明，我国企业选择跨境并购的主要因素为：获取技术研发能力（73%）、品牌（58%）、与国内业务匹配和互补（42%）、零部件筹措渠道（27%），并购后 96% 的企业增加了海外销售和市场份额，89% 的企业在欧美设立了研发中心，51% 的企业提高了国内研发水平并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五、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层面

1. 企业对外投资短期增速过快将导致金融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增加。2016 年 1—9 月我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 212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 1197.6 亿美元增长 77.7%。其中，境外并购项目中方协议投资额 1044.6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 217.4 亿美元增长 380.5%；对外直接投资项下跨境资金累计流出 1205.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7.38%。这种短期内投资增速过快存在一定的非正常因素。如，一些企业对外投资追求政绩、贪大求多，开展海外并购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导致过度负债，一些企业和个人假借对外投资渠道向境外转移资金等，都容易引发经营风险、债务风险和资本外流风险，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2. 不注重融入东道国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2005—2014 年，我国金属矿业对外投资失败项目金额占 27%。其主要原因是大多金属矿企对东道国商业规则及文化、法律、市场等情况不熟悉，投资后资源整合和管理能力不足。在对美国投资中，由于对当地法律法规、市场规范等重视不够，不善于运用当地政府公共信息及投资银行、会计、法律、公关等专业服务咨询机构，导致投资项目遇到障碍。据美国某大学的研究，我国企业由于在项目设计、投资结构、项目谈判等方面经验不足，导致对美投资项目比其他外国投资者支付了更高的溢价。此外，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不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影响企业社会声誉，且可能被逐出市场。而我国部分制造企业习惯于将国内不合理的做法应用于跨国经营中，如不谨慎地大规模裁员等，给当地造成负面影响。

3. 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仍存在较大差距。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历史悠久、实力雄厚、资金充足、管理技术先进等优势相比，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总体处于初级阶段。如，我国金属矿企业在资金实力、信息化管理能力、国外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与国外大型金属矿企业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世界三大铁矿巨头生产了全球约 1/3 的铁矿，控制了全球约 70% 的铁矿石贸易。据统计，2013 年我国 100 大跨国公司的平均

跨国指数为 13.98%，不仅远低于当年世界 100 大跨国公司 61.06%的水平，而且低于当年发展中国家 100 大跨国公司 37.91%的水平。以海外销售收入比重、海外资产比重和海外子公司比重三个指标衡量，我国钢铁企业国际化水平远低于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印度塔塔钢铁等企业。此外，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仍存在恶性竞争现象影响了海外经营整体效益。

4. 民企面临政策歧视和体制约束仍较为突出。在海外投资并购中，民企仍面临融资难、购汇难、资质“玻璃门”等问题。在融资方面，由于政策性银行融资门槛过高、商业银行融资产品缺乏、融资贷款主要向国企倾斜，导致民企对外投资融资困难，重大海外并购项目融资渠道狭窄、成本高，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且担保体系不健全。如，金属矿产投资具有周期长、高风险、高投入、技术性强等特点，民企往往由于在海外勘探开发没有雄厚资金实力而无法承担开发风险。据统计，目前我国民企融资成本比国企高 10%~30%，许多中小型民企很难获得境内外的巨额银行贷款。此外，用汇方面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仍存在对民企的歧视。如，配额优先供应国企，非国有企业需要的配额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等。

5. 国企投资经营效益不高且滋生腐败问题。由于目前国企投资行为并非以对外投资盈利和经济效益作为主要考量指标，导致对海外投资风险预估不足。一些国企管理者将海外投资项目作为政绩工程，为追求政绩而投资高风险地区和高风险产业，在投资的方向性、战略性上出现重大失误。由于对国企约束监管不够、亏损追责不力，滋生权力寻租行为突出，以对外投资名义转移国有资产等问题也有所发生。

（二）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层面

1. 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和各类专业服务能力不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中，由于相关信息服务系统不完善，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状况、文化习俗、法制规范、投资政策等方面的信息缺乏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导致企业对外投资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收集信息，获取信息成本高、难度大、效率低、可靠性差，尤其对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活动只能通过网上收集零散信息。其次，由于国内金融、法律、财务、技术、人力资源等专业服务机构严重不足、服务能力较弱，难以为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活动提供国际化和专业化服务。此外，各类投融资产业基金的境外投资服务平台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

2. 金融服务能力不能满足对外投资发展需要。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主要以现金收购为主，并购融资效率低。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则主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融资完成跨国并购，通过母国汇出的资金量不到跨国并购资金的 1/10，9 成以上的并购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抵押贷款与信用贷款等融资手段筹集。其次，我国金融机构目前在

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不足，不能满足境外企业金融服务的需要。我国银行业境外机构覆盖面仅为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滞后，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还非常小。

3. 境外制造业基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能力滞后严重。随着国际产能合作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钢铁、矿业、水泥、玻璃、轻纺等传统制造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但普遍存在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建设成本高、交通运输距离长、采选成本高等问题。尤其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交通落后、电力设施缺乏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企业正常运行。

4. 对外投资服务保障组织机制不完善。政府协调能力有待提高，由于我国外交使馆缺乏政府层面的有力支持，企业在与东道国政府沟通时地位不平等，导致项目谈判受挫、拖延搁置的事情时有发生。各类商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协调对外投资谈判中的利益关系及提供市场信息、专业咨询、技术支持等方面能力较为薄弱。人才服务机制不完善，企业普遍缺少各类国际化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商务人才。

（三）政策层面

一是缺少对外投资立法。目前，对外投资管理政策主要由各部门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构成，没有统一立法可循，事中事后管理较为薄弱。二是投资便利化仍存在障碍。备案制程序复杂、周期长，延误企业海外并购商机；境外企业将海外利润进行返程投资在国内设立企业时视同外资，无法享受内资企业的政策；签证问题影响人员往来，国内人员因出境签证手续繁杂等造成企业内部人员往来不便，同时国外员工入境培训因签证难造成东道国员工无法进入国内受训，尤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供给造成很大影响。三是对外投资保险机制不完善。如，一些国家因汇率断崖式下跌给境外企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还没有纳入承保范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较多，由于东道国政策调整、政府更迭或经济社会振荡导致境外企业经济损失无法得到补偿等。

六、“十三五”时期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布局的主要思路

“十三五”时期应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树立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稳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挥我国产业优势、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重点围绕构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推动装备、技术、标准、品牌和服务“走出去”，培育一批世界级跨国企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和境外经贸合作园区，进一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科学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战略、产

业战略和市场战略，加快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在投资产业上，注重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重；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注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重。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产业结构层次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化解国内过剩产能及资源、能源、环境、出口等压力；另一方面，加速向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型投资，带动国内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投资主体上，注重积极发展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尤其要发挥民企在关键敏感产业的投资优势。在投资方式上，注重引导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获取跨国公司的关键技术、人才、品牌和销售渠道等战略资源，加快形成自主研发、自主品牌和自主营销渠道。

（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

1. 利用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制造业投资，构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推动高铁、核电、通信设备、航空航天等一批具有技术优势的制造业加快全球布局，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和服务。重点推动装备制造、工程机械、钢铁、家电、汽车、造船、纺织服装、水泥建材、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向东盟、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资源能源、土地等成本优势建立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引导境外企业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品结构、丰富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技术含量和服务水平。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产业配套能力和市场条件等因素，合理布局产能合作、装备制造合作的方向和重点。筛选经济社会效益好、东道国需求大的项目积极推进，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示范效应。支持国内冶金企业到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化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重点发展冶炼和深加工环节。支持制造企业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在境外设立加工组装、分销、售后服务基地和全球维修体系，带动装备和服务“走出去”。

2. 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加快形成全球研发创新体系和供应链体系。推动金融保险、商贸物流、研发设计、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服务业投资，为我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服务体系支撑，为制造企业境外生产提供系统配套服务，同时拓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鼓励制造企业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和科技园区，加快获取世界前沿技术、先进管理方式、新的服务模式、专业化人才、国际渠道等外溢效应。鼓励科技型企业与国际知名高校、实验室、跨国公司等机构开展研发合作，建立海外研发基地和产业化基地，拓展国家创新体系的全球化发展空间。鼓励商贸物流、跨境电商、广告营销等企业“走出去”，加快构建海外营销网络体系，提高我国企业品牌营销策划能力。提高软件信息技术和服务外包企业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

向市场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投资，推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标准；推动文化艺术、教育培训、中医药等特色服务业在海外设立机构，提高中华文化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加强各国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的服务平台建设。

3. 逐步提高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加强研究有关国家土地和农业投资制度，充分利用国外土地、水等资源和农作物资源。重点加强与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缅甸、越南、柬埔寨等土地、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投资合作。

（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布局

1. 逐步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与东盟、南亚、中亚、西亚及中东欧 16 国的投资合作，推进孟中印缅、中巴、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亚—西亚、中南半岛 6 大经济走廊建设。一是积极拓展沿线国家自贸区网络。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为我国企业向沿线国家投资创造有利外部环境。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引导作用。通过推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开发合作、产能合作和装备合作等推动制造及服务“走出去”，通过建设国际大通道中的通路、通讯、通航和通商等“主干道”加快轨道交通、信息通信、能源电力等产业投资步伐。二是加快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园区和制造基地建设。通过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形成面向“一带一路”、辐射全球的对外经贸合作园区网络，有序实现制造业产能转移。重点支持机械制造、汽车、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建材、轻纺等优势产业转移，力争在资源富集、劳动力密集、市场需求大、国内政局稳定的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引导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健康发展，实现与东道国共建共享。三是利用沿线国家的能源、矿产、海洋、农业资源优势，加强金属矿产等能源资源投资开发合作。“一带一路”区域覆盖了全球四大成矿域的 10 个重要成矿带，金属矿产种类齐全，应积极研究这些区域的金属矿产资源特征和分布，支持矿业企业勘查开发，推动建立境外资源基地。建立“一带一路”地质基础数据库、信息服务平台、风险监测系统。四是发挥我国香港地区对外投资平台的重要作用，强化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辐射功能，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信息和专业服务。

2. 积极深化对发达国家投资战略布局。一是加大对美国投资力度。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投资贸易对象国，建立双边稳定的投资贸易机制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应通过加快中美 BIT 谈判，加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建设，建立双向对等开放、互利共赢的投资机制，为我国企业在高技术、基础设施、制造业等领域赴美投资并购创造良好环境。尤其是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新政主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回

归等措施将加大吸收外资力度，为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创造了新的机遇。据美国商会估算，2013—2030 年美国在交通、能源、水务三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潜在投资需求达 8.2 万亿美元，应积极与美国达成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协议。二是大力推动对欧洲投资。欧洲各国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产业基础和先进技术，一直是我国企业投资的重点区域。英国是世界最发达、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在基础设施、高端制造、研发设计、金融、高科技等领域有巨大投资潜力，同时拥有化工、制药、生物技术、食品饮料、电子工业等世界领先产业；德国具有世界第一位的装备制造业，在 31 个机械制造门类中有 27 个占据世界前三位；北欧五国经济水平高，在先进制造、节能环保、ICT、生物医药等领域均掌握核心技术。我国企业加强对欧投资并购不仅风险小，而且有利于获取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经验等知识。应认真研究欧盟及其他各国的投资政策和环境，按照《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的目标，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积极推进中欧 BIT 谈判，加强与欧洲各国自贸区建设和双边投资协定，为我国企业在高技术、高端制造、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业领域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三是推动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投资合作。随着中韩、中澳、中新等自贸协定签署，将有利于促进双边投资加快发展。2015 年我国对韩国投资 1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6.3%；对澳大利亚投资 34.01 亿美元，主要分布在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物流及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3. 继续推进走进非洲战略。非洲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量巨大，工业化市场前景广阔，越来越吸引世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应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以援助为主的对非政策导向，加快市场化投资进程。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区仍存在贫困程度高、工业基础薄弱，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落后，以及劳动者素质低、政府效率低等问题，导致企业运营成本较高。但近年来，非洲地区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对于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实行高度自由的投资贸易政策，在法律与政策方面加强对外资保护与鼓励，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如，南非、加纳、纳米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投资环境日益受到投资者好评。非洲国家成立了许多地区性国际组织促进投资，包括东非共同体、东部与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等。应积极实施走进非洲战略，完善中非合作论坛平台，加强与非洲各国高层对话，加强中非民间投资合作。

（三）深入实施企业国际化经营战略

1. 加快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企业。培育一批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主导

国际分工的跨国企业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应支持引导企业通过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等方式配置全球资源，形成一批技术领先、实力雄厚、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大型跨国公司。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设立或并购研发中心，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鼓励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与东道国有实力的企业兼并重组，利用当地管理团队运营，实施工贸联合开拓市场。推动大型制造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构建全球服务体系，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跨国公司。鼓励民营资本通过并购或战略联盟等形式与国有资本相结合，将民企高效的机制与国企的资金和管理优势相结合“走出去”，提高我国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

2. 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民企已经在“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关键性领域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对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军工等敏感行业投资和重大海外并购项目上，许多国家对国企表现敏感，民企则更具优势。面对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中国资源掠夺论”等舆论偏见，我国长期“国企唱主角”的对外投资战略越来越遭遇困境。如，国企在金属矿产资源等领域投资往往被视为政府行为而遭到东道国的抵制，而民企则大多依靠自有资金或融资进行海外矿产投资，可规避更多的政治、规制和资金风险。因此，应消除思想认识误区、政策歧视和体制障碍，为民企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向国企与民企双轮驱动发展。一要放宽民企对外投资限制。逐步对民企境外投资项目采取登记制，对于重大投资并购项目要简化程序，切实提高效率。国家在重大项目、金融支持等政策方面应做到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二要加强金融保险政策支持。加大政策性贷款支持，适度扩大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对民企优惠贷款规模，完善对外投资贷款风险补偿金和贴息制度。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通过发展产业基金、投资基金，探索公私合作（PPP）方式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合作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解决民企融资问题。三要加快民企在“一带一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战略布局。鼓励民企投资高新技术、基础设施、海洋、能源资源、军工、农业等领域，构建全球产业链。

3. 提高企业融入、根植东道国的能力。引导境外投资企业遵循高标准社会责任（CSR）规则，将企业经营活动和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树立我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应注重维护东道国的根本利益和关切，切实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帮助东道国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消除贫困、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提高生态环保质量等方面树立标杆作用。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上，应本着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的理念，采用先进技术方法，严格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发展绿色矿业。应注重尊重东道国法律规范、文化宗教和民俗习惯，注重与当地媒体、社区进行沟通宣传，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如，欧盟作为

全球最成熟和发达的法律体系，对于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十分严格，其地理标识、保密信息、数据保护等均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我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如不重视就可能发生冲突而被起诉。应制定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社会责任标准、指导原则和行为指南，明确规定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以及不履行社会责任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强与国际 CSR 机构的交流合作，遵循国际规范和惯例。

4. 支持企业开展战略性跨国并购。从国内经济发展和“走出去”战略需要出发，引导企业跨国并购领域由化工、能源、矿产、汽车、家电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信息通信、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及金融、商贸、物流、文化等服务业拓展。探索设立并购基金或利用产业基金为并购企业融资。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搜集并购国企业的政策信息、并购规则等，给予企业风险和敏感提醒，尽可能避免“雷区”，同时向东道国做好宣传推广和渠道沟通工作，营造有利的并购外部环境。如，美国在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敏感产业清单分为两级：第一级是高度敏感产业，主要是与军事和国防安全相关的产业；第二级是敏感产业，主要是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产业，包括能源、电网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装备制造、生化等六大产业。并购这些领域的企业被 CFIUS 认为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

（四）加强对外投资促进保障体系建设

1. 提高对外投资信息服务和专业服务能力。整合各部门、各行业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养、风险防范等综合性服务工作。提高国内金融、信息、法律、财务、技术等专业服务机构的国际化、专业化服务能力，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设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投资银行等机构。建立综合性和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的境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公共信息搜集发布工作，注重发挥驻外使领馆和各级商会、贸促会、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作用，加强对东道国经济、文化、市场、法律等相关信息搜集，并及时公布投资指南、投资预警等信息，以有效降低企业投资并购中的冲突和风险。加强对外投资大数据建设，为企业提供各类相关资讯服务。

2. 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范体系。健全对外投资保护机制、预警援助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风险预警、投资促进、权益保障等便利服务。发挥政府外交渠道作用，增强驻外使领馆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经贸争端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帮助境外投资企业协调东道国关系和事务，畅通企业海外维权投诉和救助渠道。发挥当地商会、侨团等民间组织作用，切实维护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合法

权益。加强国际投资保护协调机制，我国目前已与 130 多个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应运用双边、多边协议与公约保护对外投资利益。此外，应注重加强目前对外投资增长过快的风险防控，严格对企业、个人投资真实性的审查，健全金融监管和担保制度，防止因企业过度贷款造成银行债务风险。完善涉外法律制度，建立与东道国合作机制，及时处置资本外逃、国有资产海外转移等贪腐犯罪问题。

3. 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按照“企业主体、市场主导、商业原则、国际惯例”的思路，加强国家对海外投资的宏观指导。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制定出台《对外投资法》，作为基本法律全面指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设立国家对外投资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制定国家对外投资战略、方针政策并协调相关管理部门，发挥部际协调机制的作用。二是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的融资、税收、保险等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支持、扩大保险范围、拓宽境外融资渠道，允许我国金融机构的境外分行向境外企业发放贷款。三是进一步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简化境外投资备案制的有关程序，放宽境外投资限制，启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四是加快完善国企境外投资相关法律、审计、境外经营业绩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海外项目评估制度，减少海外经营风险，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国企海外投资资本金管理制度，提高自有资金投资比重，防范金融债务风险；完善工商、税务、金融机构等监管监控体系。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5》，2015 年。
2. 商务部：《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6 年。
3.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 年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16 年。
4.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2016 年。
5. 陈超：《美国外资审查的最新动态与应对策略》，《全球化》2016 年第 10 期。
6. 李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研究》，《全球化》2016 年第 10 期。
7. 李文锋、李志鹏：《积极稳步推进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全球化》2016 年第 11 期。
8. 张健：《中国大力推动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研究》，《全球化》2016 年第 11 期。
9. 高凌云：《中国金属矿产对外投资的新进展及应对措施》，《全球化》2016 年第 11 期。
10. 程志刚、李蕊：《非洲国家投资政策与环境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全球化》2016 年第 12 期。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经济新变化中的新预期

谷源洋

摘要：2016 年世界经济发生了与以往三年不同的新变化，发达国家利率政策呈现更大的差异化，国际原油市场接近供需平衡的初期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初现经济复苏迹象，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逆风而行”但没有成为过去。全球经济继续复苏，部分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加强，增长新动能开始出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助于世界经济继续改善抑或相反，人们将拭目以待。

关键词：世界经济 货币政策 经济全球化 经济区域化 新变化 新预期

作者简介：谷源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十三五”开局之年，人们对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大体有三种判断：一是全球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稍高于上年；二是全球 GDP 增长率与上年持平；三是全球 GDP 增长率低于上年。由于世界经济金融权威机构的统计方法存有差异以及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认知不同，各方提供的数据亦有所差别，趋同性是 2016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主要依据是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缘政治危局造成经济破坏；欧洲难民潮对经济的冲击；英国“脱欧公投”及美国总统大选等多种因素。然而，上述抑制性因素并未都朝着恶化方向发展，与世界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几个重要因素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一、全球量化宽松的“盛宴”尚未散席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困局，先后启动量化宽松（QE）购债措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美日欧经济复苏的“动力”。然而，各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同，致使各国货币政策迥异，加剧了货币政策分化程度，具体有以下表现。

美联储已于 2014 年 10 月结束了资产购买计划，丢掉“QE 拐棍”，但这只是紧缩货币的起步，远非宽松政策的终结。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与美联储相比，不仅没有收缩银根迹象，且出现了加码宽松之势。日本央行年度资产购买规模已从 70 万亿日元扩大到 80 万亿日元，但仍没能实现 2% 的通胀目标，负利率政策也未出现理论意义上的日元持续走软，相反日元滑向升值通道。英国“脱欧”后，日元作为避险货币一度升值到 1 美元兑换 100 日元，给日本出口企业造成冲击。安倍首相和黑田行长宣称：“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进一步加大质化和量化的货币宽松政策（QQE）力度和规模”，而市场却普遍认为在安倍经济学被指“已达到极限”的背景下，新出台的 28 万亿日元的经济景气刺激计划依旧难以看到日本经济增长的前路。预计 2016 年日本实际 GDP 增长率为 0.5%~0.9%，低于 2016 年 1 月预估的 1.7%。日本央行不得不放弃两年内把通胀率提高到 2% 的时间表，采取“利率曲线控制”的所谓新政，亦即通过调整长短期不同的债券利率替代货币增发政策。

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表现稍好于日本。为保持 2011 年以来的渐进式增长趋势，欧洲央行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把每月购买债券规模从 600 亿欧元增至 800 亿欧元，并推行其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强调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欧元区的利率都要维持在低位，而且维持低利率的时间甚至远远超过资产购买计划结束的日期。欧盟委员会 2016 年 11 月 9 日发布的《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16 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增长 1.8% 和 1.7%。

发达国家利率政策呈现更大的差异化，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央行降息。自 2008 年 9 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来，全球已降息 654 次，全球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点。全球各银行已购买资产金融债务 12.3 万亿美元，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高达 23.4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与日本 GDP 之和，^① 其中有超出 10 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曾多次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但最终还是维持不住，不得不先后降息。英国“脱欧”公投后，英国央行于 2016 年 8 月初把资产购买规模从 3750 亿英镑增至 4350 亿英镑，并将基准利率从 0.5% 降至 0.25%，加入了降息的行列。央行实施负利率。正式宣布实施负利率的国家，已从 2015 年的 5 个国家增加到 2016 年的 6 个国家。日本央行和

^①美银美林：《全球利率几乎处于历史上最低水平》，《北京参考》2016 年 6 月 20 日。

欧洲央行分别于 2016 年 2 月和 6 月实施负利率政策，考虑到国际社会反应，没再轻易加码负利率。但有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由于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银行利率追不上通胀水平，成为“实际负利率国家”，央行启动加息进程。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后，立刻释放加息预期，并于 2015 年 12 月首次加息 0.25 个基点，但随后受多种因素变化驱使，美联储由“鹰派”立场转向“鸽派”立场，放缓了加息节奏，2016 年内加息预期由三次至四次变为一次。主要原因：一是美国经济不稳定。2016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欠佳，第二季度反弹乏力，但第三季度 GDP 增长 2.9%，比前一季度加快了一倍，全年实际 GDP 增长率虽低于 2015 年的 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为 2.6%），但或许能超出 2%；失业率为 4.9% 或以下；通胀率上升，核心通胀水平超过 2%。耶伦认为美国经济数据正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善。二是加息推动美元指数上扬，不利于美国经济增长。美元升值削弱其产品国际竞争力，抑制其出口；美元走高使其进口商品价廉，不利于提升通胀率；美元走强增加企业借贷成本，影响企业获利性；美元升值意味着债务利息的增值，加重约 19 万亿美元债务偿还负担。在美联储结束资产购买计划、释放加息预期及启动加息的三重作用下，美元指数曾几次突破 100 大关。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每当美元指数上涨 10%，美国贸易赤字就增加 2000 亿美元。英国“脱欧”后，全球避险情绪增强，资金流向美国购买美元资产，加速推动美元指数上扬。从历史经验看，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期间，美元指数多是走软而非走强。这次美元指数变化曲线也大体如此，在美联储释放加息预期的 14 个月里，美元指数升值幅度最高，而加息后的美元指数则上下波动，升值幅度不如加息释放期。从理论层面看，美联储再加息，特朗普“胜选效应”，继续推动美元指数走高，但不太可能长久停留在 100 的高位，更不会有西方学者所说的美元指数将升至 120。三是美联储首次加息后，遭遇到外部的强大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认为美国存在着劳动生产率下降及收入分配进一步两极分化等“逆风”，警告美国不要再“突然加息”。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1—2015 年，美国年均劳动生产率增幅为 0.34%，远低于 1990—2010 年的年均增长 1.8%，2016 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可能出现 0.2% 的降幅。美联储主席耶伦出席参议院的听证会时也曾表示过，困扰美国经济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低迷的状况可能还要持续下去，此外，美国经济还受到劳动力供给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及贫困人口占比处于高位等结构性问题困扰。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已不再单纯取决于美国自身“经济数据”变化，加息的频率还要受制于国际环境。美联储加息使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本流出、货币贬值、外汇储备减少、经济下滑，美联储不大可能在外部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脱离现实去考虑加息，而是要在国内经济与非美经济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加息带来负面溢出效应，但有

助于抑制资产泡沫，加速结构性改革进程。

负利率成为 2016 年全球金融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从理论层面看，负利率政策对实体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包括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刺激企业投资欲望，促使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又有逆向反作用，包括银行业收入减少甚至亏损，养老金投资收益率下降，家庭储蓄意愿低落，大量囤积现金，加剧通缩压力。负利率的实质是经济增长疲软，负利率不一定能使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产生有效刺激作用。相反，负利率将加剧流动性泛滥，促使货币贬值，债券收益率降低，加大金融风险 and 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负利率货币的现金持有者和货币基金的持有者。由于“负利率困局”，推行负利率的国家，包括欧盟和日本内部已出现了意见分歧，基本上维持现有负利率不变。

当前，发达国家抑或新兴市场国家，其货币政策空间日趋收窄，继续依赖于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和单一货币政策已难以激励经济增长。经合组织（OECD）警告“货币政策已超载”。高盛公司则认为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各国央行需要考虑与其他政策配合使用，平衡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要比单独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的提振作用或许更好。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 G20 领导人峰会强调要使用各种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带动各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鉴于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财政政策将会在支持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需要警惕的是全球货币宽松及负利率导致全球债务持续膨胀，152 万亿美元的全球债务规模埋下了引发危机的火种。值得引起关注的潜在变化是伴随通胀逐渐回升，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可能效仿美联储的做法，逐步削减资产购买规模和提升基准利率，届时全球将迎来紧缩银根的时代。全球流动性能否出现这样的拐点及何时出现，值得密切关注。

二、国际原油市场接近供需平衡的初期阶段

自 2014 年中期开始，国际油价直线下跌，到 2016 年 1 月，油价降至每桶 26 美元。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油价经历的五次大跌相比，这次油价下跌的更深、持续的时间更长。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包括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多种因素推动美元指数升高；国际资本的不断恶性炒作；欧佩克内部严重失和，沙特与伊朗博弈加剧；沙特从以往的“减产保价”转向加速生产与出口，扩大原油市场占有份额。沙特石油策略变化使美国油井数量持续减少，原油产量从 2015 年 5 月日产 960 万桶降至 2016 年 8 月的日产 860 余万桶。低油价导致美国失业人口增加，并影响美国通胀率上升。

油价是市场关注的经济风向标，油价下跌的本质是一种国际财富的转移，即从原油

出口国向原油进口国转移一部分经济利益。IMF 预计 2015 年中东“石油美元”减少了 3900 亿美元，2016 年石油收入及其他经济损失将高达 5000 亿美元。石油收入锐减转化为预算赤字增加及经济下行或衰退，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5 年 3.3% 放缓至 2016 年的 1.8%。尽管产油国富有，拥有巨额“石油美元”，但也难以承受低油价长期化。沙特 2015 年财政预算赤字高达 980 亿美元，2016 年将超出 1000 亿美元。由于陷入财政困境，沙特被迫首次面向国际市场发售 175 亿美元债券，以阻止经济下行。当今油价变动走势已不是由经济因素主导，而是受政治因素左右，是欧佩克内部、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尤其是沙伊、沙美之间的一场意志较量，因而油价变化莫测，令人难以捉摸，油价涨跌预期大相径庭，许多著名投行对油价的预测均陷入“预测漩涡”。

国际原油市场始终存在油价持续下跌与反弹上涨的两种趋势博弈。油价有涨就有跌，有跌就有涨，供求关系总是在不平衡中走向平衡，在平衡中走向不平衡。油价跌、产量增是“逆规律现象”，无疑是不可持续的。预期油价触及底部的声音越来越强，国际能源署等机构均认为国际原油市场供求即将接近平衡的初期阶段。主要依据是伊拉克、伊朗重回原油市场，伊朗日产原油已接近制裁前水平，欧佩克油产量已达到 8 年来的高点，未来持续增产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非欧佩克原油产量减幅超过欧佩克增产幅度，特别是美国原油产量稳定下降，一些高成本的油井正在自然检修和关闭，原油产量的增产效应递减，致使全球原油总产量较上年减少。油价暴跌导致国际原油领域投资骤降，而全球依然保持货币宽松局面，美联储即使是再加息，美元指数也难以狂升。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世界经济仍在继续复苏和增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经济体对原油需求旺盛。国际能源署预计 2016 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长预期 120 万桶/日，2040 年前原油需求将持续增长，只要产油国不再增产，就具备了油价上涨的条件。

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分别占全球原油产量的 13% 和 12.4%，两国已多次接触，愿意联手推动产油国“冻产”甚至“限产”，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动向和新变化。2016 年 9 月 28 日，在阿尔及尔国际能源论坛后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欧佩克达成了共识，同意将日产目标设定在 3250 万至 3300 万桶。市场普遍认为由于利益各有所求，产油国从达成共识到签署协议难，即使是签署协议，遵守和执行协议也难。但不管“冻产”或“限产”最终能否成为现实，国际原油市场最坏的时期已过。预计 2016 年平均油价高于 2015 年，大约在每桶 40 至 50 美元区间上下浮动，没有出现高盛及摩根斯坦利所预测的国际油价将跌至每桶 20 美元以下、更没有出现渣打银行所预测的跌到 10 美元的状况。但市场主流观点强调，一旦原油价格长期维持在每桶 60 美元以上，又势必会刺激页岩油重新增产，再次打破供需平衡，推动油价下行。国际原油市场由供给方和需求方组成，需求方要的是供给

安全，供给方要的是需求安全，维持“中性油价”对产油国、消费国以及世界经济均有利。

三、新兴市场国家初现经济复苏迹象

2016 年新兴市场国家依然面临不确定性，各有各的难处，但与 2016 年初相比已发生许多变化。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看好，在上年增长 6.9% 的基点上，2016 年又可增长 6.6%~6.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 25% 以上。美国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若无中国，世界经济已陷衰退”。^① 可以预期，一旦渡过“三期垒加”的特殊时期，中国经济将会变得更好，继续发挥“经济航空母舰”发动机的关键作用。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及国际油价一定程度的回暖，2016 年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巴西财政部认为，在连续两年陷入衰退后，企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增强已对多个经济领域产生了促进作用。2016 年尽管巴西经济为负 3.3%，但其衰退幅度收窄，小于 2015 年的负 3.8%，2017 年巴西经济将会“触底反弹”，但通胀率和基准利率尚高，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结构性改革重振经济并不容易。

2016 年俄罗斯经济形势远强于巴西，主要有三点新变化：首先，经济增速加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俄罗斯经济衰退正在结束，即将出现缓慢的经济增长态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 2016 年前三季度 GDP 下降 0.7%，俄罗斯央行专家认为 2016 年经济仍将下降 1.8%，但远好于 2015 年的 -3.7%。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和央行均预测 2017 年经济恢复到正增长的概率增大，但其经济增幅依然较低。其次，外汇储备有所增加。随经济形势改善及国际油价回升，扭转了前两年外汇储备锐减的颓势。据俄罗斯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8 月 1 日，俄罗斯外汇储备约 3940 亿美元。卢布兑美元汇率从暴跌转向稳定回升；再次债务规模不大，主权债务占 GDP 的 13%。为弥补财政赤字，正在不断拓展新的资金来源。未来 3 年计划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筹资 160 亿美元。最后，粮食产量增加。2016 年俄罗斯粮食产量预计达到 1.13 亿~1.16 亿吨，与其 2014 年粮食产量基本持平，但高于 2015 年的 1.05 亿吨。^② 俄罗斯粮食联盟预计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俄罗斯粮食出口量将达 3850 万吨，^③ 恢复粮食出口大国地位。上述新变化为俄罗斯社会安定和市场稳定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其应对欧美制裁更加有底气。

尤为令人关注的是 2016 年新兴市场国家资金状况发生了系列新变化：一是全球市场

^① 斯蒂芬·罗奇：《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016 年 10 月 24 日。

^② 《2016 年俄粮食总产量为 1.2 亿吨，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连塔网，2016 年 8 月 16 日。

^③ 同②。

对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的担忧程度降温，资金净流入规模扩大，致使新兴市场国家的流动性处于近年来的最好水平；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和债市的收益率高于发达国家，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新兴市场国家债市、股市依然表现较好，国际投行加速进入寻求高收益投资。美国媒体宣称“新兴市场不是天堂，但它们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① 三是受全球货币宽松预期影响，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看涨，2016 年 1—9 月，除少数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下跌外，其他国家货币普遍上涨或保持相对平稳。然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央行通过降息等途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再加息以及美国股市仍具吸引力等因素，让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难以延续强势；四是基于对投资报酬率的追求，资金的避险投向发生改变，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对冲基金将原先主要把资金投向美元和日元债券进行避险，而 2016 年避险资金却涌向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高收益债券成为资金投资的避险港湾；五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经历 18 个月下滑后开始恢复增长。摩根士坦利的数据显示，2016 年 1—7 月，31 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总和增加了 1000 多亿美元，外汇总储备达到 6.75 万亿美元。^② 六是人民币加入 IMF 的 SDR 货币篮子，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新里程，加大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直接投资货币的力度。

鉴于上述利好新变化，IMF 将 2016 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 4.1% 调升到 4.2%，高于 2015 年的 4.0%，而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 2015 年的 2% 下调到 2016 年 1.6%。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前景改善，法国《世界报》撰文称“南北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自 2011 年以来持续缩小，但如今再度拉大”。^③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将继续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但“南高北低”的增长趋势不会逆转。

四、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逆风而行”

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把英国“脱欧”视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IMF 官员称如果没有英国“脱欧”公报，原本打算上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但英国“脱欧”拖累了世界经济。

来自各方面的评估报告显示，英国“脱欧”造成三重经济影响：第一，对英国经济影响。IMF 评估报告认为 2016 和 2017 年英国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7% 与 1.3%，比公投前预测值降低 0.2 和 0.9 个百分点。德意志银行发布的《全球宏观经济展望》报告则将

①《为什么新兴市场发展得顺风顺水》，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6 年 7 月 22 日。

②《新兴市场外汇储备下滑 18 个月后恢复增长》，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6 年 8 月 17 日。

③《新兴国家重新吸引外资》，法国《世界报》，2016 年 8 月 17 日。

2016 年和 2017 年英国 GDP 预期下调至 1.7% 和 0.9%。然而，欧盟委员会《秋季经济展望报告》改变了早先“脱欧”将使英国经济“大幅减速”的提法，把 2016 年英国 GDP 增长率预期从 1.3%~1.6% 上调至 1.9%，但却保留 2017 年英国 GDP 增长 1.0%~1.1% 的预期不变。所有评估报告提出的增长数据均低于英国 2010—2015 年 GDP 年均增长 2% 的水准。

第二，对欧元区经济影响。英国“脱欧”通过“不确定性、投资、贸易和难民”等渠道抑制欧元区经济增长，欧盟委员会预计 2016 年欧元区 GDP 增长率为 1.7%，2017 年降为 1.5%。

第三，对世界经济影响。英国作为单一国家在世界经济占比不是份量很重，“脱欧”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不大，“脱欧”公投结果发布后，IMF 仅将 2016 年和 2017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各下调 0.1 个百分点，分别为 3.1% 和 3.4%。其他评估报告提供的数据同上述数据并无多大差异，但各评估报告显示四个趋同点：一是“脱欧”对英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大于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对欧元区经济的影响大于对美国、日本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脱欧”作为区域性事件加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但其影响力较为有限。二是年内没有启动“脱欧”进程，对英国、欧元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抑制作用稍为减弱，实际经济表现比市场早先预期要好，但 2017 年“脱欧”影响将会有所加重。三是“脱欧”进程缓慢，不确定性持续时间越长，各相关方付出的过渡成本就会越高。在英国国内，有人支持“软脱欧”，力主尽最大力量和努力获得欧盟单一市场准入；有人则支持“硬脱欧”，强调英国“收回主权”，牺牲欧盟单一市场准入也要加强移民管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指出所谓“软脱欧”与“硬脱欧”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是一些人还不能接受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这一表述意味着特蕾莎·梅倾向于“硬脱欧”。欧盟依然坚持人口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动和服务自由流动不可拆分的原则，只要英国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就不可能享有欧盟统一市场的资本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动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权益。不管英国选择“软脱欧”还是“硬脱欧”，都势必促发资产外流、通货膨胀上涨、债务负担加重、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及英镑走软，但英国出走欧洲大家庭对英国、欧盟和欧元区并非只有其害而无其利，需要从利弊两个方面全衡“脱欧”影响。四是英国“脱欧”加剧全球化和区域化两大趋势的受挫感。

经济是保障欧洲一体化的基石和保障，继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时出现债务危机，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加重欧洲困局，包括高失业率、低增长率、低通胀、民众生活水平下滑，已将欧盟和欧元区推入信任危机。英国脱欧派指责欧盟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导致英国工作岗位流失及社会福利减少，卡梅伦首相利用脱欧派指责和人民不满情绪，进行“脱欧”或者“留欧”公投的“政治赌局”，旨在施压欧盟给予英国更多的优惠。实际上，长期以来英国作为欧盟成员一直在与布鲁塞尔“讨价还价”。

2016 年 7 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先后公布的竞选纲领，进一步加剧反全球化和区域化。民主党纲领宣称“反对不支持美国就业、增加工资和改善国家安全的贸易协定”。共和党纲领说得更加直白，“美国经济最伟大的资产是辛苦劳动的美国人，共和党的首要工作就是创造就业，帮助他们回到工作岗位”。^① 西方某些人士甚至鼓吹所谓大象曲线理论，即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发达国家则是受损者。实际上，全球化抑或区域化不是零和游戏，西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吃的饱饱的。共和党纲领指出“我们需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来谈判更好的贸易协定。当那些协定没有充分地保护美国利益、美国主权时，那就拒绝它们。”美国政客和精英的言论与欧洲民粹主义隔海呼应，将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推向了新浪头。

反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区域化遭受到的挫折，但其影响却是全球性的。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最近几年，市场保护等多重因素已导致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世界贸易组织（WTO）将 2016 年国际贸易增幅从 2.8% 下调到 1.7%。因此，必须正视反全球化和反区域化现象或逆流，认真总结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教训，推动全球化和区域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需要动员全球力量反对形形色色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需要动员全球力量建立共享、协调、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机制，把区域自由贸易和全球多边贸易统筹起来，加快构建以全球价值链为指向的贸易治理体系；需要动员全球力量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力促金融监管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合作，提高国际金融市场韧性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挑战能力；需要动员全球力量坚定对全球化和区域化信心，继续推动全球化和区域化深入发展。欧盟依然是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发展及金融秩序调整的重要力量。英国与欧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特雷莎·梅已表示将寻求英国和欧盟“机遇最大化”，欧盟则声称不会对英国采取报复措施，因而不必担忧英国“脱欧”会像美国金融危机那样迅速演化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不必担心欧盟和欧元区解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欧元地位在下降，但欧元消失的概率甚微。但欧盟和欧元区需要重视并解决经济增长乏力、失业高企、债务膨胀、难民流入、恐怖袭击或威胁，以及南北欧发展不平衡等问题。2017 年法国和德国将进入选举年，极右翼党派和其他类似政党有可能利用业已存在的种种问题，加深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反感与疑虑，将欧洲推向较长时间的动荡期。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欧美出现的“逆全球化和区域化”现象，其实是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的利益再平衡。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言称在

^①陆振华：《从新党纲看美国两党贸易政策》，《21 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 8 月 3 日。

“脱欧”后将把英国变成自由市场的捍卫者。美国共和党也难以舍弃自由贸易政策，特朗普上任后，作为美国新总统，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会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对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态度将更加强硬，必然导致美国同日本、欧洲及新兴市场国家贸易、投资矛盾加深。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全球化进度将不如以往那么快速，经济区域化会出现局部反复甚至倒退，全球化和区域化将迎着“逆风而行”，但全球化和区域化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成为过去”。根据 WTO 数据，在 WTO 备案的各种称谓的自由贸易协定达 277 个，全球企业并购红红火火，货物贸易增速下降，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占优势的服务贸易，在过去 10 年年均增长 6.5%，远远超过了全球名义 GDP 和全球商品出口的增长。更令人关注的变化是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暗流涌动时期，欧盟和加拿大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新兴经济体仍在继续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包括韩国已与中美洲六国达成自贸协定，中国继续支持并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市场保护主义是零和博弈，短期对市场保护国有利，但长期则必然是双输或多输，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与判断，全球经济继续复苏，部分经济体抗风险能力加强，增长新动能开始出现。^①按 IMF 统计标准衡量，2016 年世界 GDP 增长率不应低于上年的 3.1%，但经济增长仍弱于预期，不及过去 8 年年均 3.5% 的增长水平。英国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顾问委员会主席梅格纳德·德赛认为，“金融危机前的大缓和时代（1985—2007 年）已经成为过去式”。在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和全球经济动能转变的重要时期，不确定因素、风险、挑战、矛盾、投机等无处不在，世界经济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是需要有信心，没有信心比失去黄金更危险。李克强总理 2016 年 8 月 22 日同世界银行、IMF、WTO 及 OECD 领导人举行圆桌对话会时说，“尽管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但世界市场有潜力、人类有智慧攻坚克难，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把实现强劲、可持续、平稳增长作为一致努力的目标”。G20 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更是指出，“我们坚信，二十国集团建立更紧密伙伴关系，携手行动，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增进合作，促进普遍繁荣，造福各国人民”。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新华网，2016 年 9 月 5 日。

软件贸易强国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分析

杜振华 和佩珊

摘要：从软件贸易大国到软件贸易强国是软件产业转型升级所要达到的目标。软件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志表现为：软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较大，掌控出口软件的知识产权和国际议价能力，出口软件中以知识产权为主，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软件品牌或软件服务的国际知名度高。中国当下适应国际化市场发展能力较弱，但竞争力逐渐提高；输出软件产品增长，但缺少高端软件；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较弱，处于国际软件产业价值链低端，但基础正在逐渐增强。目前软件产品安全问题给国内软件企业提供了契机，国内广阔市场为软件产品的进口替代提供了可能性。国内软件企业可以通过软件产品开发逐渐完成进口软件产品的替代，进而完成软件出口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软件产业 进出口 贸易强国

作者简介：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和佩珊，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加快建设软件贸易强国，对于中国这样的软件大国来说十分迫切，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具有战略意义。

一、建设软件贸易强国的重要意义

软件贸易强国指在国际软件交易中，从软件标准控制、交易数额、售后服务及科技含量、自主知识产权占有、质量及品牌的知名度上都名列前茅，能够控制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定价权，对世界信息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一）建设软件贸易强国是信息时代的强国之本

软件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软件贸易可以通过国际间的交换不断将各种先进适用的软件提供给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并通过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方面的应用，不断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在 2005—2015 年中，除 2007 年和 2015 年两年软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现上升态势。“十二五”期间，中国软件出口额由 2011 年的 143.39 亿美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333.93 亿美元，增长 1.33 倍，年均增长 23.53%，高出同期 GDP 增速 14.8 个百分点。图 1 可以看到，我国软件规模在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开始进入平缓增长阶段，但最低增速也保持在 11.1% 的两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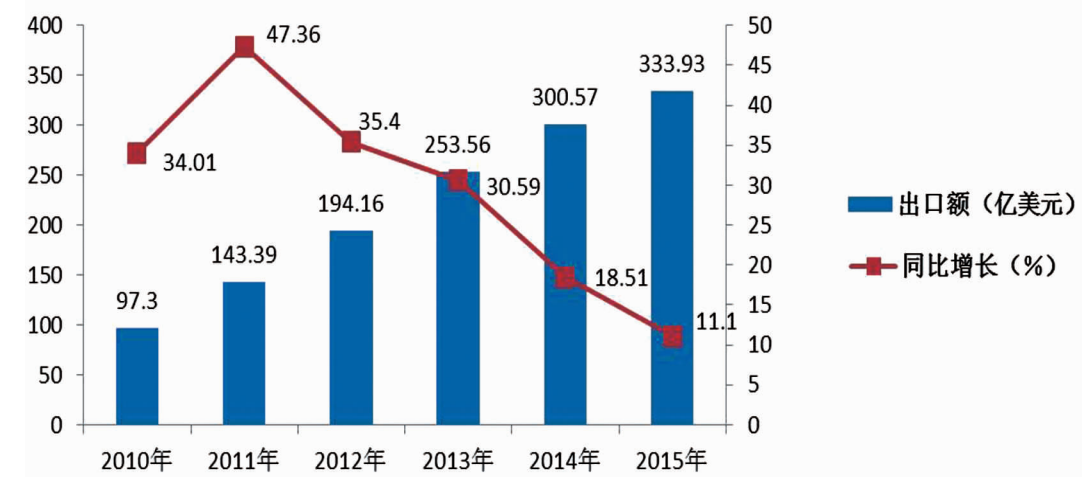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5 年软件出口规模与增速

数据来源：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注：软件出口金额不包括嵌入性软件。

（二）建设软件贸易强国是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

中国 2013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中国出口主要以低附加值的资源依赖型商品为主，甚至一些是加工贸易，这种出口结构使中国在 2013 年成为世界上消耗资源最

多的国家。要改变这种状况，使中国由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软件出口结构至关重要。中国软件市场规模早在 2011 年便仅次于美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了，但中国还不是软件贸易强国，今后的目标是，将软件与互联网深度耦合，与硬件、应用和服务紧密融合，推动中国出口结构逐渐由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占较大比重转变，由低附加值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智能制造转变，软件出口由低附加值的信息技术外包为主逐渐向以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外包和自主知识产权为主的软件产品出口转变。

（三）建设软件贸易强国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软件贸易强国将发挥重要作用。软件业可以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催生出高附加值、绿色低碳的新兴产业，为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技术支撑。随着信息技术向各领域的渗透，软件业不仅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互动性显著增强，引发了诸如智能制造、3D 打印等新的制造方式，同时还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信息消费等新消费形态的迅速崛起。

（四）建设软件贸易强国是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方面

中国是一个近 14 亿人口的大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软件贸易正在成为新兴服务贸易出口的新增长点，带来众多的知识型就业机会。图 2 所示，中国软件行业从业人员从 2010 年的 2603115 人发展到 2015 年的 7805145 人，增长了 2 倍。同时，软件贸易强国通过拥有大量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出口，站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使人力资源获得较大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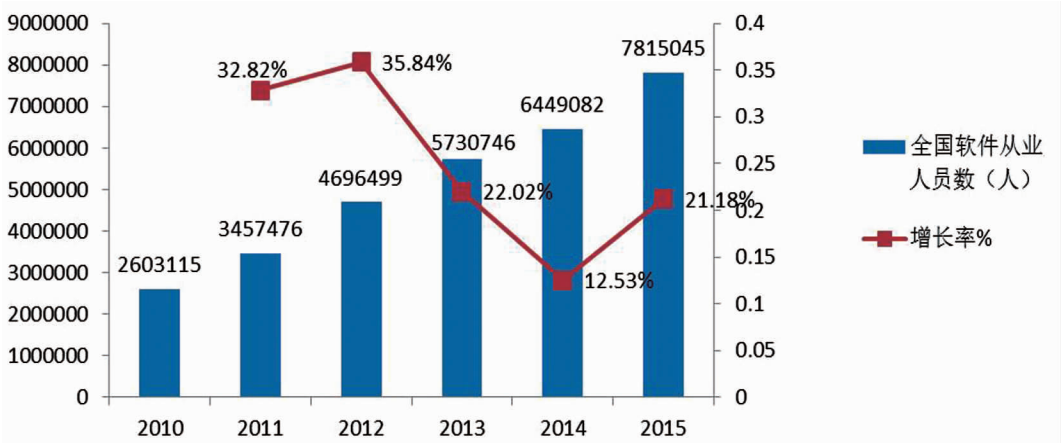


图 2 2010—2015 年中国软件从业人员规模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五）建设软件贸易强国是加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软件贸易强国可以通过高水平的国内自主研发能力，使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棱镜门事件及各种网络安全事件使网络安全上升为各国的国家战略，“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已成为共识。根据信息技术研究和顾问公司高德纳（Gartner）公布的数据，2014 年全球安全软件收益总额达 214 亿美元，相比 2013 年的 203 亿美元增长了 5.3%。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正在改变世界和市场的规则，也使国家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脆弱性。自主可控的软件在保障“总体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

二、软件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志

（一）软件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较大

软件贸易强国首先表现为一国软件贸易在整个贸易中的比重占有较大份额，或虽未占有较大份额但却呈现大幅提升的强势增长。从世界软件贸易规模来看，除欧盟作为整体在软件出口占据最大份额而不具可比性外，2013 年爱尔兰、印度、美国、中国依次占有的份额分别为 21.05%、20.26%、7.45%和 6.31%。表 1 的 2004—2013 年软件出口数据说明爱尔兰、印度、美国、中国虽然仍在世界软件贸易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各国实力已经发生变化。印度呈缓慢的先上升后下降态势，波峰出现在 2008 年。爱尔兰和美国均呈现较大幅度下降，10 年间分别下降 5.45 和 4.84 个百分点。中国呈现稳步上升态势，10 年间上升 4 个百分点，中国的软件出口显示出逐渐增强的竞争力。

表 1 2004—2013 年主要国家或经济体软件出口占世界软件出口比重（%）

国家或 经济体\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	2.31	2.33	3.04	3.50	4.04	4.32	5.01	5.69	6.45	6.31
欧盟	40.25	38.98	39.85	39.80	40.83	42.04	45.59	44.00	43.52	43.80
印度	17.15	20.38	21.94	22.11	23.21	21.42	21.09	21.26	21.04	20.26
爱尔兰	26.50	24.84	23.57	23.92	22.63	22.42	19.98	20.41	20.45	21.05
日本	1.47	1.43	0.99	0.78	0.61	0.57	0.57	0.56	0.60	0.74
韩国	0.04	0.07	0.25	0.27	0.20	0.14	0.13	0.20	0.21	0.38
美国	12.29	11.96	10.35	9.62	8.49	9.09	7.64	7.87	7.73	7.4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盟委员会 2014 年数据整理而得。

(二) 掌控出口软件的知识产权和国际议价能力强

一国出口软件的知识产权含量决定了本国在国际软件市场上的国际议价能力和利润空间，反映着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各国都通过法律对软件予以知识产权保护，掌握出口软件的知识产权，也就必然具有很强的国际议价能力和垄断市场的能力。

美国从 1964 年首次接受计算机软件的版权登记开始至今，大规模通过外交、经济、法律等途径，推动全世界软件立法走入版权保护轨道，这使美国软件强国的地位难以撼动。欧盟、爱尔兰、印度、日本等先后建立了软件保护法，中国目前通过《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保护软件知识产权。2015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 292360 件，较 2014 年增长 34%。图 3 为 2006—2015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规模变化情况。可以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规模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当然，这期间也经历了 2008 年高达 93% 的急剧增长，最低增长也达 14%（2007 年），说明中国企业掌握控制出口软件知识产权的能力在迅速增强。而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增强，预示着中国软件出口中国际议价能力的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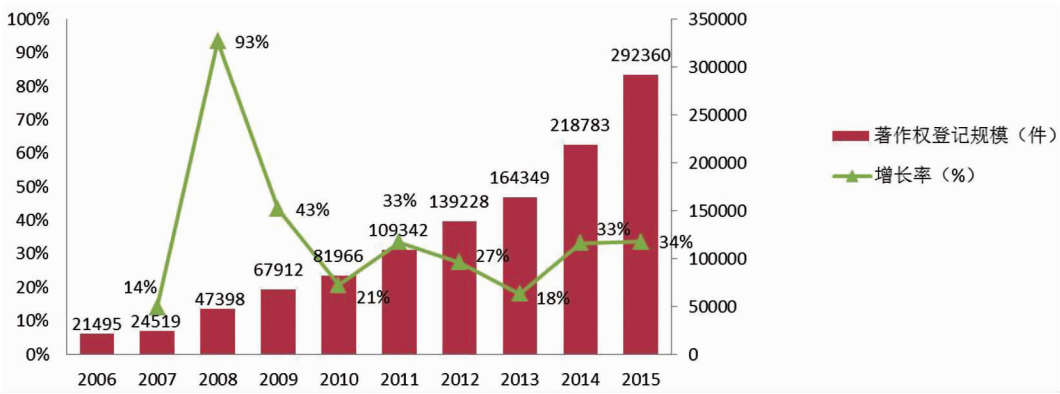


图 3 2006—2015 年中国软件著作权登记规模（件）及其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2006—2014 年各年数据来自中国软件协会《中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2015 年数据来自国家版权局。

(三) 出口软件中以知识产权为主

软件贸易强国应主要以独创性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出口和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服务为主。它是衡量软件出口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目前易于形成产业规模的系统软件、中间件、安全软件、企业资源计划（ERP）产品、高端应用软件及服务几乎被微软、甲骨文、谷歌、IBM 等跨国企业所垄断，它们通过知识产权的垄断构成软件市场进入壁垒。整体上看，中国软件出口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外包上，较少的软件产品也是集中在低端业务、附加值不高的应用类软件上，技术含量高的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较少。因此，拥有知识产权优势对于夺取高附加值的国际软件市场份额，形成竞争优势至关重要。

（四）软件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作为软件贸易强国，软件出口企业应具有人力资本的雄厚实力。软件竞争使软件产业的国际分工快速形成。美国是软件业的发源地，拥有微软、甲骨文、谷歌、IBM 等大量在全球处于核心地位的软件企业，其国内软件产业的消费能力和供给能力都很强，既是巨大的软件消费市场，又是各类软件产品的出口国，并把软件开发设计的中低端部分外包给其他国家。日本的软件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依赖其发达的生产制造业，形成了以嵌入式软件为代表的软件产业。近年其动漫和游戏产业发展很快，通过发包与其他接包国形成配合。俄罗斯和以色列利用技术力量较强的优势承接了高端的研发类软件开发。爱尔兰和印度则分别面向欧美市场进行软件产品开发。菲律宾利用其较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成为全球“业务流程外包”和“数据中心”的理想场所。中国软件出口企业由于规模较小，信用度偏低，缺乏严格的质量论证和规范化管理，不能有效与国际标准接轨，这使中国软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五）软件品牌或软件服务的国际知名度高

软件贸易强国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软件品牌或软件服务的国际知名度高。美国凭借诸多的知名软件品牌使自己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90%以上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软件及网络浏览器等基础软件和大部分套装软件的高端软件产品被美国垄断。使美国居于软件业价值链的控制核心技术、体系结构和标准制定的上游地位。印度凭借其软件的优质服务占领了软件技术外包的高端市场。中国目前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软件市场。国产软件逐渐被国人接受，以金山 WPS 办公软件为首的国产办公软件在网民中的认知度迅速提高，高达 90.2%。杀毒软件方面，国产软件已占据 80%以上份额。管理软件市场甲骨文和 SAP（应用与产品系统公司，一家德国软件公司）与国产厂商用友、金蝶等出现了不分伯仲状态。但中国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手机操作系统由于缺乏品牌的国际认知度，仍然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因此，软件贸易强国必须形成一批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出口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软件品牌及国际认知度高的出口骨干企业。

三、中国软件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软件出口现状分析

1. 软件出口在世界软件贸易中的位次变化

中国软件贸易在世界软件贸易中的位次基本没有变化，始终保持在第五，但进步不

容忽视。中国软件出口占世界软件出口的比重从 2004 年的 2.31% 提高到 2013 年的 6.31%，仅比第四名的美国少 1% 左右。

从软件实力看，根据 Gartner 的研究报告显示，2013 年全球软件收入达到 4033 亿美元，微软公司以 657 亿美元营收蝉联并高居世界榜首，排在第二、三、四的甲骨文公司、IBM 和 SAP 分别为 296 亿美元、291 亿美元和 185 亿美元。这四大软件厂商的收入占全球软件收入的 35%，说明四大软件厂商在软件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中国软件前 100 家企业 2014 年实现业务收入 4751 亿元，比 2013 年的 3666 亿元增长 29.6%，按照 2013 年和 2014 年汇率^①计算，分别为 592 亿美元和 773 亿美元，中国前 100 家软件企业的实力也抵不上美国微软一家的实力。2013 年微软软件业务收入是中国第一名华为的 3.35 倍，说明中美软件企业实力相差很大。

2. 软件出口市场的集中度

中国软件业规模从 2008 年到 2015 年，增长了 4.71 倍（如图 4）。其中“十二五”期间，中国软件产业规模从 2011 年的 18468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43249 亿元，增长了 1.34 倍，同期软件出口规模从 257 亿美元增长到 545 亿美元，增长了 1.12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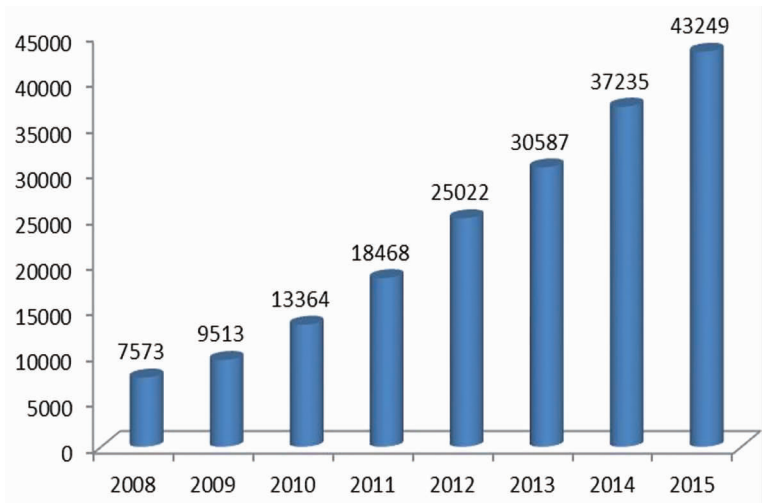


图 4 2008—2015 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业务收入（亿元）

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 年中国信息技术服务市场发展概况》，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 年 07 月 13 日。

（1）中国软件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亚洲是中国软件出口的主要市场。2015 年

^①2014 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 6.1428 元人民币，2013 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为 6.1932 元人民币。

出口占比为 47.65%。从出口的国家 and 地区看，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中国主要出口地。2015 年三地占中国软件出口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26.19%、12.92% 和 11.94%，美国近年来一直是中国软件出口的第一大国。

(2) 软件出口主体主要是外商和民营企业。中国软件出口按企业性质分，外商独资企业独占鳌头。2012 年以来，外商独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急剧增长。2014 年外商独资企业执行金额（出口）占比达 43.84%，比 2012 年扩张了 18.86%。其次是民营企业执行金额占比 38.32%，比 2012 年扩张了 19.31%。中外合资企业与国有企业执行金额占比急剧下降，与 2012 年相比，分别缩减了 22.87% 和 14.64%。中国虽然是软件出口大国，但外商独资企业却几乎支撑了半壁江山。

(3) 软件出口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中国软件出口中，信息技术外包（ITO）是主要方式。2012—2015 年软件出口执行金额中，信息技术外包占比由 97.29% 下降到 2015 年的 94.88%，软件产品占比由 2.71% 提升到 5.12%，说明中国软件出口的总体结构在改善。但从全球来看，2014 年全球软件产业结构中软件产品占 25.1%，信息服务占 74.9%。^① 而同年中国软件产品出口额仅占软件出口的 2.4%，信息服务占 97.6%。如果从一个较长时期考察，2010—2015 年中，软件产品出口占软件出口的比例则呈“V”形变化，由 2010 年的 5.8% 逐年下行到低点 2013 年的 2.2%，然后开始上行，从 2014 年的 2.4% 再到 2015 年的 5.1%，仍低于 2010 年的占比（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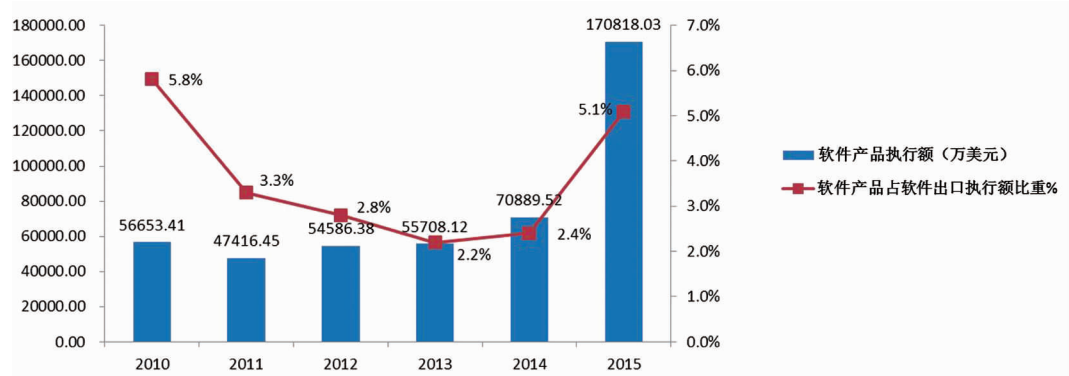


图 5 2010—2015 年中国软件产品出口及其占软件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再从软件产品出口的内部结构看，附加值较低的应用软件占比由 2012 年的 75.61% 上升到 2015 年的 79.87%，不仅仍然占软件产品出口的主要部分而且还在增强。附加值较高

^①智研咨询：《2016—2022 年中国软件市场运行态势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7/427705.html>。

的系统软件和支撑软件分别由 2012 年的 22.78% 和 1.61% 下降到 2015 年的 19.83% 和 0.3%。说明中国软件出口的内部结构正在恶化。

（二）中国软件贸易比较优势的国际比较

国际上一般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从表 2 可以看出，2004—2013 年，中国软件出口的 RCA 指数在 0.20~0.37 之间，说明软件出口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 RCA 指数呈平稳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比较优势正在改善并增强。印度和爱尔兰的软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爱尔兰，其软件贸易比较优势最强，RCA 指数在 8.91~10.41 之间。印度 RCA 指数自 2007 年以来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 2007 年的 7.83 下降到 2013 年的 5.23。欧盟的软件出口具有较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且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2010 年以来 RCA 指数一直在 0.7 及以上。美国 RCA 指数 10 年来呈下行态势，从 0.60 下降到 0.40，说明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下降。日本、韩国的软件产品并未呈现出明显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表 2 2004—2013 年中美等国/地区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RCA 指数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	0.22	0.20	0.23	0.25	0.28	0.29	0.32	0.35	0.37	0.34
欧盟	0.50	0.49	0.52	0.53	0.55	0.58	0.73	0.70	0.71	0.71
印度	7.80	8.11	8.18	7.83	7.93	6.33	5.73	5.59	5.51	5.23
爱尔兰	9.83	9.65	9.95	10.28	10.16	8.91	9.75	10.29	10.22	10.41
日本	0.14	0.14	0.10	0.09	0.07	0.07	0.07	0.07	0.08	0.11
韩国	0.01	0.01	0.05	0.06	0.04	0.03	0.02	0.03	0.04	0.07
美国	0.60	0.59	0.52	0.52	0.46	0.46	0.42	0.44	0.41	0.40

数据来源：中国、印度、爱尔兰、日本、韩国、美国数据来源于 WTO（该六国统计口径为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欧盟数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统计口径为通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三）中国软件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国际比较

一般用贸易竞争力（TC）指数来评估一国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004—2013 年的数据表明（表 3），中国在软件信息服务方面的 TC 指数均为正值；其次，爱尔兰、印度在软件信息服务方面的总体竞争优势明显。

具体看，2004—2009 年中国的软件出口只有微弱的竞争优势，除 2005 年比上一年降低幅度较大外，其他各年均有一定的增长，且 2010—2013 年以来，逐渐呈现出较强的竞

争优势，并在 2012 年达到峰值 0.58，但 2013 年又下降为 0.44，与印度相差较大。印度软件信息服务的 TC 指数始终在 0.7~0.9 区间浮动，说明印度软件信息服务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爱尔兰软件信息服务的 TC 指数 10 年来几乎都接近于 1，绝对优势明显，表现出极强的竞争优势。欧盟的竞争力水平始终维持在 0.20~0.28 之间，竞争力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缓慢上升势头，并在 2014 年迅速增长到 0.36。美国、日本和韩国软件出口的竞争力优势并未表现在贸易金额上，从数据上来看，三国的软件出口总量不具有竞争力优势，但他们由于掌握软件产业核心技术，处于产业价值链高端，所以依然凭借相对较低的出口额，攫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

表 3 2004—2013 年中美等国/地区软件信息贸易 TC 指数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国	0.13	0.06	0.26	0.33	0.33	0.34	0.51	0.52	0.58	0.44
欧盟	0.20	0.20	0.22	0.24	0.26	0.26	0.23	0.27	0.28	0.27
印度	0.86	0.85	0.83	0.77	0.81	0.87	0.88	0.92	0.90	0.90
爱尔兰	0.96	0.96	0.94	0.94	0.94	0.95	0.95	0.97	0.98	0.98
日本	-0.35	-0.37	-0.53	-0.58	-0.61	-0.63	-0.55	-0.56	-0.54	-0.47
韩国	-0.73	-0.53	-0.41	-0.23	-0.31	-0.30	-0.36	-0.14	-0.02	0.20
美国	0.00	-0.06	-0.14	-0.12	-0.13	-0.14	-0.20	-0.18	-0.19	-0.18

数据来源：中国、印度、爱尔兰、日本、韩国、美国数据来源于 WTO（该六国统计口径为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欧盟数据来源于欧盟委员会（统计口径为通信、计算机及信息服务贸易）。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中国软件业适应国际化市场发展能力较弱但竞争力逐渐提高

中国软件出口，虽在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在全球的份额呈缓慢增加态势，竞争力也逐渐提高。但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能力较弱，并未显示出较强的比较优势，企业竞争力相较爱尔兰和印度相差较大。中国的软件企业在上游的基础软件和支撑软件方面的议价能力弱，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基本上只能被动接受国际软件企业的报价。因此，发展软件产业应该提高上游的基础软件议价能力。^①

^①《2013 年软件行业竞争结构研究分析》，<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304/199772.html>。

2. 输出软件产品增长但缺少高端软件

近几年，中国软件出口虽然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但高端软件产品出口所占比例还是在增长的。目前中国的软件企业依然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持、专利产品的突破和知名品牌的引领，在国际软件市场上自主创新的能力较低。在大型商用软件领域我国还缺乏自主设计的软件产品。这反映了我国软件开发水平与世界水平差距依然很大。

3. 适应国际市场的应变能力较弱

中国的软件开发后起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软件产品对消费者的锁定（lock-in）效应，使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软件从一开始就占尽先机，这使中国的软件企业适应国际市场软件转型升级的应变能力较弱，软件出口的竞争力不强。对于中国的软件企业来说，只有适应国际软件市场需求的变化，在软件不断升级中找到超过美欧企业的切入点和契合点，才能突破美欧企业对用户的锁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4. 处于国际软件产业价值链低端

目前国际软件产业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以美国、欧盟等国家为主的企业在产业链上游主宰着整个产业链，决定着产业内的游戏规则，这些企业主要从事系统软件、支撑软件（如数据库）等基础平台的开发研制及软件标准的制定。产业中游分为上游产品分解后的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两类，可以回溯影响上游规则的制定。前者以印度、爱尔兰为代表，后者日本实力比较强大。产业下游分为高级应用类软件、一般应用类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软件开发三类，主要是在上游的基础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中国大部分企业从事一般应用软件的开发，有部分企业从事高级应用类软件的开发。最下游为单纯的数据处理，主要工作是数据录入，几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以菲律宾为代表。在此格局下，中国软件出口的基础基本牢固，但还需加大软件新品的研发力度，完善在国外市场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软件产品出口和提供高端软件信息技术服务，软件贸易强国的目标才能逐渐实现。

（二）政策建议

1. 落实对软件人才的激励政策

软件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人的智力支撑和主观能动性的调动。各软件基地和软件园区要将国务院给予软件人才在医疗、科研、住房、户籍、职称、奖励和期权、股权、技术入股、分红权等激励政策落实到实处，积极拓展软件知识产权投融资方式，发挥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减少由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产权泄密。使高端软件人才能够为我所用，软件贸易强国的基础才能牢固。

2. 产业政策支持继续聚焦于软件发展重点

早在 2000 年国务院就提出,“支持开发重大共性软件和基础软件。国家科技经费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和重大关键共性软件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包括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开发平台、信息安全、嵌入式系统、大型应用软件系统等基础软件和共性软件”。^① 从目前软件产业发展状况和出口状况来看,中国在重大共性软件和基础软件上还远未有重大突破,因此,软件产业支持政策的重心应继续围绕重大共性软件和基础软件的开发不变。

3. 创设自己的软件品牌提高知名度

通过软件产业的转型升级,逐渐改善以信息技术外包为主的软件出口结构,增加附加值较高的软件产品出口的比例。在软件出口产品中,增加系统软件与支撑软件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出口,逐渐创设自己的软件品牌,以品质和服务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从而逐渐提升中国软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

4. 促进软件标准与自主知识产权的结合

完善软件技术标准体系,加快软件标准的研究制定,鼓励软件出口企业通过软件国际成熟度认证以及软件从业人员的国际执业资格认证。强化标准培育服务市场、提升服务能力。目前国际信息技术外包已经从以往提供单一的服务,转变为提供包括更为先进应用程序、风险管理、金融分析、研究开发等在内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业务。因此,亟需打造一批著名软件产品和服务品牌,逐渐向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5. 发挥软件产业联盟的作用

软件产业的战略联盟是实现软件出口由大变强的关键。目前中国已建立了许多由软件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软件代理商等组成的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联盟,他们在提升软件产业的技术研发水平、促进软件产品出口与服务,使客户与软件厂商实现双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应在软件企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完善中国软件出口及相关信息服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Heeks 和 Nicholson 概括了软件出口的成功模型,认为政府、社会、市场和产业内部四种力量共同推动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国的软件产业在经历了政府强力支持的十几年发展后,在目前阶段,应更多地依赖市场和产业联盟等组织软件产业的协调发展,才能使软件出口由大变强。

6. 通过进口替代完成软件出口转型升级的战略转型

^① 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2000年6月24日。

目前，中国虽然是软件出口大国，但国内基础软件市场基本被国外软件产品所垄断。如操作系统、软件高级开发语言、大型数据库软件等基本上是由美国等大型软件公司所把持，而国内企业无力与之抗衡，主要以应用型软件为主。但国内应用软件产品往往又集中于企业应用软件、教育软件和杀毒软件等，缺少含有高附加值的通用软件。此外，在国内软件市场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较少。在大型商用软件领域我国还缺乏自主设计的软件产品。目前软件产品安全问题给国内软件企业提供了契机，国内广阔市场为软件产品的进口替代提供了可能性。国内软件企业可以通过软件产品开发逐渐完成进口软件产品的替代，进而完成软件出口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 GNPS 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2. 刘春辉：《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促进软件产业由大变强》，《人民邮电报》2014 年 5 月 30 日。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课题组：《2015 年下半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走势分析与判断》，2015 年 7 月。
4. 王轶南、刘琴：《印度、爱尔兰软件产业发展经验借鉴及启示》，《经济师》2015 年第 2 期。
5. 李西林：《中国软件出口转型发展及政策探析》，《国际贸易》2014 年第 6 期。
6. 朱磊：《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对外贸易现状与特征研究》，《对外经贸》2015 年第 7 期。
7.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世界经济研究》2013 年第 4 期。
8. 马梦琳：《中印软件信息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对外经贸》2015 年第 3 期。
9. 杨丽叶：《谈印度软件产业的快速崛起》，《现代交际》2015 年第 4 期。
10. 詹映、温博：《行业知识产权战略与产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以印度软件产业的崛起为例》，《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 年第 4 期。
11. 周健：《中国计算机软件贸易与国际市场》，《江苏商论》2007 年第 4 期。
12. 刘劲松：《信息产业推进印度的大国进程》，《国际展望》2000 年第 13 期。
13. 石磊：《为国际软件贸易牵线搭桥》，《计算机周刊》2001 年第 52 期。
14. 徐兴锋：《印度、爱尔兰软件产业扶持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国际贸易》2007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

刘中伟 唐慧远

摘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9 月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构想。在这一新构想下，各国将利用全方位的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中俄作为两个相互毗邻的大国，在大国关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能源合作是中俄关系中最关键、涉及范围最广的重点领域。在探讨中俄能源合作中具体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新视角，对新构想下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做出展望，分析中俄能源合作对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意义，提出新构想下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俄能源合作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刘中伟，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
唐慧远，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俄能源合作的背景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新构想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

* 本文为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重大项目“中国崛起相关研究”（项目号：262016T01）阶段性研究成果。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加深政策、交通、贸易、金融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区域合作，使欧亚各国间具有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从而在更为广阔的合作平台上实现协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目标是“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畅通。这就分别从治理、交通、制度、金融和文化角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① 全面深化各国间区域合作，就是要将以上五个方面作为深化重点，积极推进更深层次的区域联系。

（二）中俄能源合作历程

中俄能源合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起步，至今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回顾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扬长避短，对于进一步加大两国能源合作力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纵观中俄 20 余年的能源合作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2—2000 年，这是双方合作的摸索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市场对能源需求量不大，国际市场油价较低，中国更倾向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同时中俄双方均未致力于积极推进能源合作，签署的协议也未能有效落实，错失了很多合作机遇。

第二阶段，2000—2004 年，这是双方能源合作的平稳阶段。从 2000 年开始，中俄石油贸易量比上一阶段大幅增长，2003 年达到 525.4 万吨，2004 年突破 1000 万吨。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石油以及其他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为保证能源供给安全，中国逐步调整了对外能源政策，着力于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并在贸易量上有了较大突破。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走高，俄罗斯有了更多的出口选择，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仍持观望态度。

第三阶段，2004—2012 年，这是双方能源合作的突破阶段。2009 年 4 月，中俄共同签署了《中俄石油领域合作政府间协议》，双方在能源管道建设、油气贸易等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虽然在推进合作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和阻力，但是现实需要和两国政府的大力推进使得中俄能源合作实现了重大突破。2011 年 1 月，中俄第一条原油管道投入运营，俄每年通过该管道对华输送 1500 万吨原油，为期 20 年。2012 年，约 400 万吨原油通过俄罗斯科济米诺运到中国，开创了中俄“石油换贷款”的先例。

第四阶段，2012 年至今，这是双方能源合作的持续发展阶段。2013 年 2 月，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九次会晤在莫斯科举行，双方同意本着上下游一体化的原则开展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进一步扩大煤炭、电力贸易，加大节能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应用。

^①赵永正：《向西开放：西部大发展的时机》，《当代陕西》2013 年第 11 期，第 10 页。

2013 年和 2014 年，中俄相继签订了石油、天然气合作协议，合作规模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纵观中俄 20 余年的能源合作历程，在石油、电力、煤炭以及天然气领域均取得了相当成果，为两国带来了可观的现实利益。然而，两国的能源合作总体进展呈缓慢态势，且屡经反复、挫折，总体合作水平落后于双方的政治关系，没有达到预期进度。可以说，中俄能源合作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仍处于初级阶段，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必要也有空间继续进行深化。

（三）国际能源合作发展趋势

在当前国际局势总体趋于平缓的背景下，世界力量的对比朝着更加多元化的趋势发展。虽然“一超多强”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未发生根本转变，但传统大国力量下滑、新兴力量逐步兴起的趋势已经初步显现。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例，“2000 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近 1/3，2005 年下降至 25%，2013 年再下降至约 22.7%，13 年滑落约 11 个百分点”。^① 而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此而来的国际能源市场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别是能源安全形势出现了一系列的裂变。

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所占份额也大幅度增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能源资源的限制和气候变化都将持续对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产生制约。各发达国家也会基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在能源上对新兴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制裁。大国之间的博弈与战略抗衡所带来的国际局势的动荡，也会导致石油价格的波动和相关产业的变化。同时，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更关乎到一国的国家能源安全。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效应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更新、更稳定的经济增长点，而国际上对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也使得各国先后开始了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2011 年，欧盟公布了“欧盟 2050 能源路线图”，提出了诸多发展新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具体措施。同时，欧美还“率先部署智能电网技术以充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② 而中国则在 2010 年就出台了新能源政策，计划到 2015 年将能源强度降低 17.3%，到 2020 年在 2015 年的基础上再消减 16.6%。^③ 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

^①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

^②孙闻：《世界各国纷纷‘落子’“新能源”》，《经济参考报》2012 年 5 月 24 日。

^③何丽：《中国新能源政策冲击全球》，《金融时报》2010 年 12 月 3 日。

基于上述变化，随着国际联系的加强，广泛开展国际能源合作成为各国实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维护国家能源安全的共同选择。在全球化时代，独立解决本国安全问题并不现实。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随之而来的能源安全挑战，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是各国最好的选择。深化中俄能源合作既是中俄两国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能源合作趋势下的必然选择。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两国已经具备了充分的合作基础和丰富的合作经验，避免历史上曾出现的政策错误，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能源合作，是新时期中俄共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二、中俄能源合作中的具体问题分析

（一）中俄深化能源合作的客观基础

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和制约，中俄两国始终保持着较为稳定且前景光明的能源合作关系，两国政府致力于积极推进更深层次的合作项目。从能源供需的角度来说，中俄具有很强的合作基础。中俄双方能源合作互有需求，具有互补性。中国是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俄罗斯则是世界能源生产大国。中国需要大量且稳定的能源供应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而俄罗斯需要更多的能源出路，以获取更大的国家经济利益。

1. 中国对能源的刚性需求

中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2009 年全口径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水力发电）消费总量跃居世界第一，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 20%。^① 近 10 年来，中国累计新增消费量占世界能源新增总量的 53%，年均增速为世界的 3 倍。中国资源禀赋不高，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主要资源人均拥有量较低，能源供给保障压力巨大。我国单位 GDP 能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图 1 集中体现了 2005—2014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生产总量和供需缺口这三项反映能源供需状况的重要指标。分析中国能源需求与能源供给可以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处在较低水平，能源供给基本能够满足本国的能源需求。随着经济建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能源需求量也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能源供需缺口的增大。从图中不难看出，2005—2014 年中国能源供需缺口在波动中持续增大，并于 2014 年达到峰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能源供需缺口仍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

^①姜山：《中国能源挑战与机遇——基于两岸能源合作视角的分析》，《未来与发展》2013 年第 9 期，第 62 页。

关键时期，加之高耗能的经济结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滞后，能源需求大幅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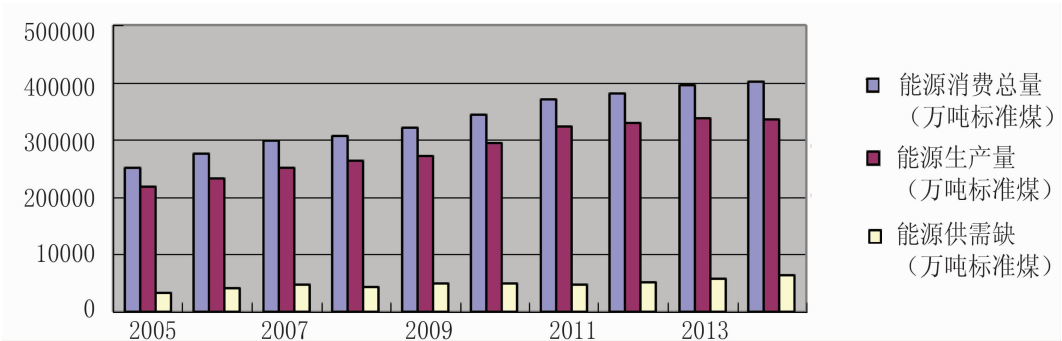


图1 2006—2014年我国能源供需数据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2. 俄罗斯的能源出口

俄罗斯蕴藏着丰富的能源资源，能源生产和能源出口量都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占有突出地位。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2015年6月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4年俄罗斯石油总产量为10838（千桶/日），占世界总量的12.7%，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二；天然气总产量为520.9百万吨油当量，虽然较2013年有所下降，仍占世界总量的16.7%，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俄罗斯在主要能源产品总产量上的领先地位一方面源于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即先天的能源储量较高；另一方面也因为俄罗斯能源工业具有很长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能源工业体系。一直以来，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与中国强大的能源市场潜力形成了天然的互补，是两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所没有的，从而为两国能源合作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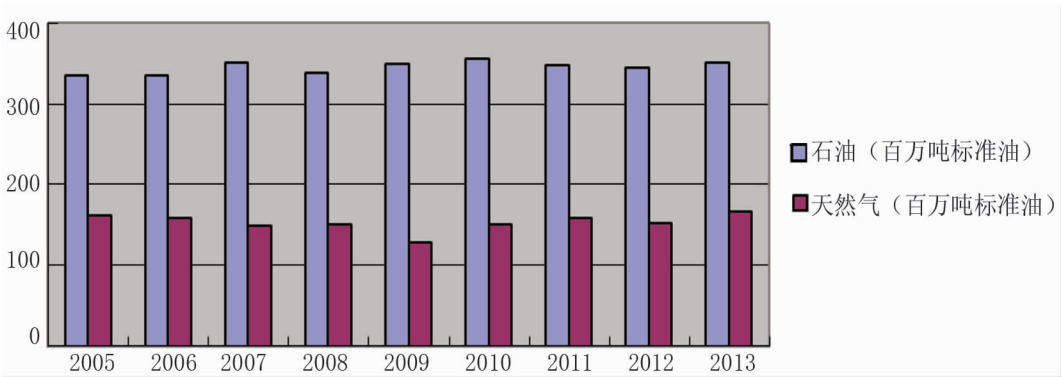


图2 2005—2013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净出口量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2012 年俄罗斯出口总值 5247 亿美元，其中能源出口总值 3660 亿美元，占比重 70%，2011 年这一比重为 65%。由此可见俄罗斯能源出口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① 图 2 反映了 2005—2013 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情况。石油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俄罗斯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供出口，石油出口收入占俄罗斯出口总收入 50% 左右。天然气也是俄罗斯重要的出口领域，其在 2012 年的天然气出口量占世界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19%。其中，欧洲是俄罗斯主要的出口方向。俄对欧的天然气出口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出口的天然气 80% 以上供应欧洲市场。^②

（二）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变动对俄罗斯的影响分析

根据 BP 能源公司 2015 年 6 月发布的《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原油现货价格自 2012 年后连续两年下跌，2014 年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跌至每桶 98.95 美元。2014 年 6 月后，国际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布伦特原油价格曾一度跌至最低点每桶 46 美元，创 2009 年底以来最低水平。作为传统的能源依赖性国家，国际石油价格的动荡直接影响着俄罗斯的经济的发展。从表 1 中可以看出，2014 年延续了上一年原油价格下跌的走势，即期布伦特原油价格平均为 98.95 美元，比 2013 年每桶价格低 9.71 美元，是 2010 年以来首次低于 100 美元。结合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世界石油供需情况等因素，国际能源署在 2015 年报告中对 2020 年以前的布伦特油价水平进行了综合判断，预计在未来五年中，国际油价将呈总体下降的趋势。^③

表 1 2005—2014 年布伦特原油价格 单位：美元/桶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原油价格	54.52	65.14	72.39	97.26	61.67	79.50	111.26	111.67	108.66	98.95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表 2 2012—2104 年俄罗斯原油出口数量与出口额

年份	原油出口量（亿吨）	出口额（亿美元）	均价（美元/桶）
2012	2.400	1809.3	103.14
2013	2.366	1736.7	100.41
2014	2.234	1538.9	94.22

数据来源：OSP- UA. INFO。

① 齐建国：《新兴经济产业技术突破的典型经验国际比较》，第三届中俄社会科学论坛，2009 年 6 月 22 日。
② 曹阳：《俄罗斯对欧盟的政治战略模式探析》，《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1 期，第 29 页。
③ IMA：Medium-term Oil market report 2015.

表 3 2012—2014 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数量与出口额

年份	天然气出口量（亿立方米）	出口额（亿美元）	均价（美元/千立方米）
2012	1787	622.5	348.33
2013	1964	672.3	342.29
2014	1743	552.4	317.00

数据来源：同表 2。

表 2 和表 3 分别反映了 2012—2014 年俄罗斯在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主要能源出口产品上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呈下降的趋势。其中 2014 年的原油出口量同比下降 5.58%，出口额同比下降 11.3%；2014 年天然气出口量同比下降 12.1%，出口额同比下降 18.6%。而能源出口的疲态也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停滞，其中 2014 年消费增速从 2013 年的 3.9% 降至 2%。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 2015 年发布的数据，2014 年俄罗斯经济总量为 70.97 卢布，同比增长 0.6%（其中第四季度零增长），为 2009 年（-7.8%）以来最低增长年份。据统计，油价年平均降低 1 美元就意味着俄预算会损失 22 亿美元，GDP 会降低 0.1%，居民收入减少 0.14%。^①

与国际油价下跌基本同期发生的，是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制裁。一直以来，欧洲都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然而，从 2012 年开始，俄罗斯在对欧能源出口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特别是在天然气领域，出口势头放慢，出口绝对数量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而且降幅超过 10%。从美国发起、正在向欧洲蔓延的低成本的页岩气开发技术正在给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带来致命威胁。同时，在乌克兰危机^②爆发之后，欧洲试图以此为契机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能源谈判，一方面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俄能源供应的过度依赖。

在这种遭受双重危机的局面下，俄罗斯亟需稳定国内能源市场，开拓更安全的能源出口方向。根据上文对中国能源供需量和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分析，中俄深化能源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和现实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中国需要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来填补自己的供需缺口，满足发展的需要；而俄罗斯则可以在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过程中解决对欧能源出口受阻带来的危机，稳定能源市场，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三）“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中国能源合作战略

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为：从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中高速增长；优化升级产业

^①米军、刘彦君：《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与俄罗斯经济增长》，《欧亚经济》2015 年第 5 期，第 37 页。

^②乌克兰危机是由 2013 年底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洲联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欲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导致的。

结构、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值得强调的是，这样特征上的转变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即“常态化”，而不只是阶段性的调整。

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中国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经济“新常态”转型的关键要素。调整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单位 GDP 能耗、大力发展新能源，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中之重，也是走向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部署。实际上，中国自 2011 年起已经对能源领域有意识地进行调整和改革。图 3 反映了中国从 2005—2014 年 GDP、能源生产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费增长速度的走势，不难看出，从 2011 年开始，上述三项增长速度都有明显的放缓，甚至已经低于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时，这说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然而，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然不尽合理，煤炭消费比例依旧偏高，清洁能源消费比例较低，这与欧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2014 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6.04%，远高于美国的 19.81%、欧洲的 16.84% 和世界平均水平 30.03%；而清洁能源天然气的消费占比为 5.62%，远低于美国的 30.38%、欧洲 32.11% 及世界平均水平 23.71%，^① 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 2014 年的单位 GDP 能耗为 0.76 吨标准煤/万元，不仅远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4 吨标准煤/万元）。^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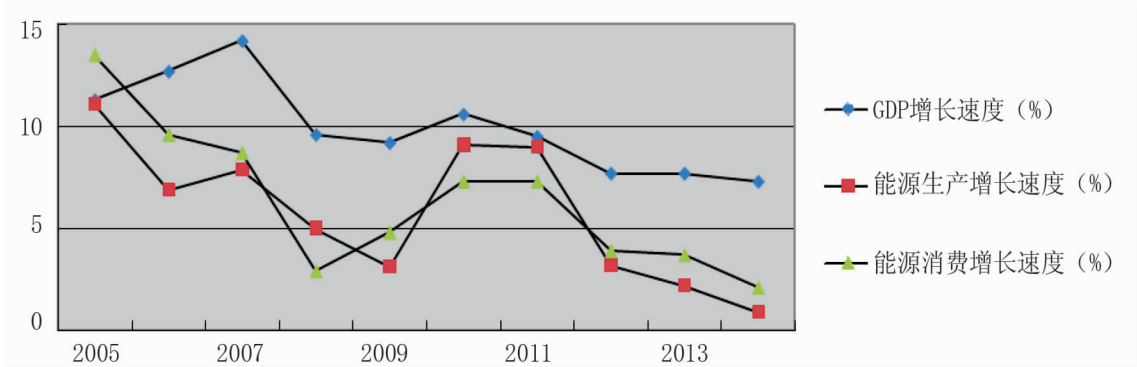


图 3 2005—2014 年中国 GDP、能源生产、能源消费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5》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笔者认为，根据中国长期以来能源消费的特点，以及能源资源禀赋较低的先天条件，煤炭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能源消费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新常态”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在稳定中谋求转型”。具体来说，以传统煤炭能源为支撑的工业

①李振宇、黄格省：《推动我国能源消费革命的途径分析》，《化工进展》2016 年第 1 期。

②数据来源于 BP 公司 2015 年 6 月发布的《BP 世界能源统计》。

领域应该发挥实体支持的作用，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保障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作为能源创新的后盾，为交通、生活等非工业领域的清洁能源的发展提供动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保证传统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又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有效推进生活燃料体系的改革，加快新能源交通的建设。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中俄能源合作新发展

（一）中俄油气合作的历史性突破

2013年6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一揽子多达102项的长期供油协议。俄罗斯将在未来25年内向中国供应总计3.65亿吨石油，总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同时，俄罗斯将在目前中俄原油管道（东线）每年1500万吨的输油量的基础上逐年向我国增供原油，到2018年达到每年3000万吨，增供合同期25年，可延长5年。2014年5月，中俄两国政府在上海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合作项目备忘录》，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签署《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俄罗斯将在未来30年中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加至每年380亿立方米，总价为4000亿美元。^① 中俄油气合作经历了20余年的曲折发展，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角度来看，这两份合作协议的签订距习近平主席提出“一路一带”仅有八个月的时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响应，或者是一个宣言，向世界展现了中俄深化能源合作的决心和态度，也预示着能源合作将带动“新丝路”向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中俄能源合作路径分析

从中俄首次进行能源合作开始，中俄在政治上的互信一直以来都是双方能源合作的基础所在，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优势为双方提供了巨大的合作空间与平台。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提升以来，俄罗斯开始担心强大后的中国会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话语权上对自己造成更大的威胁，这使得双方的能源合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和深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构想下，中俄需要以政治互信为基础，积极强调对两国能源安全的维护，充分发挥双方地缘政治优势，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合作，大力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全面深化双方的能源合作。

^①杨阳：《中俄签署天然气大单合同上市公司受益几何》，《股市动态分析》2014年第20期，第56页。

1. 加强中俄政治互信，维护共同能源安全

中俄能源合作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2015 年 5 月，中俄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中俄双方将致力于把全面、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贯彻到更深层次的合作中，而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不谋而合。能源合作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布局。通过巩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双方政治互信，维护两国共同能源安全，是促进“一带一路”构想下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路径。

从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正在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俄罗斯实施能源战略围堵。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将中俄能源安全作为对两国实施战略围堵的重要目标。特别是在能源运输领域，美国极有可能利用其对世界主要海上运输通道的控制权，在非常事态下对中俄能源运输进行阻断。此外，中国能源企业在同西方国家开展合作项目，遭遇到的政治阻力日趋增大。中国公司收购境外能源企业这种正常的经营活动，也被某些西方国家予以复杂的政治解读。^① 中俄应充分利用两国地缘政治优势，全面深化双方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能源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共同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挑战，同时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中俄能源的共同发展。

保障能源安全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切实要求和重中之重，也是当前国际能源格局下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目前，中国需要为经济转型提供足够的能源安全保障；而俄罗斯受到国际能源市场变动的影响，也迫切需要中国这一稳定的能源出口以巩固国家能源经济，能源安全的共同需求将中俄能源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不只是纯粹的经济构想，政治路径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涵之一，共同能源安全的构建需要以双方政治互信为基础，这也是新国际能源背景下中俄两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最特别的合作优势，悠久的合作历史和良好的合作基础将为中俄两国新时期的能源合作提供坚实的政治后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需要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构建结合起来，积极加强双方政治互信，维护两国共同能源安全。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保障能源运输安全

基础设施和陆路交通建设一直以来都是中俄能源合作中的重点项目，并且将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被更加重视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 2015 年 3 月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望与行动》，文

^①王海运：《我国能源安全面对的新挑战及应对思路》，太阳能招标网，2013 年 1 月 16 日。

中对能源这一合作重点提出了具体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点工作，各国应大力推进跨境能源运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道路互联互通。^① 据此，中俄间能源基础设施与陆路交通建设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中俄能源合作的重点路径之一。中俄双方应积极开展磋商谈判，推动输油、输气管道的建设。以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动与能源相关的其他项目合作，提高地区一体化水平，促进投资和经贸往来。

一方面来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目标之一，道路联通在能源合作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虽然中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油气合作的发展，但双方签订的许多管道建设项目并未得到实际的落实，造成了运输能力难以满足两国能源合作需求的尴尬局面，特别是海上运输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联系更加紧密、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能源格局要求中俄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努力构建更加多元化的能源合作道路，以保障两国能源运输安全。另一方面，俄罗斯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能源，其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就是薄弱的基础设施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能源开发与利用。俄罗斯需要凭借自身的能源资源储备和地缘优势，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与中国共同推进远东地区的能源合作，力求快速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道路运输等能源相关产业，为远东地区的能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助力。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油气资源开发的根本保障，也是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前提。强化中俄在基础设施和陆路交通方面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优化双方合作的地缘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能为更大规模的油气合作奠定基础。

互联互通本身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题中之意，而多元化的能源运输方式也是中俄两国共同的现实需要。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俄罗斯，提升自身实力是应对美、欧等西方大国能源战略围堵的底气所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中俄带来共同的能源利益，两国不仅可以借此推进更大规模的能源合作，也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与震荡。

3. 发展新能源技术，提升能源技术安全

能源结构调整和改革是中国向“经济新常态”转型的关键，传统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将逐步降低，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是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对于俄罗斯来说，虽然其能源工业起步较早，能源技术相对发达，但是由于其过度依赖能源出口及能源周边产业，导致其单位 GDP 能耗较高，2011 年的 0.827 甚至要略高于中国。俄罗斯提出的

^①李雪梅：《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的布局和策略》，《开放导报》2014 年第 2 期，第 30 页。

《2030 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强调提高能源效益和发展能源保护技术。由于俄罗斯在易开采地的油气田资产及其蕴藏的资源日益减少，迫使其开采更加趋向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恶劣的矿田，包括大陆架和深水区域，这就需要发展新的开采技术和设备。

传统能源进出口合作模式已无法满足新时期中俄两国的能源需求，能源技术合作将成为符合两国国情和世界能源格局的新选择。对中国而言，“经济新常态”要求我们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这一转变也应该体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

“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的中俄能源合作不只是原有合作项目的简单扩大和重复，这一崭新的构想要求中俄共同寻找符合两国现代化能源发展需要的新路径。由于中俄都处于向能源创新过度的阶段，两国在提高能源利用率、调整能源结构上具有的共同利益诉求，能源技术的共同开发将成为下一阶段中俄能源合作主要的契合点，这也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下中俄之间新的能源合作项目。两国可以通过技术共同开发、技术合作，推动能源合作关系，共同实现能源创新。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新兴产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着力发展的对象和中俄新能源合作的重点。通过与俄方进行技术合作、人才交流、信息共享，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资金、政策扶持，中俄将在非传统油气勘探与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方面开辟出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三）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

将中俄能源合作作为支点和抓手，大力发展中国与中亚、欧洲等其他国家的能源合作，推动能源合作向多国家、宽领域、高层次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崛起。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及互补优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突出能源合作符合各国发展的战略要求，有助于增进各国能源安全、扩大能源利用，有利于合作双方资金技术优势互补，对于国际能源秩序的改造及地区各国的共同能源安全将起到主要的推动作用。中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对于“新丝路”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来说，有着极强的示范作用和广泛的影响力。中俄能源合作牵扯到政治、经济、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重要项目，不仅可以为两国带来实质性的利好，更可以说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突破口。

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全面推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使得两国在中亚开展区域合作具有更广阔的前景，这将加强中俄同中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有利于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建设。俄罗斯在中亚地区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一些俄罗斯学

者表示了对俄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担忧，他们担心这种区域合作的升级会导致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得本国丧失掉部分既有利益。^① 实则不然。中俄在中亚的利益共性一直是被低估的，这也导致了两国的合作潜能并没有被最大化的发掘出来。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开放包容的新构想下，中俄完全可以通过深化能源合作寻找更多的利益共同点，从而开发出中俄在中亚开展区域合作的新范式。一旦中俄、中亚之间形成更具体、更紧密的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提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被大幅推动。

四、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政策建议

如上所述，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互补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于内外部的压力和制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构想下，中国应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深化中俄能源合作，并以此为基点，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现阶段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对俄能源经济研究，积极寻找双方利益共同点

中俄有悠久的合作历史，并正在积极构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共同能源利益的契合是两国推进能源合作的根本动力。中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要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着力于与俄方制定长期的能源合作策略，通过具体的政策沟通和合作机制强化双方的能源联系，在满足自身能源需要的同时使俄罗斯也能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得到切实的国家利益。中国应加强对俄能源经济研究，寻找双方利益共同点。俄罗斯在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时仍存有顾虑，担心俄罗斯会成为中国发展的原料附属国。中国应充分利用与俄罗斯在能源供需上的互补优势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换位思考，站在一个能源出口国的角度去考量俄罗斯的能源政策，理性分析应对策略，逐步释放中俄能源合作的先天互补性和巨大潜力。

（二）完善中俄能源合作机制，充分落实已有能源合作协议

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相继签订了石油、天然气合作协议后，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规模实现了质的飞跃。鉴于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协议达成后未能得到实际落实的情况，应完善两国能源合作机制，积极推进相关能源合作项目的开展，力求将协议内容体现在现实的合作行动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共赢合作无疑也需要通过更加完善的合作机制

^①强晓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俄在中亚区域合作展望——俄罗斯视角的分析》，《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70 页。

来实现。一是构建对话协调机制。在中俄双赢的原则基础上，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建立，通过召开定期、不定期会议，以及能源合作论坛等形式，加强能源发展战略和对策交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存在的利益纠纷和摩擦。二是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积极构建完善能源信息网络系统，力求及时分享中俄能源基本统计数据，以便双方相互了解彼此的投资政策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三是建立项目评估机制。中俄可以共同成立能源项目评估机构，由专家对合作项目的可行性、风险大小等相关参数进行研究分析。

（三）自身发展，政府扶持，双管齐下推动国内能源企业崛起

能源企业的崛起是促进一国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能源合作最终要落实到具体企业的参与和具体项目的实施中。中国应通过具体的能源合作项目大力推动国内能源企业的崛起，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深化中俄能源合作，从根本上促进中国能源产业发展，一方面，企业本身应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东风，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地方能源企业应努力争取参与到建设“一带一路”的规划中，与相关部门充分沟通对接，准确反应自己的优势和需要，为企业的发展争取机会；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对国内能源企业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各能源企业公平、充分地参与到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进程中。特别是对新能源企业，应给予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对于发展较快、竞争力强、国际前景好的能源企业，应鼓励其参与到更激烈的国际能源市场竞争之中。

（四）加强能源技术合作，开展多元化能源合作领域

除了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传统合作项目，电力以及其他新能源技术应该成为未来中俄能源合作的重点。例如，跨国输电是近年来新兴的合作项目，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可以作为清洁能源有效推动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俄罗斯拥有欧洲最大、世界第四大的电力系统，自身供电充足，有能力满足中国的清洁能源需求。^①同时，俄罗斯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技术上都具有一定优势，无论是传统能源的开采、储存还是新能源的技术开发，都是需要中国通过能源合作进行学习的。由于能源技术的特殊性，单纯的能源贸易方式可能不足以满足两国的合作需要。而俄罗斯在能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巨大的资金需求则为中国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加强与俄罗斯能源公司的合作投资，深化能源技术合作。特别是在新能源领域，多元化的能源合作既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刚性需要。在扩大

^①王莉、李静：《能源安全视角下中俄能源合作战略选择》，《资源开发与市场》2012年第8期。

传统能源进出口合作的基础上，中国应致力于与俄方开展更高层次的能源技术合作，推动更加多元化的能源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为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在更加开放包容的区域合作环境中，中俄将寻找更多的利益共同点，开展更为密切、更深入的项目合作；同时，中俄能源合作的深化对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着重要意义。以中俄能源合作为抓手和突破口，全面推进更多元化的区域合作，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倡导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各参与国均能在这一新的构想中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和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 曲伟：《着力构建中俄中欧丝绸之路经济带》，《奋斗》2014年第9期。
2. 谢文心：《从贸易互补性看中俄能源合作发展》，《经济问题》2012年第1期。
3. 庞昌伟：《能源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突破口》，《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 张建平、李敬：《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俄合作新机遇》，《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
5. 黄雅娟：《新时期深化中俄能源合作的思考》，《大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6. 肖宏伟：《新型能源安全观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宏观经济管理》2014年第8期。
7. 张莹：《中俄能源合作博弈分析》，《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4期。
8. 冯瑞雪：《中俄能源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视角》2014年第4期。
9. 王俊峰、贾芦苇：《中俄能源合作的新战略与新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0. 高晓慧：《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解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
11. 林民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俄罗斯因素：地缘政治视角的考察》，《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蓝皮书2014—2015》，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12. 张新华：《中国与中亚国家及俄罗斯能源合作探析——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新疆社科论坛》2013年第6期。
13. 李硕冰：《中俄能源合作际高而望——从中俄签署油气大单看提升和扩大两国能源合作的深远影响》，《中国石油企业》2013年第7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 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微观数据分析^{*}

蔡 洁 黄 曦 白江涛

摘要：从微观产品视角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厂商出口决策及贸易流量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来预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采用 2001—2013 年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级数据来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厂商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作用类似实施关税，但影响程度不及后者。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贸易政策的影响具有时滞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增强。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中国—东盟出口决策 企业自贸区

作者简介：蔡 洁，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黄 曦，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白江涛，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 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贸易协定引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机制及影响研究”项目号：教外司留（2015）1098 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事件数据的领土争端对双边经贸关系影响量化研究”（项目号：14YJAZH002）。

一、引言

在构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下,我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东盟自贸区(简称 CAFTA)作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自贸区,对于我国把握住当前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和应对发达国家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贸易量的增长,长期以来忽视了贸易协定的不完全契约性会带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简称 TPU)。在国际贸易领域,TPU 对出口厂商的生产与出口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旦做出决策,企业所面临的将是巨大的沉没成本,直到政策明朗化,不确定性降低,出口厂商才会改变“观望”态度。这种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国际贸易体系之内,几乎无从避免。对学术界来说,贸易政策不确定是一个很新的问题,以往的贸易研究主要关注确定性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很少涉足 TPU。一方面,贸易政策的研究空间很大,数据较少且不易获得,研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TPU 既难测度,也难以与具体的投资决策联系起来。直到金融危机期间,许多国家利用贸易政策的浮动空间变相实施贸易保护,TPU 对贸易的影响才凸显了出来。

本文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实证检验对象,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厂商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剖析贸易协定引致 TPU 的机制,改进 TPU 估算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赋予贸易协定除了改变贸易条件和加强国家行为约束之外的新内涵,进一步完善与贸易协定相关的理论,对贸易协定机制进行理论补充。同时,从宏观层面为我国有效运用贸易协定来应对他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提高我国福利提供政策参考,从微观层面解释由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衰退引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全球贸易萎缩问题,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外贸的平稳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

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源于贸易政策自身的浮动空间。具体来说,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造成原本稳定的关税随之变动。第二种情况由于贸易报复措施导致,属于第一种情况的极端化(Jide Nzelibe, 2004; 杨文杰, 左海聪, 2005; 高丽钦, 2009)。第三种情况,即贸易协定在签署过程中的留白,用以保留贸易政策随机

变动的灵活性。

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目前还没有明确定义，但根据上述三种情形，结合 Bloom 等人（2011）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定义，^① 本文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定义如下：因政府未来贸易政策的变化，从而导致对风险溢价、企业和个人的出口、投资及消费行为造成影响的经济风险。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影响

大多数相关文献都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少贸易量。因为 TPU 的上升会导致进入市场的沉没成本升高，从而使厂商不倾向于出口（Crozet et al., 2008; Freund and Rocha, 2011; Freund and Pierola, 2010a, b; Handley, 2011）；而不确定性的降低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厂商生产率（Brandt et al., 2012），二者均会促使厂商选择出口。

Handley（2011）率先研究了在局部均衡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厂商的出口决策。其指出，TPU 的存在会影响厂商的出口成本和收益，进而改变预期收益。同时不确定性让边际厂商更为谨慎，即使关税降低，其作用也会被不确定性削弱，从而延迟厂商的出口。该文仅检验了澳大利亚的情况，随后 Handley 和 Limão（2013）将模型拓展到了一般均衡框架下，利用可观测的政策和反事实政策来分析 TPU 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将之分解到二元边际的层面，并纳入了技术升级。

国内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只有 Ling Feng et al.（2014）、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等。Ling Feng 等人主要通过中国入世前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据研究了 TPU 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发现产品级关税不确定性的降低会促进出口活动，而且这种增加主要来源于拓展边际。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则从产品创新的角度切入，分别考察了所有制、贸易方式和进入退出等，还检验了不同时段和出口目的地对于 TPU 影响程度的差异。

在这些研究中，没有考虑到随着协定谈判和推进的不同阶段，TPU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的情况。

（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

针对上述三种情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学者们主要测度的是第一种情况，通常使用关税波动的概率来近似 TPU。主要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Handley（2011）、Deason

^①Bloom et. al（2011）对政策不确定性给出如下定义：政策不确定性是政府未来政策的不确定带来的经济风险，会造成风险溢价上升、企业和个人推迟消费和投资行为，直到不确定性消除。

(2012)、Valeria & Roberta (2012) 所使用的方法，用约束差额 (binding overhang)，即约束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另一种是 Handley & Limão (2012) 所使用的方法，用最惠国关税和特惠关税之间的差额代表，这种测度方法是为了研究具体某项贸易政策或者特惠贸易协定 (PTA) 对于 TPU 的影响。由于这两种方法的适用情况不同，所以并没有得到融合。

三、中国对东盟出口情况概述

迄今为止，中国—东盟自贸区已走过了十几年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 2001 年到 2014 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 规模迅猛扩大，产品种类和价值均大幅增长

从图 1 可见，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种类从 2001 年的 32839 种达到 2014 年的 42328 种，增加了近 1000 种，年均增长率达 1.99%。产品种类的增加带来了出口产品价值更大幅度的攀升。从 2001 年的 415.19 亿美元开始，每年保持约 21.50% 的增速，到 2014 年达到 4798.46 亿美元。15 年间，中国向东盟的出口额增长了十倍，出口总额累计为 31954.29 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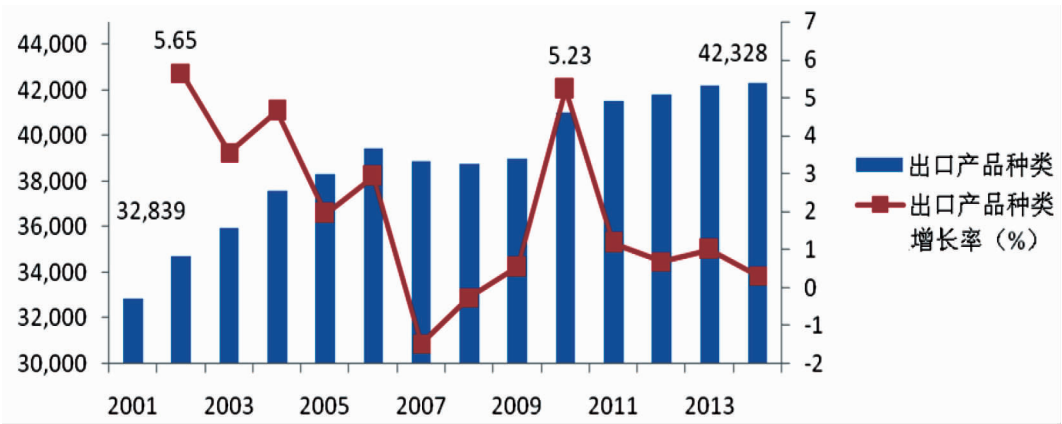


图 1 2001—2014 年中国出口至东盟的产品种类及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整理形成。

(二) 整体上升，但呈明显阶段性

中国向东盟出口的产品种类变化过程呈现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1—2006 年，其间经历了迅猛的增长，保持着年均 2% 以上的增速。这些进展与自贸区的关税削减计划紧密相关。2004 年起，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实施自贸区的“早期收获计划”，截至 2006

年 1 月 1 日早期收获计划产品关税削减为零。2005 年 7 月起，正常产品也开始降低关税。随着关税的降低，中国对东盟的产品出口数量快速增加。第二阶段为 2007—2009 年，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产品数量有所回落。虽然正常商品在 2007 年、2009 年又进行了两次关税削减，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 年产品种类数减少了 102 种，2009 年稍有回升。随着自贸区进程的推进，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在第三阶段——2010 年起重回增长时期。基于产品种类限制与市场逐步饱和，2010—2014 年增速不算太快，但保持着稳步增长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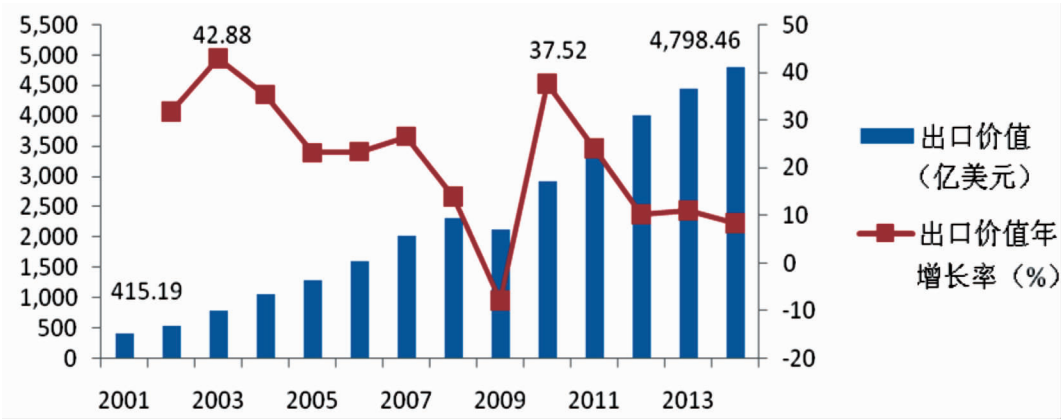


图 2 2001—2014 年中国出口至东盟的产品价值及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整理形成。

从图 2 可见，中国对东盟的出口额总体呈上升态势，其阶段性特征从增速上看相比于绝对值更为清晰。2001—2007 年，中国向东盟的出口额以超过 20% 的年增长率飞速增长，在 2008 年达到 2128.09 亿美元的高峰，是 2001 年的近 6 倍。因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 年增速开始放缓，2009 年则首次出现下滑，但同年其占中国对世界出口的比重仍上升了 0.2%。短暂的下挫后迎来了 2010 年 37.52% 的迅猛增长，随后几年增长率逐年下跌，一方面源于整体疲软的世界经济局势，另一方面则部分因为中国—东盟自贸区仍是一个自由化水平较低的自贸区，尚有不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影响了我国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三）个体差异较大，前五国占据绝对比重

从图 3 可见，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规模在 2001—2014 年间有了大幅增长，但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2007 年以前菲律宾紧随其后居第四位，但在 2008、2009 年则分别被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赶超。剩下的四国除缅甸于 2008 年后有所上升，其他三国一直维持在原有水平。图 4 则体现得更为清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五国在 2001、2014 年分别占据了出

口市场 89%和 84%的比重，其中越南占比大幅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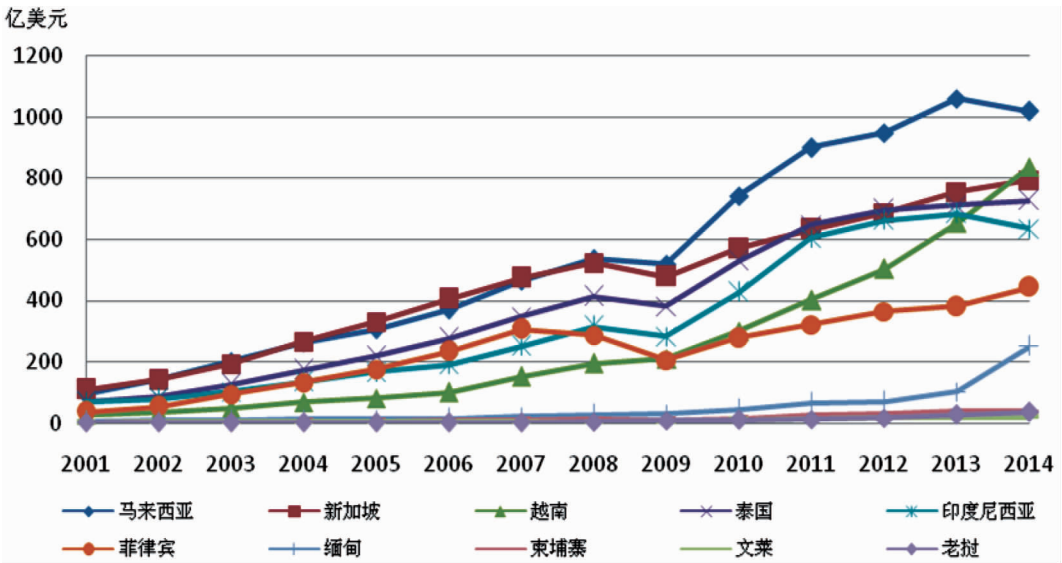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14 年中国出口至东盟各国的贸易总额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整理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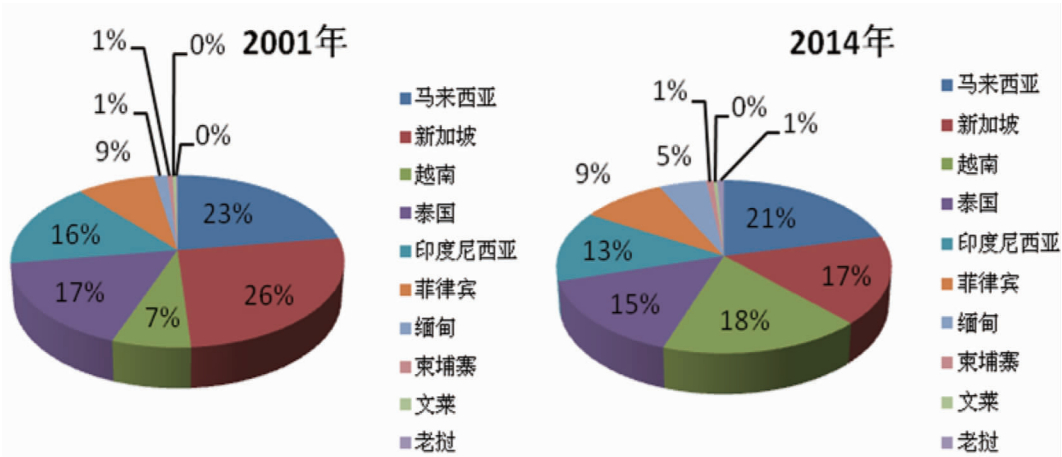


图 4 2001 与 2014 年中国向东盟各国的出口总额占比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UNCOMTRADE 数据库整理形成。

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阶段性和国别差异客观上来源于东盟各国的国情差别以及自贸协定的阶段性和浮动空间，显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说明在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厂商的作用以及自贸协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过程中，可能受到时间、国别、政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须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四、理论分析

通过扩展 Ling Feng 等人 (2014) 的模型, 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来研究 TPU 如何影响厂商出口决策。模型假定行业内厂商数量固定, 并将厂商分为出口厂商和非出口厂商。引入运输成本作为可变成本, 去掉固定成本。模型发现 TPU 的降低会引致新的出口。

(一) 确定性模型

1. 模型假定

模型主要关注国内厂商向外国市场的出口, 厂商在本国的销售不计在内, 因此对于企业生产率以外的变量本国都是接受者, 不能影响其变化。假定垄断竞争条件下, 企业生产连续的差异性产品。

每种差异化产品 w 的需求函数 $q(w) = YP^{\sigma-1}[p^{-\sigma}(w)]$, Y 为总支出, $P = \left[\int_{w \in \Omega} p^{1-\sigma}(w) dw \right]^{\frac{1}{1-\sigma}}$ 为总价格, $p(w)$ 为 w 的价格, $w \in \Omega$ 。企业生产率服从分布 $G(\varphi)$, 每家企业从中随机获取自己的生产率。

外国对其从本国进口的产品收取 $\tau_a > 1$ 的实施关税。若厂商的生产率为 φ , 则其生产每单位产品的可变成本为 $\frac{\tau_a}{\varphi}$ 。遵循利润最大化条件, 企业收取一个固定的价格加成 $\frac{\sigma}{\sigma-1}$ 以支付可变成本, 因此每单位商品的价格为 $\frac{\sigma\tau_a}{(\sigma-1)\varphi}$ 。假设单位产品单位距离的运输费用为 s , 距离为 L 。

可得每阶段出口商的营业利润为:

$$\begin{aligned} \pi(\tau_a) &= \left[\frac{\sigma\tau_a}{(\sigma-1)\varphi} - \frac{\tau_a}{\varphi} - sL \right] \cdot q(w) \\ &= \left[\frac{\tau_a}{(\sigma-1)\varphi} - sL \right] \cdot YP^{\sigma-1}[P^{-\sigma}(w)] \\ &= \left[\frac{\tau_a}{(\sigma-1)\varphi} - sL \right] \cdot YP^{\sigma-1} \left[\frac{\sigma\tau_a}{p(\sigma-1)\varphi} \right]^{-\sigma} \\ &= \left[\frac{\tau_a}{(\sigma-1)\varphi} - sL \right] \frac{Y}{P} \left[\frac{\sigma\tau_a}{p(\sigma-1)\varphi} \right]^{-\sigma} \end{aligned} \quad (1)$$

2. 进入和退出决策

根据异质性企业理论, 只有单位成本低于生产临界值水平的厂商才会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在确定性条件下, 如果净现值是正数, 企业就会倾向于出口。

均衡的零利润条件表明，边际进入者的 $\pi(\tau_\alpha) = 0$ 。

$$\pi(\tau_\alpha) = \left[\frac{\tau_\alpha}{(\sigma-1)\varphi} - sL \right] \frac{Y}{P} \left[\frac{\sigma\tau_\alpha}{p(\sigma-1)\varphi} \right]^{-\sigma} = 0 \quad (2)$$

于是，每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多期零截止利润门槛为：

$$\varphi^* = \frac{\tau_\alpha}{(\sigma-1)sL} \quad (3)$$

即，只有单位成本低于此值的厂商才有能力选择出口。

(二) 随机过程

假定企业当期面临的外国的实施关税 τ_α 相对较低，如果没有 PTA 的保护，外国可能任何时候提高税率。设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到达率为 λ 的泊松分布，代表外国提高实施关税的可能性。即，在每个时间单位中，外国有 λ 的可能性会将现行关税提升至新关税 τ 。如果外国决定调整它们的关税，假定新关税的概率分布为 $H(\tau)$ ，定义域为 $(1, \bar{\tau})$ ，其中 $\bar{\tau} > \tau_\alpha$ 是出口关税的最大值。假如东盟取消对中国的特惠待遇，对中国的进口收取更高的关税，即 WTO 最惠国实施关税，就是这种情况。

一个贸易制度越稳定， λ 值越低，关税的持久性越高。而 PTA 的实施影响两个参数：关税变动的可能性 λ 和未来关税水平 τ 。如果 PTA 是可信的，此时这种情况就近似确定性条件，此时 λ 趋于 0。

企业价值由现在的利润和未来的可变利润共同决定。设折扣率为 ρ ，在固定成本为零的假设下，出口的期望收益等于预期出口可变收益的现值。

$$\text{即 } V(\tau_\alpha) = \Pi(\tau_\alpha)$$

在第一阶段，预期出口可变收益的现值为：

$$\Pi(\tau_t) = \pi(\tau_t) + \rho[(1-\lambda)\Pi(\tau_t) + \lambda E(\tau_{t+1})] \quad (4)$$

其中， $\pi(\tau_t)$ 是 t 期的可变收益。在 $t+1$ 期，实施关税有 $(1-\lambda)$ 的概率为 τ_t ，有 λ 的概率会改变，在政策冲击之下期望可变收益变为 $E\Pi(\tau_{t+1})$ ， τ_{t+1} 服从 $H(\tau)$ 分布。

在第二阶段，由于政策的冲击，预期的出口可变收益为：

$$\begin{aligned} E\Pi(\tau_{t+1}) &= E[\pi(\tau_{t+1}) + \rho(1-\lambda)\Pi(\tau_{t+1}) + \lambda E(\tau_{t+2})] \\ &= E\pi(\tau_{t+1}) + \rho E\Pi(\tau_{t+1}) \end{aligned} \quad (5)$$

忽略时期角标可得：

$$E\Pi(\tau) = \frac{1}{1-\rho} E\pi(\tau) \quad (6)$$

把这个表达式带入公式 5，得到可变出口收益的现值为：

$$\Pi(\tau_a) = \frac{\pi(\tau_a)}{1 - \rho(1 - \lambda)} + \frac{\rho E\pi(\tau)}{(1 - \rho)[1 - \rho(1 - \lambda)]} \quad (7)$$

令 $V(\tau_a) = \Pi(\tau_a) = 0$ 得到：

$$\varphi^* = \frac{(1 - \rho)\tau_a + \tau E(\tau^{1-\sigma})\tau_a^\sigma}{(\sigma - 1)(2 - \rho)sL} \quad (8)$$

令 $A = (1 - \rho)\tau_a^{1-\sigma}, B = \tau E(\tau^{1-\sigma}), C = (\sigma - 1)(2 - \rho)\tau_a^{-\sigma}sL$

所以 $\varphi^* = \frac{A + B}{C}$

由以上模型得到两个引理：

引理 1：预期关税的降低或实施关税提高的可能性降低，均能造成不确定性的降低。不确定性的降低会拉低生产临界值水平，从而鼓励厂商出口。

该引理由公式 8 得出。如果不确定性降低，那么说明能够观测到出口进入的增加。这是本文在实证部分需要验证的。

引理 2：给定实施关税和 TPU，目标国和出口国之间的距离越远，生产率临界值水平越高，厂商出口越少。

该引理也是由公式 8 得出，符合传统引力模型的结论。当企业面临更高的运输成本时，只有更高的预期收益才能弥补成本的支出，也只有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才能实现这一点。

五、实证检验

一项贸易政策的有效性与其对企业的影响，往往要在其推出和协议签订之后才能得到体现。在政策落地之前，国家间的贸易因新旧交替处于相对混乱的时期，这正是 TPU 尤为明显的阶段。要研究 TPU 的作用，就要将贸易政策制定前后的经济表现进行比对。

在中国和东盟成立自贸区的历程中，有两个时点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2002 年全面经济合作的协议启动，标志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生效；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因此在这两年前后，是不确定性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也是本文进行时段划分的依据。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东盟各国 2001—2013 年间的实施关税、约束关税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 (WTO) Tariff Download Facility 数据库，中国对东盟各国的出口产品数量及价值数据来自 UNCOMTRADE 数据库。东盟各国的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 GDP 数据取自世界银

行Data Site，均以现期美元价值作为单位。东盟各国与中国的距离，及是否有共同语言等数据来源于 BACI CEPII 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所有关税编码全部统一为 HS96 六位数版本，当 N 个新编码转换为 1 个旧编码时出现重复情况的，将其合并选取算术平均。

1. 实施关税 (t)。实施关税可视为厂商出口的可变成本，实施关税越高，产品的定价就越高，产品的销量越低。因此，实施关税对出口数量和价值的影响为负，我们预期这一项的系数 β_1 为负。

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TPU)。由理论模型结论可知，TPU 的降低，会拉低生产率临界值水平，鼓励更多的出口进入，从而增加出口产品数量和价值，因而我们预期这一项的系数 β_2 也为负。因本文考察期跨越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自协定签署之前到成立之后，期间包含了成员国多回合的谈判及推进进程的不同阶段，不确定性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文献综述中单一测度方法并不适用本文情况。于是我们结合了两种测度方法：在协定实施前，TPU 用 WTO 约束关税与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差额代表，而在关税正式削减之后，则用最惠国关税和特惠关税之间的差额测度。即每对产品一年所对应的 TPU 都等于最坏情况发生下的关税上限减去实际征收关税的差额。这就解决了文献综述中提到的问题，更符合现实。

3. 目标国 GDP。GDP 可视为一国的经济规模，一国的经济规模则直接影响国内的需求和市场规模，以及贸易规模。因此，我们预期 GDP 与出口产品数量和价值呈正相关，即 β_3 为正。

4. 目标国与出口国之间的距离 (L)。两国间地理距离的测算是一项复杂工程，有各种测度的方式，因本文考察的重点是 TPU，于是将本项的处理简单化，采用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拟合两国间的距离。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本文预期贸易成本 L 与出口产品数量和价值呈负相关，即 β_4 为负。

5. 目标国与出口国人均 GDP 的比值 (ratio)。东盟各国与中国人均 GDP 的比值 (ratio) 是用以衡量进出口国国民收入及消费偏好近似程度的标准。两国收入水平越接近，就越可能具有相似的偏好和需求，出口企业花费在信息搜索、销售渠道建立和产品推广等方面的成本就越低。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两国产品的相似度和可替代性也提高了，会加剧竞争，增加了产品进入目标市场的难度。因此该变量系数 β_5 符号不确定。

6. 贸易伙伴之间使用共同语言 (comlang)。在经典引力模型之中，贸易伙伴之间是否使用共同语言 (comlang) 可用来衡量双边贸易阻力的大小，也是影响贸易的重要因素。通常意义上，贸易伙伴之间如有共同语言能降低沟通成本，文化上的相似性会降低产品进入的难度，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对贸易流量有促进作用，即 β_6 为正。

(二) 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用以测度区域贸易协定或双边贸易对贸易流量影响大多采用引力方程。但以往经典引力模型如 Armington 模型和 Krugman 模型等均假定企业同质性和消费者产品种类偏好一致，显然，此假设并不适用本文。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企业生产率是异质性的，存在着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大量的零点交易，这样的假设更符合本文的情况，因此，本文根据理论模型和引力模型，建立了如下计量模型：

$$EX = \alpha + \beta_1 t + \beta_2 TPU + \beta_3 GDP + \beta_4 ratio + \beta_5 L + \beta_6 comlang + \epsilon$$

$$Quan = \alpha + \beta_1 t + \beta_2 TPU + \beta_3 GDP + \beta_4 ratio + \beta_5 L + \beta_6 comlang + \epsilon$$

表 1 和表 2 呈现了基本的回归结果。其中，(1)、(2)、(3) 栏指代 2001—2007 年期间，(4)、(5) 栏指代 2009—2013 年。这两个阶段内部的划分，是为了深入观察 TPU 对于贸易流量的影响随着时间有何纵向变动，也有利于比较这两阶段年限相同的时期有何差异。

表 1 出口数量与实施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的关系

	Quantity				
	(1) 2001—2003	(2) 2001—2005	(3) 2001—2007	(4) 2009—2011	(5) 2009—2013
t	- 168. 14	- 194. 50	- 233. 61	- 463. 39	- 476. 80
	(- 3. 61 ***)	(- 5. 25 ***)	(- 6. 58 ***)	(- 1. 73 *)	(- 1. 77 *)
TPU	- 75. 82	- 89. 87	- 102. 13	- 43. 34	29. 24
	(- 2. 67 ***)	(- 3. 97 ***)	(- 4. 71 ***)	(- 0. 23)	(- 0. 16)
GDP	26. 48	23. 91	28. 94	70. 20	87. 70
	(3. 10 ***)	(4. 28 ***)	(7. 37 ***)	(2. 73 ***)	(3. 21 ***)
ratio	25. 39	- 24. 58	28. 20	2982. 18	5421. 46
	(- 0. 3)	(- 0. 35)	(- 0. 42)	(- 0. 9)	(- 1. 51)
L	- 648. 01	- 472. 05	- 704. 99	- 14742. 60	- 27561. 43
	(- 0. 47)	(- 0. 41)	(- 0. 64)	(- 0. 73)	(- 1. 34)
comlang	2008. 12	1928. 95	1639. 01	2816. 62	7648. 82
	(- 1. 4)	(- 1. 62)	(- 1. 42)	(- 0. 19)	(- 0. 5)
_ cons	4236. 22	4587. 93	5496. 31	36990. 29	67441. 00
	(- 1. 02)	(- 1. 34)	(1. 65 *)	(- 0. 64)	(- 1. 18)
N	79385	139502	199549	47318	73833
F	6. 51	13. 01	23. 59	8. 18	11. 11

	Quantity				
	(1)	(2)	(3)	(4)	(5)
	2001—2003	2001—2005	2001—2007	2009—2011	2009—2013
R ²	0.0005	0.0006	0.0007	0.001	0.0009
Adj. R ²	0.0004	0.0005	0.0007	0.0009	0.0008

注：括号内为 t 值，*、** 和 *** 表示在 10%、5% 和 1% 下的显著水平。由于本文在进行各变量的匹配时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回归时的观测值较之前的少一些。

表 2 出口价值与实施关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的关系

	Value				
	(1)	(2)	(3)	(4)	(5)
	2001—2003	2001—2005	2001—2007	2009—2011	2009—2013
t	-62.16	-84.12	-110.64	-257.53	-266.97
	(-6.40***)	(-9.01***)	(-11.14***)	(-5.37***)	(-6.79***)
TPU	-31.52	-46.54	-62.93	-175.82	-176.88
	(-5.32***)	(-8.16***)	(-10.38***)	(-5.19***)	(-6.71***)
GDP	11.27	15.55	16.84	20.03	22.01
	(6.34***)	(11.04***)	(15.33***)	(4.35***)	(5.52***)
ratio	8.28	22.80	20.38	-934.12	-1052.05
	(-0.47)	(-1.29)	(-1.08)	(-1.58)	(-2.01**)
L	-312.01	-435.71	-529.28	5371.07	6782.68
	(-1.10)	(-1.52)	(-1.73*)	(-1.48)	(2.26**)
comlang	990.04	1160.75	1407.11	-8712.03	-10474.67
	(3.30***)	(3.87***)	(4.35***)	(-3.25***)	(-4.72***)
_cons	1877.78	2327.82	3027.96	-9949.42	-14587.75
	(2.17**)	(2.69***)	(3.25***)	(-0.96)	(-1.75*)
N	79385	139502	199549	47318	73833
F	26.73	59.08	98.46	29.19	46.27
R ²	0.002	0.0025	0.003	0.0037	0.0037
Adj. R ²	0.0019	0.0025	0.0029	0.0036	0.0037

注：括号内为 t 值，*、** 和 *** 表示在 10%、5% 和 1% 下的显著水平。由于本文在进行各变量的匹配时存在较多的缺失值，回归时的观测值较之前的少一些。

从表 1 可知，大体上解释变量对于出口数量的作用方向符合预期， t 、TPU、 L 对出口数量影响为负，GDP、ratio 和 comlang 对出口数量影响为正。尤其在 2001—2007 年期间， t 、TPU 与 GDP，均显著地通过了 t 检验。

2001—2007 年，随着协定签署时间越长， t 和 TPU 系数的绝对值是逐渐递增的，说明它们对于出口数量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且 TPU 对于出口数量的影响，在考察期内是逐步释放出来的。GDP、ratio 对出口数量的影响整体上较为稳定但有少许波动，而 comlang 这一项对出口数量的影响则在不断减弱。这说明，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推进，语言与贸易成本的关联逐渐变弱，这可以理解为有更多具有外语才能的从业人员加入了国际贸易行业，降低了沟通的难度。2009—2013 年， t 和 GDP 系数的绝对值有显著增加，而 TPU 的系数则为正，但这两个系数均不显著，并未通过 t 检验。

从表 2 可以看到，三个核心变量均符合我们的预期， t 和 TPU 的降低促进了出口价值的升高，而 GDP 则与出口价值呈正相关。并且不同于表 1，这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地通过了 t 检验。

结合两表情况，除开表 1 中 2009—2013 时期，整体上 t 和 TPU 对出口数量和价值的作用方向是清晰和显著的。TPU 对于贸易的影响，类似于实施关税，均能提高贸易的成本，使得厂商不倾向于出口。同时，巧合的是，观察 t 对出口数量和价值的影响系数，约为 TPU 系数的两倍。说明，实施关税相较于 TPU 对于贸易的影响始终更大。

表 2 和表 1 的差异在于，ratio、 L 和 comlang 的系数在 2001—2007 与 2009—2013 这两个时段符号发生了反转，表 1 中，这三个解释变量的符号符合预期，而表 2 中则不然。出现这种情况，有如下几种原因：

1. 中国和东盟多年的贸易发展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加强了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原有的贸易环境发生了改变，从而降低了这几个变量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在此期间，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自有着极大的提高，但彼此之间又不平衡，贸易种类的增加以及贸易结构的改变也会改变这几个变量对贸易的影响机制。
2. 数据的选取和设计上发生了偏误。一方面，ratio 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方向起初就难以确定，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ratio 接近 1），还是一方超越另一方（ratio 大于或小于 1），哪种最适合贸易的开展，既需要结合贸易结构来判断，也尚未有定论。其次，本文在 L 的处理上采取了简化方式，用了两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用作代替，相较于实际情况来说，过于简单。运输成本的计算，需要考虑运输方式、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港口和机场的分布等诸多因素，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再次，comlang 这一因素随着两国贸易的加深和具有语言能力的从业人员增多，对贸易的影响力逐渐被削弱。相较于两国的政治

关系、文化差异和宗教信仰来说，共同语言还不足以代替这些因素对贸易的影响。

3. 产品单价的调整和汇率波动造成的相对价格变动也是两表差异的重要因素。2001年，美元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2左右，人民币自2004年起开始升值，2008年美元人民币汇率跌破1:7大关，随后一直在1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的区间内波动。即使在产品单价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的相对升值也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升高，会直接冲击出口产品数量，但出口价值的变动方向则难以确定，因为价格升高可能会弥补数量降低的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来预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利用2001—2013年中国出口到东盟的产品级数据来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厂商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作用类似实施关税，但影响程度不及后者。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贸易政策的影响具有时滞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增强。

结合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自由化水平，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1. 扩充自贸区协定内容和范围，直接降低关税壁垒和不确定性。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客观来说，自由化水平仍然较低，仅有90%的产品实现了零关税，尚未实现零关税的产品中还包含了大量敏感产品和关键性产品。为进一步释放政策对双边经贸的促进作用，应扩充现有协定内容，加快降税进程，更大幅度地降低乃至取消关税壁垒。同时，对更多行业和部门放开准入限制，降低进入门槛，使得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关税壁垒的降低不仅能直接降低出口厂商的成本，在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能更好地发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2. 提高行政效率，破除非关税壁垒，控制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与关税壁垒相比，非关税壁垒的破除更为迫切。非关税壁垒的存在客观上增加了厂商进入出口市场的难度，造成了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损伤了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关税的积极性。因此，要释放贸易潜力，必须破除各种非关税壁垒，加强双方海关合作，建立单一窗口制度，简化行政手续，降低原产地证书费用，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3. 搞好信息服务，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时滞性。政府相关部门应主动将自贸区的目标计划、具体方案和程序手续等与相关的外贸厂商、行业协会进行沟通和宣传，吸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出口企业了解最新信息。

（二）增强政治互信，强化谈判的统筹决策与内部协调

1. 强化统筹决策与内部协调，应对谈判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谈判进程陷入僵局、久拖不决或多回合反复谈判等谈判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造成前景的不明朗和各种变数，影响出口厂商和民众对自贸协定的预期和信心。中国应借鉴日韩经验，重视涉外谈判建设，由国家相关部门统筹决策政策实施方案，协调各方意见，于谈判前达成共识。

2. 提高谈判的针对性和务实性，化挑战为机遇。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以及与中国关系等各方面均有不同，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也有较大差异。我方应增强针对性，深化对利益相关方的关注和分析，对不同谈判对象采取有所区别的谈判策略。同时增强务实性，若谈判过程中出现不可控的变数，暂时难以实现长远目标，可先寻求达成阶段性成果，逐步推进谈判进程。

3. 增强政治互信，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保持了长久的友好往来，但也存在着制度差异和利益分歧，比如东盟各国之间以及中国和东盟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领土争端会带来政治猜忌与敌对，甚至是军事对峙，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直接影响因素。中国应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重要政治共识的原则上，积极推动和平友好协商谈判解决南海争端，与东盟诸国巩固政治互信，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经济和贸易政策才能得以顺利贯彻。

（三）多元化投资主体，深化金融合作，应对市场风险

1. 灵活经营策略，多元化投资主体，应对贸易风险。中国出口商对东盟进行出口或者投资，应根据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灵活的经营策略，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来应对上文所谈到的各种潜在贸易风险，如谈判进展缓慢、两国政治局势恶化等不确定性的体现。比如当出口形式的贸易受阻时，可以采取直接投资或合资等形式来应对，在生产和销售上尽可能本地化，分散原材料的采购和生产等。

2. 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应对汇率风险。中国应与东盟各国深化金融合作，建立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推动双边本币互换，鼓励本币结算，阻隔各种外部因素对区域内经贸发展的冲击。一方面规避汇率波动引发的价格和成本等波动；另一方面，可以东盟作为切入点，逐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参考文献:

1. 陈勇兵、付浪、汪婷等:《区域贸易协定与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微观数据分析》,《国际商务研究》2015年第3期。
2. 蒋冠、霍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潜力——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管理》2015年第2期。
3. 姜书竹、张旭昆:《东盟贸易效应的引力模型》,《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4. 金雪军、钟意、王义中:《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后果》,《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年第2期。
5. 丘东晓:《自由贸易协定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6. 佟家栋、李胜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6期。
7. Avinash Dixit. Entry and Exit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NO. 3. (1989).
8. Elhanan Helpman, Marc Melitz, Yona Rubinstein.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 2007, *NBER Working Paper No.* 12927.
9. Lauren Deason.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Exporting: An Empirical Study. 2012, *Working paper*.
10. Ling Feng, Zhiyuan Li, Deborah L. Swenso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2014, *CES Working Paper No.* 4780.
11. Kyle Handley. 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Evidenc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11.
12. Kyle Handley, Nuno Limão. 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2012, *NBER Working Paper No.* 17790.
13. Kyle Handley, Nuno Limão.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and Welfare: Theory and Evidence for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 S. 2013,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376.
14. Marc J.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Vol. 71, No. 6 (2003): 1695-1725.
15. Scott R. Baker, Nicholas Bloom, Steven J. Davis.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2015, *NBER Working Paper No.* 21633.
16. Thomas Chaney.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 4: 1707-1721.

责任编辑:沈家文

· 理 论 前 沿 ·

论我国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作用

姜义茂

摘要：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已进入规划性市场经济时代。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为来源，以 ICT 及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服务生产方式为支撑，以经济全球化市场为背景，以中国经济社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依据，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和新规律基础上提出的理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既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概括，又力图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操作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规划不到位，市场经济也不到位。应加快推进中国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规划性市场经济 服务生产方式 信息通信技术 政策措施

作者简介：姜义茂，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业务二处处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导师。

全球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继微观经济学时代、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时代与计划经济学并存时代后，迎来的用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

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计划经济理论的合理内容为来源，以信息通信技术（ICT）及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服务生产方式为支撑，以全球化市场经济

为背景，以中国经济社会、美国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为依据，在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和新规律的前提下提出，由 ICT 及互联网技术、服务生产方式和规划性市场经济三个层面构成的经济理论体系。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既立足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又力图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指导作用，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操作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应加快推进中国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一、规划性市场经济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实践依据和时代背景。经济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形成的 240 多年，就是根据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规划性市场经济是依据经济社会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并着眼发展大趋势而创建的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力求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依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性质而形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规律的不同特质，就应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才能使经济社会始终在正确的道路上行。

经济理论的落后或缺位会导致经济发展方向迷失，甚至更严重的后果。纵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现今全球经济面临的困境，可以看出经济理论的先进与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2014 年说：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5 年后的年终总结是令人抑郁的。是的，我们避免了大萧条，却步入了大萎靡，发达经济体大部分人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他还指出，2008 年金融危机说明主流经济学范式已经减弱，对经济不仅毫无作用，甚至是有害的。但能够解决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经济学范式在哪里，无言而知。世界经济发展至今仍在低迷中徘徊，前景难测，究其深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理论滞后。

一种理论学说范式减弱，说明这种理论体系的根源出了问题。追根溯源找到关节点，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并形成新范式，才能从根本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和方向问题。为此，本文提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所谓“规划性市场经济”就是在实施市场经济中，于宏观上对经济发展进行规划，于微观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一）规划性市场经济是时代的产物

一种理论的创立，一定是依据当时能够代表经济发展方向、有引领作用国家的实践为基础而产生的，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时代的产物。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每一次经

济实践发展跃升到一个新阶段，就会产生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

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创立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其关键词是“看不见的手”，让市场配置资源，实行完全自由竞争。这一理论是研究了人及社会诸多关系，依据当时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而形成的。蒸汽技术革命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很低，生产和产品没有标准及批量生产，采取的是工场生产方式，市场规模和范围有限。在这种状况下，企业比较容易了解竞争对手以及整个市场的境况。加上社会商品短缺和巨大的市场开发空间，可以任由企业投资生产，无需政府介入或干预市场，由“看不见的手”驱使市场资源合理流动配置，自发地调节市场。因此，微观经济学理论有效地揭示和解释了当时的市场规律，推动了经济蓬勃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技术全面转换升级，促使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尤其是福特生产方式的发明以及向各行各业的全面推广，使工业技术能量得以最大限度释放，生产率呈十倍提高，生产地域和市场范围迅速扩大，产品极其丰富，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加上就业、工资、劳保和公共事务等社会问题，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大小小的由经济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人们对仅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发展产生了质疑和论战，出现了多种理论和流派，其中计划经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选择的与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径。1929 年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大萧条蔓延到世界，在经济理论论战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脱颖而出，与微观经济学理论形成配套理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成。在宏观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有效抑制了长达 13 年的经济大萧条，标志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独霸天下时代的结束。

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从诞生那天起，就确立了其强心剂式刺激经济的短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定位，而长期还是要靠微观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业界普遍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这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不符，尤其是政府中长期介入和干预市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相冲突。因而，经济危机一过，政府退出，微观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又登堂入室，主宰经济发展。如此，几年后经济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再现，就又扛起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大旗。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配套运用，似乎成了所谓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经济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把国家制度与市场经济规律捆绑在一起，用制度诠释和绑架市场经济规律，把经济理论抑制在制度框架内，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诚然，宏观与微观经济学理论正在由对立走向融合，但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仍然是现有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指导实践的基石。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证明了，在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换的新时代，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对经济发展

指导无力，甚至还证明了其有害。

在计划经济下，前苏联的经济直到二战前后取得的巨大成功，被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而计划经济将企业管理的微观模式机械地套用在国家经济管理的宏观层面上，不仅压抑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把本来十分活跃、充满生机的市场固化，不可避免地使经济理论和实践陷入僵化境地。随着苏联解体，计划经济被彻底否定，全球几乎一边倒地转向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不可否认，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确实能够发挥独特作用且成就斐然。但计划经济与人的天性和社会运行总体规律不符，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律不符，长期坚持就会违背规律，产生负面结果。

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胜。诠释这种优胜的根本就是中国实施了规划性市场经济。先进的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与世界经济发展阶段、趋势及规律相适应，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进步的关键。可见，继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计划经济之后，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正在形成。这三个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应用，都是经济发展跃升到新层级、经济社会进入到新时代的产物。

（二）规划性市场经济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从经济学角度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顺应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是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与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都存在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经济社会发展到了需要国家纵览全局的时代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是自由发展、依靠自动调节，政府基本在市场经济上没有发挥作用的职能和位置。即使到了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已形成了全球化、平面化和网络化市场经济关系的新局面，并正在形成供给型市场向需求型市场转变的新格局，产生了新规律，却仍然抱着 200 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的老规矩少有变化。政府在宏观经济指导上的缺位或不到位，是出现经济危机、市场无序竞争、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根源。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论说，已经与实践不符。规划性市场经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引导、甚至主导作用，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矛盾。政府掌握对内外经济社会资源和权力，具备了掌控市场经济发展全局的充分条件，这是任何组织和企业所不具备的。国家对经济发展现况和趋势的预测能力，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定位和方向，对市场经济发展采取的法规、政策措施，在经济运行中掌控方向、纠错、补充和完善等，决定了其在市场经济发

展中的引导或主导作用，也决定了其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一方的定位。

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政府的作用还微不足道，那么随着技术更新、生产效率提高和市场经济规模扩大，尤其是政府掌控巨大的财政税收资金和对资本的控制力，以及经济和社会同时作用于市场经济的状况下，政府的作用在不断扩大与深化。特别是在 ICT 及互联网技术、新的生产方式革命作用下，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跃升到极其复杂的新层级。靠市场自发调解和平衡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靠短期局部间歇式有限的宏观手段调控经济，也不能有效地掌控经济发展全局，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失控并出现大波动和大危机。由此，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并形成了新的发展规律。经济的有效运行，不仅要靠市场主体自发地配置资源、平衡市场，还必须依靠国家在宏观层级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关系、引导资源配置，以保障经济有效运行和不断发展。

规划性市场经济是通过规划明确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和趋势，以及基本框架、结构和重点等，为市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国家在宏观层面对市场经济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及掌控，正是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国家通过规划引导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成为趋势。近年来，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上更多使用财政政策，而且使用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对市场运行更有效益的观点，也被发达国家普遍认可，并且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更是证明了财政政策对市场运行的有效性。大量的财政资金无论投向哪里，都将进入市场。政府投资对市场起到了引导作用。而政府投资是在规划框架下的投资，是在充分考虑市场运行和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投资。这种投资经过反复论证，具有了市场化投资性质。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一贯主张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铁规。中国以及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佐证了规划性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先进性和科学性，为世界经济发展树立了典范。

2. 宏观规划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作用的必要条件

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就是任其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发展，在宏观层面缺乏规划和掌控，一旦出现了大的经济波动或危机才采取措施。这种后置措施和临时抱佛脚的做法，无疑会使市场遭受巨大损失甚至重创。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是这种配置要有效。如果是低效和无效，甚至效果相反，像发生经济危机，就失去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应有作用。因此，市场配置资源是有条件的，一要防止市场主体盲目投资，二要抑制市场主体为了逐利不择手段的恶意投机和恶性竞争，造成市场发展方向和结构失衡。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源于市场，要服从并服务于市场运行规律。在宏观层面规划，不是僵化市场，反之是创造宏观市场环境，让市场更加活跃。企业能够在比较充分了解宏

观大势的情况下参与市场竞争，大大减少了对宏观大势知之甚少的情况下，盲目参与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损失，同时抑制市场主体的恶意投机和恶性竞争，不断把市场调整到激烈而有序的竞争状态，这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有效作用的必要条件。

3. 规划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规划就是在宏观上形成有引导和有协调、有方向和有秩序的市场竞争局面，为微观上的企业竞争创造条件，激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以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的整体竞争优势。国家通过规划体现引导市场经济发展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相一致的，是作用于不同层面的对立统一整体。无论规划制定，还是规划实施，都是在与竞争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规划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在宏观层面的展现。市场配置资源不仅仅是市场主体本身的事情，通过规划引导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是对市场主体配置资源的有益引导和补充。特别是国家引导配置资源在发展新技术、新产业、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严格地说，纯粹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是没有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场规律变化，规划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质的提升，成为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展现出规划与市场融合整体发展的新趋势。

4. “四方面相适应”奠定了规划性市场经济基础

所谓“四方面相适应”就是规划性市场经济与中国传统文化、国家体制、ICT 及互联网技术四个方面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辩证统一的整体性和方法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的整体思想和方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轮回相遇。深厚的文化积淀为规划性市场经济提供了生长的思想文化沃土。规划性市场经济是整体解决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中国国家体制机制的整体性与规划性市场经济思想方法的一致性，为实行规划性市场经济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技术和生产方式是经济形态的基础。ICT 及互联网络技术、服务生产方式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论和方法论，与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相一致。由此，规划性市场经济，与现代技术、生产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体制机制四个方面的一致性，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筑牢了坚实基础。

5. 规划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本质差别

计划经济是国家通过从宏观到中观和微观统一计划，严格管控到企业和产品，强调从上到下步调一致，企业没有自主产销权。国家统一下达生产指标、产品分配、配给销售和计划供应。在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僵化计划经济形态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规划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市场经济，虽然吸取了计划经济的合理内核，但与其有本质的

差别。从宏观层面规划，且规划的许多方面和内容是指导性、引导性和约束性、非强制性。规划主要面对的是宏观市场，不直接对微观的企业。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充分展示自己的竞争能力，企业的生产、销售和管理完全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规划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具有本质差别。由于中国实行了近 30 年的计划经济，人们一谈规划就很容易跟计划经济联系起来，也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确立规划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以及规划性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属性，澄清模糊认识，是深化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实践，推进其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发展的重要方面。

6. 规划性市场经济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区别

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属前置性、长期性和全局性，后者属后置性、短期性和局部性，这是二者在市场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区别。

在前工业化时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狭义的商品交换市场，而现在市场涉及面之广泛和人们对市场的认识程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采购、公共和国防支出、社会保障等领域均参与了市场竞争，具有了市场属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市场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业化时代，已在更广、更深的立体范围展开。规划将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运行整体，将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国防等众多方面一揽子通盘考虑，具有了国家战略性。规划性市场经济从更深层次揭示了经济学的本源并践行，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鲜明区别。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还将技术和生产方式作为理论基础及支撑，拓展了理论深度，增强了理论的立体性和实用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视角，开辟了新路径。

（三）规划性市场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普遍指导作用

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在于力求揭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克服西方经济理论对宏观市场掌控缺位或不到位的弊病，将使全球经济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新的范式。

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国家在宏观把控上的缺位或不到位，是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保障市场竞争的有序和有效性，最大限度避免经济危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的先进性和有效性被中国的实践所证明，为世界树立了典范。全球看中国，不仅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更在看这些成就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中国要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不仅在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实际上，中国所倡导和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在国际组织和

多双边经济交流合作与贸易发展中推出的众多规划，就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在全球的具体运用。规划成为中国对外经贸“战略”得以顺利有效推进的重要一环。

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正在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思想论和方法论，已经和正在被许多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借鉴采用，影响力日益深广，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理论，将在全球经济社会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规划性市场经济以全覆盖技术为基础

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全覆盖技术的全面应用，必然引发经济革命，从而促使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范式的形成，以适应经济技术革命的要求。ICT 及互联网技术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得以科学发展的根基。

（一）ICT 及互联网技术是对工业技术的革命

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石器技术时代、农业社会的手工工具技术时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化工电力技术时代，这些技术基本上归于有形、单体和无智慧的技术，实质上都是人类四肢的延伸。ICT 及互联网技术是人类大脑的延伸，是无形、群体、全球化和智能化的技术。一个时代的技术如果对上一个时代的技术构成全覆盖，就会引发技术革命，从而导致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农业技术对原始技术的革命，使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工业技术对农业技术的革命，使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同样，ICT 及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对工业技术全覆盖的技术革命。这种全覆盖通过嵌入式软件将工业化技术和装备水平全面提升到了智能化的新层级，为发展到顶峰的工业化技术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活力；通过与工业技术结合并控制具有了超人功能，众多超人功能单体组成的互联网，产生出巨大的群体智慧可以集中服务于一点，全面提升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能力；通过物联网将单个的设备连接控制，可以整合全球的智慧进行生产；通过网络终端使人们享受到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服务。ICT 及互联网技术正在革命性地改变人类的一切，而这种技术仅仅处于发展初期，其发展空间之大、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的作用之深远难以估量。

对一种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性质的界定，不仅影响对这种技术的认识，还影响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识，以及对经济理论的认识。将 ICT 及互联网技术定性为工业技术，混淆了其与工业技术质的差别，不利于找准经济发展路径和创新经济理论。ICT 及互联网技术是服务性技术。即为生产和生活由供给性转向服务性提供技术基础保障。就生产而言，互联网将企业内部生产互联网与全球生产互联网链接成内外互动网络，生产要素

依托内外互联网，在动态竞争中提供服务性生产；从市场的角度看，工业化技术基本是供给性技术，市场被动地接受这种技术制造的产品，ICT 及互联网技术可以在标准化大生产的前提下，提供服务性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产品需求，将制造性生产转为服务性生产，市场由制造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为主导，技术是服务经济社会的架构基础。

（二）看不见的手显形了

微观经济学的名言即市场是“看不见的手”。在工业化时代，信息和决策的不对称导致市场主体获得市场信息的程度有限，是影响其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ICT 及互联网技术开启了全数据时代。所谓全数据是相对于工业化时代的点线面状数据而言。ICT 及互联网技术能够进行全方位和内外在的信息收集与整合利用，全数据时代是对工业化点线面状时代数据收集程度和处理能力的革命。随着全数据时代的发展，“看不见的手”也随之逐渐显形，变得越来越清晰，成为“看得见的手”。由此，经济社会将跃升至一个极其透明的新时代。

（三）ICT 及互联网技术是整体思维技术

ICT 及互联网技术与工业化技术的区别是其展现出的整体性、战略性和智慧性。IBM 自 1994 年开始由制造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把基于 ICT 及互联网技术基础上为客户提供的软硬件服务称为“整体解决方案”。整体解决方案的实质就是战略性、智慧性和生态性解决方案。整体解决方案为客户奠定了采用服务生产方式的基础。整体性服务技术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撑。整体解决方案也为不断创新的整体性服务技术提供了思想论和方法论。整体论的思想及方法已被众多企业和行业认可，并践行于企业管理中，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华为就是其中之一。ICT 及互联网技术促进了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创新方法的革命。人们从单个、单向思维，跃升到内外在动态开放的整体思维及整体解决问题的思想论和方法论，这是比单个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创新，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源泉。

（四）ICT 及互联网技术为规划性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

一种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应用，一定建立在全覆盖技术基础上。规划性市场经济正是以 ICT 及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理论。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社会进行全面规划、整体安排，一定要具备强大的信息收集能力、迅速的传输能力、深刻的综合判断能力、强有力的规划制定和实施驾驭能力。这些能力的形成，必须借助于基础技术，而工业技术不具备这样的性质和能量，ICT 及互联网技术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

基础。计划经济僵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当时没有像 ICT 及互联网这样的基础技术。工业化时代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利用达不到宏观经济对信息的要求，造成了计划经济的僵化，这与本质上活跃的经济形成了巨大反差，必然产生强烈的矛盾。随着工业化技术的不断进步，计划经济压抑了生产率的提高，矛盾也不断加深，再加上在其他诸方面矛盾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使计划经济彻底崩溃。规划性市场经济将 ICT 及互联网技术作为基础技术，回应了宏观经济理论创新对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 ICT 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提供的基础技术会更加厚重坚实。

三、规划性市场经济以服务生产方式为支撑

生产方式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每一次全覆盖技术的应用，都会引发一轮经济革命，而全面支撑经济革命的是生产方式革命。生产方式革命必将导致经济理论创新，进而导致整个经济社会变革。服务生产方式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的支撑和中坚力量。

（一）生产方式使全覆盖技术得以充分发挥

本文所提生产方式是指企业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源于全覆盖技术，不同性质的全覆盖技术决定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原始社会是群猎生产方式，农业社会是手工作坊生产方式，工业社会是流水作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生产方式，ICT 及互联网技术产生服务生产方式，全覆盖技术是生产方式变革的源泉和基础。所谓服务生产方式即以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为主导，生产方整合全球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客户可以参与生产全过程，提供服务性产品的生产方式。

服务的本质是生产，服务生产与生产的区别主要是生产方式的不同。服务主要是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不是生产内容。所谓服务既是服务也是生产，服务在生产过程中不能确定产品的所有权，当生产完成时必定提供给消费者。这里道出了货物与服务的区别，货物交易是点状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刻货的产权转移；服务交易是线状的，服务生产的交易具有过程性，过程结束时才能确定产品所有权。服务业并服务贸易的产生，是在生产方式作用下社会化分工的结果。要是用货物贸易的思维去诠释服务贸易，用制造业思维去诠释服务业，就会片面理解服务单独发展服务业，而忽视了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升级。对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认识出现了误区，大力发展服务业就难以奏效。由此，转变生产方式是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贸易的关键。

社会分工方式取决于全覆盖技术。服务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化分工，与工业和农业技

术下的社会化分工作具有层次和性质的不同。无论在分工的微观和宏观层面，还是在技术和流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别。社会化分工性质的变化升级，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变化升级。服务生产方式是新的全覆盖技术和新型社会化分工下的产物，这种分工具有新的规律性特质。工业化时代将经济划分为起基础作用的农业、主导作用的工业、以及保障作用的服务业，三个产业构成了立体式产业格局。在 ICT 及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正在向平面化格局转变，致使一、二、三产业和企业及生产各环节交织在一个平面上，直接面对全球市场。市场主体及生产各环节置于纵横交错的服务生产网络之中，形成开放式全球服务化生产的新局面。

在服务生产方式作用下，服务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高速流动和整合中，使产业和企业结构优化的速率大大提高，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服务生产方式促使创新不断、生产集约、效率提高、质优价廉、绿色环保。服务生产方式成为继工业化生产方式之后又一个革命性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美国企业的引领下正在向全球快速推行，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在高位强势发展的根本力量。服务生产方式改变了以整合工厂内部生产要素为核心进行生产的工业化旧生产方式。创新出以整合全球生产要素为核心和客户全程参与进行生产的新方式。服务生产方式整合全球生产要素，通常采用以下方法：一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如各类众创平台。二是网罗全球人才。如 IBM、华为从全球范围吸纳人才。三是建立全球共享网络。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以中心为纽带整合所驻国家的生产要素为己用，并形成全球纵横相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共享网络。如 IBM 在全球设立 100 多个分支机构，在当地建立生产要素整合系统，构成多层次覆盖全球的要素资源网，广泛利用当地人才和机构等生产要素，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共同协作，提供内外服务。四是服务外包。将生产各个环节的大量生产任务外包给全球范围内性价比高的企业承担等。IBM 等众多发达国家企业和华为等中国企业均综合采用了这些方法。

服务生产方式正在改变供给方为主导的工业化市场格局，确立以需求方为主导的市场格局，使生产具有服务功能，供给与消费融为一体。像工业 4.0 和工业互联网实现了网络个性化定制，客户和社会全程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等，服务双方在生产互动中形成了整体。服务生产方式是与 ICT 及互联网技术相适应的先进生产方式，正在快速向众多行业推行，成为继工业生产方式之后的革命性生产方式。历史上美国和德国之所以能够赶超英国，日本之所以能够赶超德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以及现今美国经济依然引领全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是他们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率先采用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即福特生产方式、丰田生产方式、服务生产方式，这是超越式经济发展

的决定力量。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转变生产方式，即采用服务生产方式。

（二）服务生产方式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

一种经济理论体系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支撑。在亚当·斯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时代，有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作坊和工场生产方式作为支撑；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时代，有与之相适应的泰罗制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福特生产方式作为支撑。生产方式的形成源于全覆盖技术，生产方式又是经济理论的支撑，服务生产方式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生产效率。经济理论的重要作用就是指引经济实践产生更高的效率，生产方式是提升实践效率的根本。

规划的制定是以全覆盖技术为基础，生产方式为支撑。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规划做得再好，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落后局面，生产方式决定了规划的先进与否。将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纳作规划的主线，是规划的基本要求，以及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标志。生产方式是连接技术和规划的中间环节。从以物质产品供给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方式，转向精神和物质并重，以个性化需求为主导的服务生产方式，是市场形态的重大变革。生产方式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体现着市场经济的先进与否，是规划性市场经济的理论支撑。美欧企业已经率先采用了服务生产方式，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在紧跟。服务生产方式的推广将改变市场格局和经济形态，将把生产效率提高到新阶段，支撑规划性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三）市场主导力量发生了变化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形成生产力的方式在不同经济发展时代呈现不同特性。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靠生产力，生产关系显得不那么重要，居于次要地位。随着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市场化深入，而今生产更多要靠汇聚全球生产要素，这就要依靠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关系先进与否，决定了汇聚生产要素的能力和使用效率，也决定了生产力水平。在服务生产方式下的企业管理居于生产关系层面，对于整合和激发生产要素及提高生产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了“无形生产力”的作用。从更高层级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为一体，将生产力发挥并提高到更大限度，其中生产关系是更高形式上的生产力。由此，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败的关键。

ICT 及互联网技术促使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调整中可以得到新的平衡。生产方式的变革客观上要求经济理论创新，以适应和指导新的生产方式发展完善。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基于 ICT 及互联网技术、服务生产方式之上提出的。规划的实

质是解决行业和领域等各方面的关系及结构问题。规划性市场经济与服务生产方式相适应体现为，都建立在 ICT 及互联网技术上，都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都以协调经济社会关系为重点。规划对宏观市场的结构、发展趋势、发展目标和方向等提出要求，并紧紧抓住推行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个主线。由此，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与服务生产方式的思想论和方法论相一致，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众多问题的纲。

（四）服务生产方式与服务生活方式融合发展

新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兴起。工业化的福特生产方式，使美国获得“车轮上的国家”的美誉，被称为汽车生活方式。丰富的物质生活，形成了以物质为基础的工业化生活方式。服务生产方式革命同样会引发生活方式的革命。现今服务生活方式已经在营销、物流配送等诸多层面展开推进。众多生活方面的需求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实现，且效率倍增，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多服务满足感。服务生活方式架构在 ICT 及互联网之上，可称为“网络化生活”，而服务生活方式革命仅处于初级阶段，仍在不断向纵深拓展。

工业生产方式下是卖方市场，市场基本是被动接受产品，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生产方式起主导作用。服务生产方式正在改变和颠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生活方式引导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相互作用融合发展，充分反映出服务的本质。而二者融合发展也促使人类经济社会跃升到服务经济社会的新时代。

四、加快推进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

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处于历史初创期，不仅需要不断完善理论，更需要在实践上取得更多更大的进步，为理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而目前中国在实施规划性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划不到位，市场经济也不到位。为此，当前应主要在以下方面加快推进的步伐。

（一）加快规划的专业化理论体系建设

中国是个规划国家，仅各级政府的各类规划就数以万计，形成了庞大的规划体系。但人们形容规划是“规划规划都是鬼话，墙上挂挂”“规划规划领导讲话”等。可以说，许多规划做完了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束之高阁。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划与经济社会运行严重脱节，指导作用缺乏有效性。

规划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蓝图，是工作的基本依据，指导性和实用性很强，这是由规

划的性质所决定的。制定规划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定规划者要具有规划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现有规划制定者大多数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制定一项专业规划必须具有这个专业的广博知识和实践经验，准确把握专业发展大趋势，而现况是这样的人才太少；三是具有将规划和专业融会贯通的能力，而这方面的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规划就像建造一座房屋，需要整体设计。规划中不同的行业或部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哪一个行业或部分地基，哪一个是柱、梁、椽、门、窗等，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都需要清楚。现有规划很少能达到这样的结构，且理清它们之间关系的程度。市场是动态的，规划也应是动态的，五年规划没有应急调整预案、阶段划分和阶段性调整、有效的落实跟踪机制等一整套保障措施是不可思议的事。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由于国家“五年规划”没有做与规划配套的遇到类似情况的应急预案，结果是 4 万亿元财政资金和 10 万亿元信贷资金集中投入到市场，但没有调整国家“五年规划”。投资与规划二者各行其是，规划与投资的巨大矛盾，是造成产能过剩和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僵化的规划与规划性市场经济中的规划差距巨大。加强规划性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建设，加快专业化、正规化人才队伍建设，是解决规划存在问题的关键。

一是建立规划研究机构。规划性市场经济是中国原创，其理论和实践正在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和作出贡献。需要建立国家规划性市场经济研究机构，建立强有力的团队进行系统理论攻关，不断充实完善。而目前这样的专业研究部门很少，水平不一，完全不能满足需求。设立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或在现有研究机构增设规划研究部门，建立全国研究队伍体系，是规划专业性、有效性和实用性的必要保障。二是建立教育培训机构。规划在规划性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总设计师的作用，需要培养制定规划的专门人才。目前中国没有规划专业类大学，现有大学也几乎没有规划专业学科和培训机构。应建立规划大学和在现有大学设置规划专业学科，设立规划培训机构，对从事规划的人员进行系统教育和在职培训。三是调整政府机构。规划性市场经济的规划制定和实施，是专业性极强的经济工作，与公共行政事务工作在性质上有较大差别。将规划业务从政府现有行政部门剥离出来，成立专事规划和经济工作的专业部门，主管规划和经济工作，实现政府公共行政事务部门与规划经济部门相分离，开拓创新出与规划性市场经济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化、正规化的政府经济管理之路。

（二）加快推进服务生产方式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企业，而现在把企业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实行混合所有制

改造的产权结构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固然必要，但建立企业制度的基础是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在落后生产方式之上的企业制度，再现代也不能解决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问题。日本 IT（信息技术）企业是顶尖的现代企业制度，但其全行业连年亏损，原因就是生产方式落后。美国众多企业、中国华为等企业先进的关键，是其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在服务生产方式之上。如果仍在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是治标不治本，企业仍然摆脱不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问题。加快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是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根本。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大多数企业基本上采用的是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水平相当的生产方式和企业管理。企业管理队伍主要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管理思想和方式滞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懂服务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管人才。加快这方面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像华为那样，引进国内外各方面人才为我所用。二要树立典型示范。各行业应树立采用服务生产方式的典型企业，发挥示范效应并推广。三要加快服务生产方式研究。分领域、分行业、分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深入研究，并提炼出服务生产方式模式。四要加快教育培养。改革大专院校相关教育内容，设置企业服务生产方式及管理的课程。五要发挥政府和国企的作用。国企是实施服务生产方式的主力，关系到能否推行服务生产方式的全局，发挥政府对国企控制的权威作用，加大在国企推行服务生产方式的力度，以此带动全国各行业跟进。六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将企业向服务生产方式转型升级纳入法规、政策范围加以规制和引导，加快改造和淘汰采用落后生产方式企业的进程。七要加大宣传。全社会把宣传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上，营造全社会提倡向服务生产方式和服务生活方式转型的氛围。

服务生产方式是企业所有制改革的基础，是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引擎和捷径。转变生产方式要比技术创新的难度大且复杂，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但其是经济发展的支撑，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命运的战略性问题。历史上，福特生产方式的推行使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丰田生产方式的推行使日本成为后起经济强国。而今，实行服务生产方式又使美国继续保持引领世界经济的地位，发展势头强劲。服务生产方式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三）夯实规划性市场经济技术基础

ICT 及互联网技术为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基础。而现在规划制定和实

施基本还处于工业化水平阶段，远没有利用好和发挥出其技术的优势作用。充分挖掘和利用 ICT 及互联网技术，就会使规划性市场经济在更加科学的道路上展示出巨大威力。

一是建立全数据网络中心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全国规划性市场经济全数据网络中心体系，专门从事与规划和市场经济相关的数据收集、加工和提炼，为规划制定和市场运行决策提供依据。二是建立规划模型体系。现全国众多规划的体例、内容等五花八门，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建立规划和市场运行计算机模型体系，包括国家总体规划、各层级、各领域、各专业的规划模型。模型以国家规划为总纲，并体现各级和专业规划的特点，以及上下左右规划之间的内外在衔接，形成规划体系。三是建立计算机模型研发管理队伍体系。规划性市场经济不仅在规划制定中需要模型，在规划的实施中有大量的全数据流动，需要建立全国规划性市场经济的技术支撑队伍体系，以持续提供技术的研发、维护和数据收集处理等全面保障。

总之，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建立在丰富的实践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规划性市场经济是理论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理论体系。全面深化规划性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需要转变思维方式、架构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及完善工作体系和保障体系，从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美] 维克托·R·福克斯：《服务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2.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3. 姜义茂：《商务工作推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途径》，《国际贸易》2007 年第 2 期。
4. [美] 琳达·S·桑福德、戴夫·泰勒：《开放性成长》，东方出版社 2008 年版。
5. 姜义茂：《服务贸易发展规律和战略抉择》，《财贸经济》2008 年第 7 期。
6. 姜义茂：《服务经济全球化时期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思考》，《财贸经济》2008 年第 9 期。
7. 姜义茂：《论服务经济社会的实质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国际贸易》2009 年第 5 期。
8. [英]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9. [英] 亚当·斯密：《国富论》，译林出版社 2011 年版。
10.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11. [美]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12.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5 年 12 月 21 日。

责任编辑：李蕊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11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态势

2016 年 11 月 19—20 日，凤凰网与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2016 凤凰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与国际商学教授鲁比尼在本次会议发表了主旨演讲，分析了目前全球经济形势。现在全球经济弱增长是一种新平庸的态势，全球经济的低速增长已经维持太长的时间，哈佛大学教授萨姆斯将其称为“停滞”。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潜在增长都在放缓，而且几年来实际增长都低于潜在增长率，这是去杠杆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衰退，更多是由公私两个领域的高负债、高杠杆导致的，而且这样一个时期可能需要十年去杠杆，也就是说需要更多储蓄、更少消费，使得公有和私有部门更好地储蓄。

一开始是美国和英国在去杠杆，楼市和信贷市场都出现了萧条。其次是欧洲和欧元区，公有和私有部门均负债过高。再次是 2013 年开始启动的去杠杆，当时资金涌入新兴市场，中国经济增长 10%。因为中国有一种叫做大宗商品的超周期，而且由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利率基本为零。所以资本到新兴市场去逐利，加上当时银根放松，在新兴市场包括中国也出现了公有和私有部门过度借贷。鲁比尼表示，现在去杠杆很痛苦。因为 2013 年之后，全球经济从原来的顺风转为现在的逆风前行状态。中国经济不再是 10% 的增长，而是 6%、7% 的增长，甚至更低，大宗商品的超周期结束，美联储加息，而且很多资本也离开了新兴市场，经济增长在放缓。因此，去杠杆的第三波正在新兴市场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首先是经济增长率较低，总需求不足，投资也不旺盛。另外，还有低通胀甚至通缩的情况，全球经济增长很疲弱。其次是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债务和赤字拖累了经济，不管是实际还是潜在增长。再次是现在收入不均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不仅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如此。这牵涉很多复杂因素，甚至有一些是贸易和移民在发达国家的体现。另外，新技术现在越来越使资本密集，同时要求更强的技能，导致如服务业也在损失工作机会，即不仅低技术而且中等技术水平的人也在失业，但政治、经济的力量导致政经精英能够获得更大收益。也就是说，收入没有上升，债务上升，且贫富差距扩大。这使得发达国家出现了民粹反弹，反制全球化，包括全球贸易、劳动力流动和移民，甚至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受限的情况。由于民主主义，外商直接投资受到了影响，甚至技术也在通过机器人技术影响工作岗位和收入。

总体而言，全球经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有不错的进展，技术的进步，新兴市场的发展，有更多的人力以及货物、服务的自由流动，这样可以很好地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二）全球经济始终未能走出“低增长”陷阱

2016年11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巴黎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近5年来全球经济始终未能走出“低增长”陷阱，各国政府应更好地利用财政手段刺激全球经济加速增长。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发布报告时表示，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疲软，但利率水平较低，这为各国采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提供了空间。不过，各国在采用财政手段时应注意将自身债务和赤字水平保持在合理范围内。

报告预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后，预计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2018年加速至3.3%、3.6%。报告上调了美国经济增速预期，称“特朗普刺激”成效显著。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速都会因特朗普对于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的承诺而受到提振。预计美国2017年和2018年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3%和3.0%，比上期报告提高0.4和0.8个百分点，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达到近5年内最快。特朗普的刺激措施不仅会提振美国经济，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也是利好。因为加大财政支出和减税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刺激投资，加大进口力度，并刺激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产出。OECD建议其他经济体的决策者考虑使用特朗普同款“药方”。同时，报告预计欧元区2017年和2018年经济增速分别为1.6%和1.7%；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1.0%和0.8%；受脱欧影响，预计英国经济增速分别为1.2%和1.0%。此外，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风险是威胁全球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两个“拦路虎”，对此应保持警惕。

（三）全球经济处于温和复苏趋势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了 2016 年 11 月月度经济报告，上调了对全球经济的评估，这是该国自 2014 年以来首次对该评估进行上调。报告认为，虽然局部仍见疲弱迹象，但是全球经济处于温和复苏趋势。因美国设备投资增加，上调对美国的经济评估。对日本国内经济的评估则维持不变，日本经济正在温和复苏，但近期显露疲态，11 月日本出口持平，工业产出显现提速迹象，商业投资出现增长，工业生产出现增长态势，同期日本就业状况有所提升，消费者支出仍然持平。报告特别指出，需要留意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日本金融和货币市场的影响。日本国内媒体评论称，因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公投退欧带来不确定性，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表示担忧。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特朗普就任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那么以出口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将会承压。

（四）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但面临不确定性

2016 年 11 月 28 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议会季度听证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上发表介绍性声明。德拉吉称，2016 年欧元区经济表现富有韧性，全球经济预计将持续复苏，欧洲央行政策是当前经济复苏中的关键元素。当前全球经济增速较危机前略微放缓，欧元区经济增速温和但稳定。到目前为止，欧元区经济受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的影响有所减小，顽强顶住了英国退欧的冲击波。全球经济正在面临显著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众多不确定性中最重要的因素，对不确定性具有显著反应的模式将消退，当前很难评估英国脱欧的最终影响。

关于货币政策，德拉吉表示，欧洲央行将在 2016 年 12 月评估选项。欧洲央行将保持令通胀推升至目标水平所需的非常高的货币宽松度，必须看到特朗普的政策才能评估其对利率水平的影响。企业债的购买十分成功。欧洲公民大体上支持单一货币。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以及担保债权总体上取得成功，单一监管机制也已取得显著成效，目前单一监管机制还需要更多资源支持，委员会将在年底前讨论更多的单一监管机制资源问题。欧洲央行当前正在解决债券稀缺问题，购债计划足够灵活，可以重新审视以维持货币宽松。欧洲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亦足够灵活，财政政策必须遵守欧盟规则，同意欧盟委员会有关财政政策的观点，必须解决不良贷款问题。

关于英国退欧，德拉吉称，英国经济开放程度下降，也会对欧元区产生有限的扩散影响，可能程度会小一些。整体而言，影响根据各国情况会有不同，取决于他们和英国的贸易联系。当前，欧元不存在信任危机，欧洲央行持续监控金融稳定风险；欧元区最大的风险来自经济增速疲软，不能忽视金融稳定性风险。

（五）2017 年全球经济面临三大不确定性

2016 年 12 月 2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在“2016 财新峰会”上指出，2017 年全球经济整体低位运行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确定的，但全球经济面临三大不确定性：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何实施，美国经济金融走势，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波动将加大。这其中，美国经济金融走势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都移到低增长轨道。过去 3 年全球经济持续低水平增长，与此同时，发生了一系列低水平经济活动，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跌，全球真实利率持续下降。未来全球潜在增长水平也会下降，全球经济将继续低迷。因为潜在投资增长水平、潜在劳动力增长水平都在下降，而随着科技发展，潜在劳动生产力水平有望提高。这是全球经济大背景，不是好消息但也不是坏消息，因为这是已预期、已确定的。

朱民把特朗普的政策归纳为三点：一是税收改革政策；二是贸易保护主义；三是加大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他认为这三项政策也是确定的，但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如何实施是不确定的，没有公布任何细节，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这将直接影响美国经济金融走势，成为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将会使得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巨大变化，风险溢价的再调整和再平衡将会引起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

（六）2017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提速

2016 年 12 月 8 日，OECD 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美国经济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已经开始提速，同时多个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提速迹象更加稳固。这预示 2017 年全球经济将摆脱 2016 年的疲软态势，实现加速增长。出于对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升经济和通胀的预期，全球资产价格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出现剧烈变动。不过 OECD 指标显示，在大选结果出炉前，美国经济已经开始走升，因此如果美国新一届政府采取过多刺激政策，经济过热的风险可能显著提升。先行指标还显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也都出现改善迹象。OECD 经济学家 2016 年 11 月预计，2017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 2016 年的 3.1% 放缓至 2.9%，但新出炉的先行指标预示，2017 年经济表现可能比此前预期更好。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境外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近日，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穆迪等境外机构陆续发布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各方认为，目前消费作为中国经济稳定器

的作用日益明显；工业增加值持续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规模已超过传统工业且仍在不断增长。随着稳增长政策效应的持续显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将延续企稳向好态势。

渣打银行称，中国稳增长政策空间依然巨大，预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将回升至 6.8%。渣打银行 2016 年 11 月 18 日发布报告称，从支撑全年经济增速回升的动力看，消费作为中国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日益明显，下半年净出口也会对经济增长做出正面贡献；服务业和工业都持续保持稳定增长；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信心明显增强。除内生动力涌现外，官方适度调控也是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目前稳增长仍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主题，官方政策工具十分充足，有能力继续出台相应支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空间较大，能够对经济形成支撑。预计 2016 年下半年中国 GDP 增速将回升至 6.9%，全年达 6.8%。

（二）中国经济整体呈稳定态势

瑞士信贷银行近日发布《2017 年投资展望》报告认为，2017 年全球经济将实现小幅增长，其中亚洲地区经济增速将达 5.9%。中国经济目前整体呈现稳定态势，“一带一路”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成为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报告将 2016 年中国 GDP 增长预期由 6.5% 上调至 6.6%，2017 年的增长预期由 6.0% 上调至 6.3%，增速仍将是全球平均经济增速的两倍左右。

（三）中国消费者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金砖四国”概念首创者吉姆·奥尼尔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消费者崛起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将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关注中国消费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只要中国消费者还在增长，对世界经济基本就比较乐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目前正努力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两年前，许多中国经济怀疑论者认为，如果中国投资放慢，中国消费无法保持强劲增长，但现在中国消费仍以 10% 的速度增长，消费者支出占 GDP 的份额正在逐渐增加，这是中国与世界所期待发生的。到 2020 年前，中国经济可能以 6%~7% 的速度继续增长。只要保持 6% 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对世界 GDP 增长的贡献就超过美国。

责任编辑：李蕊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世 界	3.4	3.1	3.1	3.4
发达国家	1.9	1.9	1.8	1.8
美 国	2.4	2.4	2.2	2.5
欧元区	0.9	1.5	1.6	1.4
日 本	0.0	0.4	0.3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4	7.4
俄罗斯	0.6	-3.7	-1.2	1.0
巴 西	0.1	-3.8	-3.3	0.5
世界银行(2016 年 6 月)				
世 界	2.6	2.4	2.4	2.8
发达国家	1.7	1.8	1.7	1.9
发展中国家	4.2	3.4	3.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2 月)				
世 界	2.8	3.0	2.5	2.8
美 国	2.4	2.6	1.6	2.3
欧元区	1.2	2.0	1.6	1.4
日 本	0.0	1.2	0.7	1.0
印 度	7.2	7.6	7.0	7.5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7	2.6	2.3	3.8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2	2.4	3.9
发展中国家	3.7	-0.6	2.3	4.1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6	1.8	3.5
发展中国家	2.9	1.3	2.9	3.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8	1.7
发展中国家	4.7	4.7	4.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2 月)				
世 界	2.6	1.9	2.5	2.8
美 国	1.6	0.1	1.3	2.4
欧元区	0.4	0.0	0.2	1.3
日 本	2.7	0.8	-0.2	0.5
印 度	6.0	4.9	4.9	5.0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4	0.3	2.5
	10 月	1.5	0.2	2.2
	11 月	1.5	0.2	2.4
	12 月	1.5	0.3	2.9
2016 年				
	1 月	1.5	0.5	2.7
	2 月	1.4	0.3	2.9
	3 月	1.2	0.1	2.6
	4 月	1.6	0.3	3.0
	5 月	1.6	0.1	2.7
	6 月	1.3	0.4	2.6
	7 月	1.4	0.5	2.7
	8 月	1.1	0.5	2.6
	9 月	1.3	0.6	2.9
	10 月	1.4	0.9	3.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0.5	-3.3	3.8			
	11 月	1.2	0.3	3.2	51.0	52.2	51.2
	12 月	0.6	-0.9	3.0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7	3.3	50.9	51.4	51.4
	2 月	1.9	-0.4	3.8	50.0	50.4	50.4
	3 月	1.2	-0.7	3.8	50.6	51.4	51.4
	4 月	1.2	0.1	3.4	50.2	50.4	50.4
	5 月	1.9	-0.2	3.8	50.1	50.0	50.3
	6 月	2.5	0.0	4.3	50.4	50.4	50.7
	7 月	1.8	-0.1	3.5	51.0	52.0	51.4
	8 月	1.8	0.9	3.9	50.8	52.0	51.0
	9 月	1.8	0.4	3.5	51.0	51.9	51.3
	10 月				52.0	53.6	52.8
	11 月				52.1	53.4	52.8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4 季度	2.3	4.6	-0.4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2.0	2.4	2.6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4	4.3	-1.7
	3 季度	3.5	3.0	0.8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5	4.3	4.4
	4 季度	1.3	4.5	11.2
2015 年		4.0	0.1	4.6
	1 季度	3.7	-5.8	5.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1.1	1.8	0.2
	3 季度	0.1	10.0	2.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4 季度	2.5	3.5	0.3
2015 年		2.6	3.2	1.8
	1 季度	3.3	3.6	1.2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3	2.7	0.7
	3 季度	1.7	2.8	0.4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5	4.3	4.4
	4 季度	5.3	3.1	6.1
2015 年		4.0	0.1	4.6
	1 季度	4.9	2.2	6.3
	2 季度	4.2	0.8	4.5
	3 季度	3.8	-0.4	5.1
	4 季度	3.4	-2.2	2.5
2016 年				
	1 季度	2.2	-0.9	1.0
	2 季度	0.8	-1.1	0.3
	3 季度	-0.5	2.0	0.6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 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 比 折 年 率	同 比		
2015 年		0.6		5.3	290.7
	11 月			5.0	28.0
	12 月	-2.4	0.4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6.8
	2 月			4.9	23.3
	3 月	-0.6	0.0	5.0	18.6
	4 月			5.0	14.4
	5 月			4.7	2.4
	6 月	-0.2	-0.3	4.9	27.1
	7 月			4.9	25.2
	8 月			4.9	17.6
	9 月	3.1	0.0	5.0	20.8
	10 月			4.9	14.2
	11 月			4.6	17.8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54.8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435.7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447.0
2016 年							
	1 月	1790.7	-2.2	-6.7	2221.0	-1.1	-430.3
	2 月	1810.0	1.1	-4.7	2262.6	1.9	-452.6
	3 月	1788.0	-1.2	-6.1	2157.3	-4.7	-369.3
	4 月	1818.5	1.7	-5.1	2200.4	2.0	-381.9
	5 月	1815.8	-0.2	-4.6	2234.1	1.5	-418.4
	6 月	1830.0	0.8	-3.9	2277.2	1.9	-447.2
	7 月	1863.5	1.8	-2.0	2259.8	-0.8	-396.3
	8 月	1879.9	0.9	0.7	2286.3	1.2	-406.4
	9 月	1897.7	0.9	1.2	2259.4	-1.2	-361.7
	10 月	1863.6	-1.8	0.4	2289.6	1.3	-426.0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716.0	2922.8	-1206.8
	4 季度	774.2	619.7	154.5
2015 年		3484.0	3031.8	452.3
	1 季度	1981.1	932.3	1048.8
	2 季度	809.4	864.3	-54.9
	3 季度	429.8	502.5	-72.7
	4 季度	263.7	732.6	-468.9
2016 年				
	1 季度	985.1	767.0	218.2
	2 季度	1468.8	765.9	702.9
	3 季度	764.0	836.2	-72.2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4 季度	0.4	0.6	0.2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0.8	0.5	0.4
	2 季度	0.4	0.5	0.4
	3 季度	0.3	0.4	0.4
	4 季度	0.5	0.4	0.6
2016 年				
	1 季度	0.5	0.7	0.6
	2 季度	0.3	0.2	0.4
	3 季度	0.3	0.3	0.5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4 季度	0.5	1.5	1.5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1.8	2.7	2.4
	2 季度	0.0	1.1	0.8
	3 季度	0.7	0.3	1.1
	4 季度	1.3	0.8	1.5
2016 年				
	1 季度	0.4	0.2	-0.1
	2 季度	1.2	1.2	1.2
	3 季度	0.2	0.1	0.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10 月				10.6
	11 月				10.5
	12 月	0.0	2.1	49.6	10.4
2016 年					
	1 月				10.4
	2 月				10.3
	3 月	0.2	-2.2	51.0	10.2
	4 月				10.2
	5 月				10.1
	6 月	0.0	1.5	53.6	10.1
	7 月				10.0
	8 月				10.0
	9 月	0.1	-1.0	31.7	9.9
	10 月				9.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4 季度	1.3	1.2	0.6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1.8	1.7	1.1
	2 季度	2.0	1.8	1.3
	3 季度	2.0	1.9	1.4
	4 季度	2.0	1.7	1.8
2016 年				
	1 季度	1.7	1.9	2.0
	2 季度	1.7	1.7	2.0
	3 季度	1.7	1.6	2.0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4 季度	1.0	5.3	5.6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2.1	7.1	6.8
	2 季度	2.8	7.2	6.3
	3 季度	3.0	5.7	5.9
	4 季度	3.9	5.0	5.9
2016 年				
	1 季度	2.4	2.4	3.4
	2 季度	3.6	2.5	3.8
	3 季度	3.0	2.2	2.9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进口额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出口额减进口额
月份		(%)	(%)		(%)	(%)	口 额
2015 年	20430		5.3	17964		2.2	2466
	10 月	1808	1.9	1575	0.2	-0.3	232
	11 月	1738	-0.1	1509	-1.0	4.9	229
	12 月	1687	1.4	1444	0.8	4.1	243
2016 年							
	1 月	1449	-2.0	1400	-0.9	-0.9	49
	2 月	1632	-0.3	1446	0.0	2.0	186
	3 月	1792	0.8	1504	-2.2	-8.1	288
	4 月	1726	0.3	1451	-0.2	-5.4	274
	5 月	1678	-1.7	1437	-1.0	-1.7	241
	6 月	1799	1.0	1502	1.4	-4.7	298
	7 月	1675	-0.9	1420	1.0	-8.3	255
	8 月	1603	2.4	1422	0.9	3.8	181
	9 月	1768	-0.5	1503	-1.6	-2.7	265
	10 月	1725	-0.3	1524	2.9	-3.3	201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99.0	66.0	-165.0
	2 月	220.0	665.0	-445.0
	3 月	121.0	259.0	-138.0
	4 月	389.3	446.2	-56.9
	5 月	458.6	558.6	-100.0
	6 月	-133.0	-109.0	-24.0
	7 月	-35.0	158.0	-193.0
	8 月	141.0	606.0	-465.0
	9 月	-519.0	-55.0	-464.0
	10 月	267.0	953.0	-686.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4 季度	0.5	0.6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1.5	0.6	0.9
	2 季度	-0.1	-0.4	0.1
	3 季度	0.2	0.5	0.4
2016 年	4 季度	-0.4	-0.7	0.7
	1 季度	0.7	0.4	1.3
	2 季度	0.5	0.2	-1.1
	3 季度	0.3	0.3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4 季度	0.1	3.4	1.1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0.7	1.6	0.3
	2 季度	-0.5	-3.7	-2.5
	3 季度	0.5	2.1	2.5
2016 年	4 季度	-0.5	-0.6	-0.9
	1 季度	-0.2	0.8	-1.2
	2 季度	1.7	-1.3	-0.9
	3 季度	0.1	1.6	-0.4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0.1	-3.6	1.2
	2 季度	1.8	1.0	1.7
	3 季度	2.1	1.2	1.6
2016 年	4 季度	1.1	-0.1	2.2
	1 季度	0.4	-0.1	2.7
	2 季度	0.9	0.4	1.4
	3 季度	1.1	0.3	1.2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4 季度	-3.1	11.2	3.6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1.6	7.6	-0.7
	2 季度	0.9	2.1	0.6
	3 季度	1.4	3.1	1.2
2016 年	4 季度	0.1	-0.4	-0.6
	1 季度	-0.8	-1.3	-2.0
	2 季度	1.7	0.5	-0.7
	3 季度	1.1	0.4	-3.3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10 月	0.5	1.86	3.1
	11 月	0.1	1.90	3.3
	12 月	-2.8	1.90	3.3
2016 年	1 月	-4.2	2.07	3.2
	2 月	-1.2	1.92	3.3
	3 月	-1.7	1.90	3.2
	4 月	-3.1	2.06	3.2
	5 月	0.7	2.09	3.2
	6 月	-2.3	2.01	3.1
	7 月	-2.8	2.01	3.0
	8 月	5.2	2.02	3.1
	9 月	0.4	2.09	3.0
	10 月		2.11	3.0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月份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11 月	62391	0.5	-3.3	60926	-3.0	-10.2	1465
12 月	59525	-4.6	-8.0	58625	-3.8	-18.0	900
2016 年							
1 月	59539	0.2	-12.9	58150	-0.9	-18.0	1388
2 月	57798	-2.9	-4.0	56252	-3.3	-14.2	1546
3 月	57888	0.2	-6.8	55254	-1.8	-14.9	2634
4 月	57238	-1.1	-10.1	53504	-3.2	-23.3	3734
5 月	56434	-1.4	-11.3	54053	1.0	-13.8	2381
6 月	57484	1.9	-7.4	54059	0.0	-18.8	3426
7 月	56550	-1.6	-14.0	53570	-0.9	-24.7	2980
8 月	56701	0.3	-9.6	53081	-0.9	-17.3	3621
9 月	57096	0.7	-6.9	53723	1.2	-16.3	3374
10 月	58121	1.8	-10.3	53453	-0.5	-16.5	4668
11 月	60647	4.3	-0.4	55286	3.4	-8.8	5361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 510	159884	- 160394
	10 月	833	16580	-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 13235
2016 年				
	1 月	177	10377	- 10200
	2 月	3154	15885	- 12731
	3 月	9592	20913	- 11321
	4 月	- 2762	7218	- 9980
	5 月	3799	9330	- 5531
	6 月	13105	15971	- 2866
	7 月	18118	23090	- 4972
	8 月	- 12763	- 14072	1309
	9 月	- 173	44715	- 44888
	10 月	- 76	15607	- 15683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1	2.3	1.2	-3.8	7.6	-3.7
	1 季度	1.9	2.8	2.5	-2.0	6.7	-2.8
	2 季度	0.7	2.4	1.2	-2.9	7.5	-4.5
	3 季度	0.8	1.8	0.8	-4.5	7.6	-3.7
	4 季度	0.4	1.7	0.5	-5.9	7.2	-3.8
2016 年							
	1 季度	1.3	1.8	-0.1	-5.4	7.9	-1.2
	2 季度	1.1	2.0	0.7	-3.6	7.1	-0.6
	3 季度	1.3	2.2	0.7	-2.9	7.3	-0.4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6	5.0	4.8
	1 季度	2.4	2.8	2.4	4.0	5.7	4.7
	2 季度	2.2	2.5	3.1	0.7	4.9	4.7
	3 季度	2.8	2.8	2.3	-0.7	4.7	4.7
	4 季度	3.1	2.4	1.9	-0.8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8	2.3	0.8	-0.2	4.2	4.9
	2 季度	3.3	2.6	1.7	1.1	4.0	5.2
	3 季度	2.6	2.0	1.9	2.0	4.3	5.0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11 月	7.1	5.1	9.0	5.8	
	12 月	7.1	5.1	9.0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9.5	5.8	
	2 月	7.3	5.1	10.2	5.8	
	3 月	7.1	5.1	10.9	6.0	26.7
	4 月	7.1	5.0	11.2	5.9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7.0	4.8	11.8	5.2	27.1
	10 月	7.0	4.8	11.8	5.4	
	11 月	6.8			5.4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3.5
	9 月	4.0	4.1	3.4	3.9	3.5
	10 月	3.7	3.7	3.4	3.9	3.5
	11 月	3.6	3.5	3.3	3.8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10 月	336.2	353.2	-17.0	380.2	574.7	-194.5
11 月	322.3	337.0	-14.7	377.4	532.9	-155.5
12 月	335.0	318.0	17.0	406.4	468.3	-62.0
2016 年						
1 月	307.8	292.1	15.7	315.8	451.0	-135.2
2 月	300.7	311.5	-10.8	343.4	497.4	-154.0
3 月	329.0	345.1	-16.1	350.7	568.5	-217.8
4 月	312.7	342.9	-30.2	352.3	580.9	-228.6
5 月	315.3	343.6	-28.4	340.5	525.8	-185.3
6 月	331.7	358.2	-26.5	350.2	572.2	-222.0
7 月	302.6	321.9	-19.2	314.2	524.5	-210.3
8 月	336.1	356.1	-20.1	306.8	542.4	-235.7
9 月	336.5	361.8	-25.3	335.5	600.2	-264.7
10 月	336.4	339.0	-2.6	332.0	487.3	-155.3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11 月	66.0	65.8	0.1	138.1	131.7	6.4
12 月	58.5	53.7	4.7	167.8	110.2	57.6
2016 年						
1 月	42.6	54.5	-11.9	112.5	107.2	5.2
2 月	57.3	58.0	-0.7	133.5	107.6	25.9
3 月	61.7	60.2	1.5	159.9	120.6	39.3
4 月	62.7	63.0	-0.3	153.7	109.8	44.0
5 月	68.0	56.0	11.9	175.7	115.9	59.8
6 月	69.5	61.5	8.1	167.4	133.3	34.2
7 月	66.3	62.8	3.5	163.3	122.5	40.8
8 月	65.3	71.8	-6.5	169.9	134.1	35.8
9 月	70.5	65.8	4.8	158.0	125.2	32.8
10 月	63.1	66.3	-3.2	137.2	118.7	18.5
11 月				162.2	119.6	42.6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11 月	195.3	297.0	-101.7	254.0	164.6	89.4
12 月	225.5	340.8	-115.3	287.5	174.4	113.1
2016 年						
1 月	211.0	287.6	-76.6	170.6	98.5	72.1
2 月	208.1	272.7	-64.6	200.2	129.0	71.2
3 月	227.9	270.0	-42.0	231.7	154.5	77.3
4 月	208.3	257.5	-49.2	217.4	152.2	65.3
5 月	223.6	283.3	-59.7	220.6	144.6	76.0
6 月	228.1	310.9	-82.7	240.9	159.7	81.2
7 月	217.1	294.8	-77.7	225.3	160.4	64.9
8 月	215.2	291.5	-76.3	233.0	183.8	49.3
9 月	228.8	312.2	-83.4	255.5	181.6	73.8
10 月	235.1	336.7	-101.6	249.0	183.0	66.0
11 月	200.1	330.2	-130.1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10 月	433.5	367.6	66.9	341.0	364.9	-23.9
11 月	442.9	340.5	103.5	310.2	333.9	-23.7
12 月	423.8	354.6	71.4	311.7	326.8	-15.1
2016 年						
1 月	362.7	313.4	49.3	246.9	287.3	-40.4
2 月	359.3	291.4	67.8	289.7	305.4	-15.7
3 月	430.1	333.2	96.8	314.9	322.1	-7.2
4 月	410.8	323.8	87.0	304.2	333.8	-29.7
5 月	397.4	330.0	67.4	313.2	326.9	-13.7
6 月	452.1	338.4	113.7	319.4	333.4	-14.0
7 月	408.9	333.7	75.2	297.7	324.5	-26.8
8 月	401.3	350.2	51.1	324.2	352.7	-28.5
9 月	408.6	339.5	69.1	326.2	351.5	-25.3
10 月	419.7	350.0	69.7	325.9	344.0	-18.1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11 月	454.6	480.9	-26.4	226.0	204.6	27.5
12 月	468.8	500.8	-32.0	225.5	184.0	41.7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1.9	186.8	35.2
2 月	290.2	332.2	-42.1	177.6	136.2	41.4
3 月	400.8	429.9	-29.1	227.2	182.2	45.0
4 月	413.6	417.3	-3.6	222.4	174.5	48.0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6 月	433.9	470.5	-36.6	228.7	193.0	35.7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8 月	435.6	456.3	-20.8	246.5	206.7	39.8
9 月	470.1	498.4	-28.3	225.6	181.9	43.7
10 月	447.8	484.9	-37.1	267.5	223.7	43.8
11 月				253.4	210.7	42.6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11 月	156.8	133.2	23.6	111.1	115.2	-4.1
12 月	159.5	140.0	19.5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157.1	133.9	23.2	114.8	108.1	6.6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7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165.7	147.3	18.4	125.7	113.0	12.7
10 月	165.6	142.3	23.4	127.4	115.1	12.4
11 月				135.0	126.6	8.4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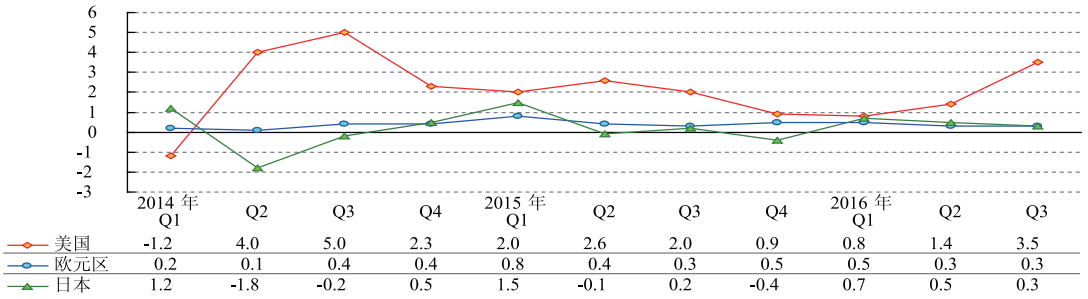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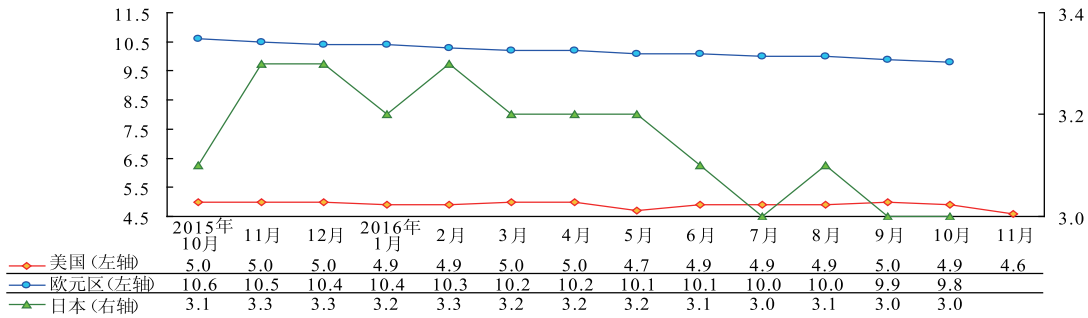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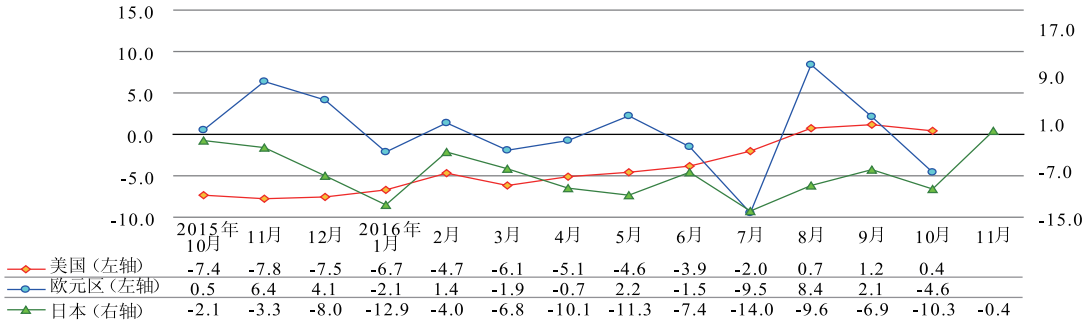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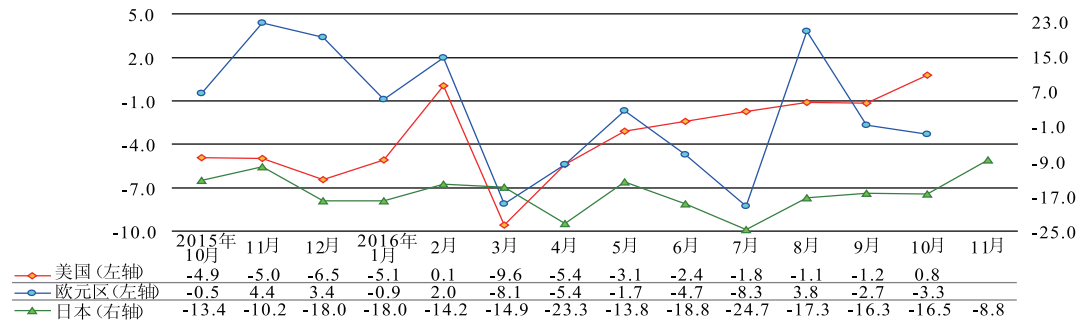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1~图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Efforts to create a new, healthy, sustainable and globalised future

Zeng Peiy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ach of us is closer than ever, The systematic improvemen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a constantly adjusting process and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fter overcoming the twists and turns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Globalization should follow the spirit of openness, cooperation and win – win, so that all countries and groups can participate in, and benefit from it.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globalization should be inclusive, fair, harmonious and innovati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build consensus, work together and form a cohesive force;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 should play a leading, supervisory and correction role, China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will usher in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globalised futu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shar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globalization.

(2)The RMB's entry into SDR and its impact

Wang Junhui

Joining the IMF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currency basket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and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RMB. Due to the lack of the payment and settlement functions of SDR itself, in the short term it is difficult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and amount of use of SDR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ial system. But in the long term, SDR entry into the basket could help stabilize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promote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opening, expand the use of RMB in cross – 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the capital market, which is expected to get nearly six trillion yuan of overseas new configuration.

(3)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irreversible

Huo Jianguo

With the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scale, the internal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not changed and the trend is irreversible.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long accompanying with the anti – globalization whose focus of conflicts reflected whether it is to adhere to the opening development pattern or adopt development mode of protectio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s decid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lephant curve has been shown to be a biased conclusions, and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it does not exist the problem of who is the loser, but whether a country can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the open environment, and how to balance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globalization, but also need to coordinate and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arising from

globalization. Und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negotiation of global investment rules.

(4)The strategic thinking of promoting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new period

Wang Xiaohong

At present, the global FDI transfers from high growth to low growth, from the growth to the structure adjustment, from stable growth to volatile growth, from the domination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he pulling by emerging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se new trends will profoundly affect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rade, industry and regional patterns. In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aces even mor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formed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taking the lead, acceleration trend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global radiation of regional distribu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gradually formed the pattern of double - driving of state - owned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cross - 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ecome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global high - end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level, service system level, and policy level. We should optimize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implement internationalized strategy, improve the foreign investment promotion service system, strengthen risk preven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5)New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changes of world economy

Gu Yuanyang

New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2016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interest rate policy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howed greater differences, the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market close to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observe the early signs of economic recove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on - going "against the wind", and has not passed yet. The global economy continues to recover, the ability to tackle the risk of the economy strengthens, and the growth momentum begins to appear. Whether Trump's economic policy is conducive to the world economy or not is an issue for people to wait and see.

(6)The basic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trade power

Du Zhenhua and He Peishan

It is the goal of the software industry to upgrade from the software trade big country to the software trade strong power.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 software trade power,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ain signs of a software trade strong power: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software trad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contr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power of export softwar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export software,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 enterprises, the international high visibility of software or software service brand. An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this paper shows that Chinese adap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development ability is weak, but competitiveness gradually improve; the output of software products grows, but lacks high - end software; the adaptability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weak, and stays in the low - end of international software industry value chain, but the foundation is gradually enhanced.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oftware export through import substitution.

(7) Sino—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Liu Zhongwei and Tang Huiyuan

President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in September 2013. In this new vision, every country will use the full rang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o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s the two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 and Russia have a very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reat powers, where energy cooper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area with the widest coverage in the Sino – Russian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fic economic problems in Sino Russia energy cooperation,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utlook for the prospects of Sino 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the new vision,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Sino 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to jointly build 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policies on the deepening of Sino 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under new vision.

(8)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 a micro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Cai Jie, Huang Xi and Bai Jiangta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uncertainty of trade policy on decision – making and export trade flows of manufacturers from the microscopic view of product, and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 to predict how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affect the export and using data of products exported to the ASEAN 2001 – 2013 to examine the uncertainty of trade policy on trade flow.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Free Trade Area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Chinese exporters are facing, increased Chinese exports to ASEAN;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is similar to that of trade tariff, but the influence is less than the latter. On the ba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 promotion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rade will be more obvious; the influence of trade policy is time – lagging while the influence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exports will increase over time.

(9) On the guiding role of Chinese planned market economic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Jiang Yimao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entered the era of planned market economy. Planned market economic theory is a theory tha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free market economy and planned economy theory as the source, the ICT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as the foundation, by way of servicing production as the support, with the economic globalized market as the background, the economic practic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basis, based on the trend and new rule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lanned market economic theory is not only the essential summary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rying to play a guiding role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ing closely connected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 strongly operational systematic theory. The main problem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planning not in place and the market economy not in plac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planned market economy.

Editor: Huang Yongfu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